

目 录

兩广“六一”事变·····	劉 斐 [1]
一九二八年粵桂战争·····	黃紹竑 [35]
三一八惨案亲历記·····	楚溪春 [54]
一块銀元和一張收据 ——張學良枪斃楊宇霆、常蔭槐和收买日本 政友本党的内幕·····	王家楨 [58]
中村事件真相·····	董昆吾 [72]
閻錫山在大連时期山西各派的斗争····· ·····	南桂馨 趙承綬 趙丕廉 [76]
我与政学会·····	李根源 [82]
西原借款内幕·····	葉恭綽 [106]
禁卫軍之建立与改編·····	載 濤 [112]
北洋軍的建立·····	張聯榮 [117]
袁世凱之再起与吳祿貞之死·····	惲寶惠 [127]
陝西革命艺人李紫恒·····	張 鈞 [131]
談梁任公·····	周善培遺稿 [133]

附注

对《两广“六一”事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二页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二九页

对《中村事件真相》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八页

对《我与政学会》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〇页、第三十一辑二九一页

对《北洋军的建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一七〇页、第三十一辑二九二页

对《谈梁任公》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三页

兩廣“六一”事變

劉 斐

兩廣事變爆發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簡稱“六一”事變。它涉及的方面很廣，關係兩廣軍政人員的事情很多。我同廣東軍政界接觸太淺，同桂系往來先後也只有三個短的時期。第一次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我在南寧講武堂學習，旋參加馬曉軍部響應孫中山先生援桂的百色起義。起義失敗後，我就回到湖南去了。第二次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我在西江講武堂學習，畢業後任白崇禧的參謀長，從梧州進軍開始，到掃清桂、柳一帶的陸（榮廷）、譚（浩明）殘部、統一廣西止。我因當時主張同廣東合作，被派在廣東方面作聯系工作，一直到出師北伐，攻下南昌後（一九二六年冬），我就到日本留學去了。留學七年之間，對國內歷次事件（如蔣介石叛變革命與寧漢分裂又合作，西征討唐（生智），蔣桂，蔣馮，蔣、馮、閻各次內戰，及對江西紅軍的五次“圍剿”，我都没參與，只在報上見到一些報道。第三次是一九三四年我從日本回國，又到了廣西。這時我專來往各地從事抗日反蔣活動，對桂系內部事務，所知並不多。尤其兩廣事變的前一階段，活動重心在廣東，我沒參與過陳濟棠內部的策劃，故對當時廣東情況，知道的有限。加以事隔多年，當時的見聞，有許多已經淡忘。所以，從反映整個事變的情況來說，這個回憶錄是極其挂一漏萬的，只能說是一個極

簡略的梗概罢了。

一、西南方面与蔣介石对立的历史过程

“六一”事变前，西南方面与蔣介石的对立，主要是粵、桂两省軍閥与蔣介石的对立，其中以桂系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核心人物。

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是从旧桂系陸榮廷、譚浩明的林虎部和馬曉軍部分化出来的。远在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遣粵軍(陈炯明所部熊路等)援桂，并亲自到桂林誓师准备北伐时，桂軍馬曉軍部在百色起义，响应孙先生。陸、譚前綫因頂不住粵軍的压力，就向百色后方退却，他們以两万多人优势兵力包围劣势的馬曉軍部(一千多人)于百色城内，将其全部繳械。当时白崇禧和黃紹竑都是馬部的营长。白崇禧只身由城墙上跳出来，率领駐城外仅存的一个連(我即在这連)逃到黔、桂边界。后来粵軍繼續深入到百色，白部才在粵軍支持下从黔、桂边界經百色到了南宁。这时，白因在行軍中跌伤了腿，要离开队伍到广州就医，于是把部队交黃紹竑率领。黃在白养伤期間，乘那时旧桂系內部紛乱和混战的机会，联合陸榮廷所部林虎的統領李宗仁，协謀統一广西。当时李宗仁称为定桂軍总司令，黃紹竑称为广西討賊軍总司令，得到李济深由广东方面的援助，逐渐扩大了势力。一九二四年白崇禧伤愈回到广西，李宗仁、黃紹竑各以所部的主力交白崇禧指揮，由白担任定桂、討賊联军前敌总指揮，对广西各地的陸(榮廷)、譚(浩明)殘部从事有计划的扫蕩。他們經過約一年多的作战，到一九二五年完全消灭了旧桂系的势力，統一了广西，开始建立了李、白、黃等对广西的反动統治政权。实际在軍事上东征西討的，完全是白

崇禧。因此，白获得了“小諸葛”的称号，成为桂系的中心人物。

这时，广东已成立国民政府，并已肃清东江，完成了全省統一。我和李任仁^①都主張拥护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主張两广合作，以便出师北伐，打倒北洋軍閥。这个主張得到白崇禧的同意，他并派我去广东联系。这时，李济深也正在策动南宁方面的李宗仁、黄紹竑，要他們与广东合作。我到广州后，得到譚延闓、程潜等的支持，和那时的党政当局汪精卫、譚平山、廖仲愷等会晤，把两广合作、出师北伐等問題的初步方案談妥了，他們並希望白崇禧去广州作具体的商定。我回到广西，向白崇禧說明了广东方面的情况和态度。白馬上到南宁同李宗仁、黄紹竑进行了他們的內部协商，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后，就由白正式代表他們，和我一道去广州，經過数度會議，确定了两广統一，并准备出师北伐。

在北伐时，由李宗仁把广西部队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七軍，开赴前线作战；黄紹竑为广西省主席，留守广西；李济深为总參謀长，留守广东；白崇禧为副总參謀长，随总司令部赴前方指揮作战。我当时也在总司令部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冬攻下南昌后，才辞职赴日本留学。

桂系在北伐战争，很順利地扩大了势力。他們先同蔣介石一道席卷了东南；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下野后，桂系在关系南京政府安危的龙潭一役中，打退了孙傳芳的渡江反攻。从此，桂系对宁、汉合作后的南京国民党中央特別委员会具有左右的力量。时

① 李是白崇禧幼年时代的先生。白扫蕩陆、譚殘部进入桂林时，李适任桂林中学校长。当时他是积极拥护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和国民党改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一九二七年黄紹竑在广西执行蔣介石的清共政策时，李亦曾被迫离桂。

唐生智反对特別委员会，認為違法篡党，派所部刘兴至当塗，向蕪湖挑畔，因而发生了西征討唐的宁、汉战争。唐虽拥有湘、鄂、皖三省地盤，但因何鍵不愿打，粵、桂軍又进入湖南策应討唐，唐被迫下野。桂系乘机改編了唐的部队，又取得了武汉的地盤。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复职，繼續北伐到北京后，白崇禧以第四集团軍前敌总指揮名义，肃清津东一带的直魯殘軍，屯兵唐山，且阴結关外的楊宇霆，企图夺取張学良（張作霖已在皇姑屯被炸死）的家底。

那时，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黃紹竑留守广西老巢，桂系势力擴張迅速，并且凌駕在閻（錫山）、馮（玉祥）、張（学良）之上，因而成为蔣介石的唯一勁敌。李宗仁想把南北的桂系势力联成一片，企图夺取湖南，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不經中央政治會議批准，逕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的职，以傾向于桂系的何鍵为湖南主席，并派兵两师逼走魯滌平，支持何鍵于三月一日就职，且繼續进攻退在常德方面的魯部譚道源师，經蔣制止无效，遂演变成为蔣、桂战争。

当湖南問題发生后，蔣以請李济深从中調处为名，把李誘騙（听说系吳稚暉担保）到南京，軟禁于湯山。白崇禧想在北方策应武汉，蔣介石秘密起用下野赴日的唐生智由天津潜赴唐山，策动被桂系西征时改編的唐旧部驅白。白因变起倉卒，只身由天津逃至大連，再轉香港回到广西。

蔣介石于三月二十五日正式下令討桂，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二十九日亲赴九江指揮大軍进攻武汉，同时收买桂系的李明瑞倒戈，迫使桂系守将胡宗鐸、陶鈞不战而放弃武汉，退至鄂西一带，旋即投降。时李宗仁在上海被阻，不能回武汉

指揮，武汉失守以后，他也从海道逃回广西。

李济深在南京被軟禁后，李部的陈济棠等在广东主和，于三月三十日通电拥护“中央”，限令在粵桂軍离开粵境。陈济棠从此开始掌握粵軍实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替蔣介石担負了監視广西的任务。

那时黃紹竑正由广西去广州，看到广东起了变化，立即中途折回梧州。四月十日白崇禧由香港到达梧州，白、黃相見后，力主繼續作战。不久李宗仁也由上海到来，借口受許多中央委員和党内先进的敦促，自称为护党討賊軍总司令，集中兵力于西江，大举侵粵，声言討蔣。

蔣于五月四日下令免去黃紹竑的本兼各职，再行討桂，以湘軍何鍵部和粵軍陈銘樞部分路进攻广西。桂軍屢战失利，李、白、黃于六月下旬通电下野。蔣任命俞作柏为广西主席，以李明瑞部駐防广西。湘、粵軍班师，各自离开广西回省。

在北伐时，張发奎曾一时以偽装“左派”博得一些人对他的好感。到南昌起义时，張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公开地反革命了。他因不容于唐生智，就把部队带回了广东，受李济深指揮。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李济深和汪精卫赴上海开会，張突然解除桂系黃紹竑等的武装，桂系大憤。正相持間，适广州暴动爆发，張部共产党人参加了暴动，張发奎才被迫下野。到蔣、桂战争时，蔣为了利用張倒桂，又起用他为第四师师长，参加对武汉方面桂系的作战，桂系的胡、陶失败后，張就駐防在鄂西宜昌、沙市一带。到一九二九年九月間，蔣命張部移防隴海綫，張疑蔣要解决他，拒不受命。适值汪精卫由法国啓程回国，張通电欢迎汪回国主政，同时为了保全实力，把部队由鄂西移駐湘西。蔣以擅自調动军队的罪名，将他撤职查办。同时，亲汪的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与师长李明瑞为声援張

发奎，于九月二十七日宣布广西独立。蔣命湘、粵軍防堵張发奎，并免俞作柏职，以吕煥炎为广西主席。張发奎部由湘西进入广西时，适值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策动广西旧部驅逐俞作柏成功，重新拥有广西地盤，并与張发奎合作反蔣，于十二月間协助張发奎进攻广东。蔣命何应欽督粵軍陈銘樞、陈济棠部于十二月十二日前后，在广州附近及花县一带剧战数晝夜，結果桂軍失敗，退回梧州。

到一九三〇年初，蔣乘蔣、馮战争胜利之后，屯大軍于河南，閻錫山感受威胁，遂酿成閻、馮联合反蔣。閻于二月电蔣謂武力不足以統一，愿与蔣共同下野。李宗仁即通电推閻、馮、張(学良)为陆海空軍总、副司令。于是閻、馮再通电主張以总投票解决党爭，汪精卫复电贊成。到三月間，二(馮)、三(閻)、四(李)集团軍將領通电劝蔣下野，共推閻、馮、張、李为陆海空軍总、副司令。四月一日，閻、馮、李分別在各所在地就职，逐漸发展为蔣与閻、馮之間的中原大混战。汪精卫旋亦参加这个反蔣集团，在北方召开扩大會議，以召开国民會議、頒布訓政时期約法及召开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等相号召。同年九月，他們在北方組成了所謂国民政府。那时，桂系李、白、黃和張发奎为了全力策应閻、馮在中原作战，曾于六月初傾巢而出，大举进攻湖南，迫何鍵于六月四日退出长沙；八日桂軍进占岳州，武汉为之震动。蔣令粵軍进入湖南截击桂軍后路，迫使桂系放弃长沙、岳州，退回广西。黃紹竑在退却到广西边境时，忽然反桂投蔣。从此，桂系退保广西一省，編練民团，以解决广西兵力不足的困难；对外則联系一切反蔣力量，尤注意結好广东的陈济棠，希望能重新建立两广合作的局面，造成間鼎中原的有利形势。

当时蔣因張学良入关，取得了對閻、馮的中原大战的胜利，扩

大会議已接近垮台，广西军队也已败退。蔣为了进行他的政治欺騙，就于十月三日进入开封的那天，电国民党中央主張定期召开国民會議，頒布訓政时期約法，企图进一步把汪精卫的旗帜拿过来，以巩固自己的統治。国民党中央慑于蔣介石的威势，決議于翌年五月召开国民會議。但这个決議和胡汉民的“訓政裸婦論”相冲突，而且这些主張又是汪精卫在扩大会議搞的把戏，胡始終不以为然，常在閑談、講演或文字中加以疵議。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国民党全体中委在蔣宅討論約法問題的时候，蔣、胡的意見相左，竟形成了當場正面冲突，蔣当夜就把胡汉民軟禁于南京湯山。国民党的粵系中委及西南实力派議論紛紛，首先由陈济棠于四月二十八日通电責蔣，繼由监委邓泽如、林森、蕭佛成、古应芬等联名通电責蔣。孙科、王寵惠、汪精卫等亦相繼赴粵，于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員非常會議，推定委員十六人成立西南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名目上是粵系，实际是合国民党的所謂“左”右派和桂系一起組成的。桂系在广西整伏一个时期之后，乘此机会又伸出头来，走上了西南政治舞台。

这时，蔣介石采取怀柔政策，声言对广东不采用軍事解决，而专注意于江西“剿共”，并且由蔣御用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決議仍以胡汉民为国府委員，且恢复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任为国府委員。会后，蔣就去南昌专事“剿共”。是年九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內部迫于全国抗日高潮，都感到有“团结”的必要，于是協議由粵、滬双方同时召开會議。經過許多周折，蔣介石曾一度下野，到一九三二年元旦才成立統一政府，原由广东非常會議成立的西南政府于一月五日通电撤銷。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謂均权分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

軍事分会”，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

陈济棠本是李济深部的师长，北伐时随李留守广东，因势坐大，逐步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蒋、桂战起，李济深在南京被扣，陈通电拥蒋驱桂，以后又暗中迫走陈铭枢（广东主席），取得对广东的统治地位。他因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蒋搞掉他，所以他要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来作他的政治屏障。在元老派声势强大，如到广州来举行非常会议等反蒋活动时，他极力支持，用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维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同时，他又怕西南方面反蒋更坚决的人——如李济深或桂系的李、白等会起而代他，所以在元老派内部四分五裂、力量衰微时，他又暗中同蒋介石勾结，接受蒋的贿赂。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蒋派蒋伯诚坐驻广州，专门作收买陈济棠的工作，暗地里送给陈济棠的钱是很不少的。陈并且把余汉谋部派到赣南去协助“剿共”，为蒋效劳。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既要利用陈济棠作为反蒋的实力，又不满陈济棠患得患失、模棱两可的态度，且不敢过于逼他，以免他完全倒到蒋的方面去。陈济棠原先为了取得广东地盘，乘桂系失败时就拥蒋驱桂，作蒋的鹰犬，几次把桂系搞得不能出广西一步。到了他的地位巩固时，他又耍联系桂系，以便取得对蒋的威胁作用，来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可见陈济棠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一方面纵横捭阖，敷衍各方，互相利用，一方面又患得患失，始终不肯毅然反蒋，其唯一目的在于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

陈济棠有满脑子的封建迷信思想，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他的哥哥陈维周更到处看风水，满想找一穴龙眼吉地来移葬他的母亲，以便护佑陈济棠能取代蒋介石的天下。这种“不问蒼生問鬼神”的笑话是很多的。据说陈济棠很信他命带妻

財，因為從他當連長時和私娼莫秀英結婚以來，就一直官運亨通，說這完全是莫秀英的“八字相夫旺子”的關係。所以陳很聽莫秀英的話，連他修建的要塞炮台，也有取名“秀英炮台”作為吉利兆頭。至於賣官鬻爵，完全由莫一手包辦，更是當時眾人皆知的事。

從桂系方面來說，久經思起，正好利用西南半獨立狀態，企圖積極推動陳濟棠和其他方面組成反蔣的聯合陣綫。因此，李宗仁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名義經常留住廣州，全力撐持西南政務委員會這塊招牌，專事推動反蔣的政治活動（他一面是折衝樽俎，與各方面進行拉攏，以擴大西南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面是為了堅定陳濟棠的反蔣態度，並企圖從廣州方面取得物質幫助），而把廣西家務完全交給白崇禧全權處理。我經常往來南寧與廣州之間，在廣州幫助李宗仁進行活動，並和國民黨留居廣州的元老派共同勸說推動陳濟棠反蔣。

記得我每次到陳濟棠那里去談話的時候，他手里經常端着一只水烟袋，我們談着談着，他總是說：“為章兄！我一定反蔣！”儘管他每次都開出反蔣的支票，但總沒見他兌現。他既想擴大地盤，又怕丟了老本，患得患失的心情老在折磨他。各方策動他反蔣的人，對他這種遲疑不決的態度都非常不滿；有時我也氣得跑回廣西去了。白崇禧便常常帶着挖苦的口吻說：“我們跪在豬欄門口喂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只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呀！”這說明當時推動陳濟棠反蔣，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只有後來蔣介石逼得他無路可走了，他才被迫走上反蔣的道路。

二、事變第一階段

蔣介石之所以容忍西南保持比較均權的狀態，對胡漢民等國

民黨元老派採取敷衍態度，主要是為了集中力量來對付共產黨，但他並沒有忘懷兩廣問題。

當一九三六年一月間，胡漢民由歐洲回國時，蔣立即派居正等赴香港迎胡回南京，就是想解決兩廣半獨立狀態的步驟之一。那時，陳濟棠、李宗仁為爭取胡漢民這項政治資本，也趕忙赴香港迎胡去廣州，向胡表示忠誠，力請胡領導他們反蔣。胡漢民因對蔣宿恨未消，見陳、李他們也確有一些軍事力量，就聲言決不北上，留在廣州積極準備反蔣。不料到五月間，胡忽因腦溢血病故。蔣見時機已到，乃派居正、孫科等八委員以祭胡為名赴廣州，要求兩廣當局進一步加強全國“精誠團結”。很明顯，這就是要取消西南半獨立狀態了。

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對華軍事侵略的魔爪，已由東北伸入華北。蔣介石簽定了賣國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之後，日本為了進一步要求華北五省的特殊化，就對華北大舉增兵，漢奸公開活動，浪人到處挑釁，並逼蔣簽訂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協定”，氣勢洶洶，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在西北方面，風傳張學良、楊虎城已與共產黨妥協，將發動抗日運動。蔣急於要解決西北問題，除已派兵到山西協同閻錫山堵截紅軍東進抗日的進路外，並以重兵調往潼關、洛陽各地，想逼張、楊繼續“剿共”，並乘機解決晉、綏、秦、隴的地盤問題。兩廣方面認為蔣既有事於西北，而日本侵略華北，局勢又顯得十分緊張，所以是假借抗日旗幟、進行反蔣的絕好時機。因此，當蔣提出徹底統一兩廣的要求後（外傳蔣曾提出五項要求，有無其事我記不起了），陳濟棠當然不願意，桂系則極力主張趁此時機反蔣。這時，陳濟棠若不共同反蔣，就會陷於孤立地位，他的“南粵王”的美夢就不能再做下去了。他感到與其坐以待亡，不如和桂

系一起反蔣，以便進可以爭取全國輿論的同情，擴大西南聲勢，進一步瓜分蔣介石的政權；退也可以使蔣投鼠忌器，多少向西南讓點步，以便維持西南現狀。

兩廣與各方密謀反蔣，早就有信使往還，許多地方軍閥多有代表駐在廣州，形成一種不定型的政治俱樂部。這時為了加強重點地區的聯系，陳濟棠和李宗仁就派陳的哥哥陳維周和我作為親密信使，去湖南聯系何鍵，要他和兩廣共同反蔣。何見到我們後滿口答應，他說：只要兩廣出兵，他馬上就擁護，但要求補助軍費，同時要絕對保守秘密，並指定以後由他的秘書長凌瑩負責和我們聯系。話雖如此，據後來了解，何鍵和我們接洽後，立即向蔣介石告了密，他用這兩面手法向雙方討好。

為了部署軍事，白崇禧又從南寧來廣東，和我一道到東江、北江等粵、桂邊境地區，視察地形，擬定作戰計劃，大體是：對福建和貴州方面採取守勢；對江西、湖南方面採取攻勢；粵軍主力集中在大庾、韶關地區，準備進攻江西；桂軍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區，準備進攻湖南，並在粵、桂兩省與各鄰省的邊境地區構築了防禦工事。

當時西南方面可能使用的兵力大體如下：

陳濟棠的第一集團軍，原有三個軍，軍長是余漢謀、陳濟棠（副軍長張達）、李揚敬，每軍三師，師長是莫希德、葉肇、鄧龍光、巫劍雄、李振良、李漢魂、黃延楨、黃質文、張瑞貴等。另外有個獨立師，師長是黃任寰，一個教導師，師長是繆培南，一個獨立旅，旅長是陳章，一個警衛旅，旅長是陳漢光，四個監警團及財政廳的兩個特務營。動員時，即以原來的獨立師和教導師為骨幹，擴編為四、五兩個軍，以黃任寰、繆培南為軍長。粵軍的編制每師是四個團，一起

約有七十個團，共計二十萬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原有兩個軍（第七軍軍長廖磊，第十五軍軍長夏威，副軍長周祖晃、韋雲淞，師長為王贊斌、覃連芳、蘇祖馨、賀為珍、程樹芬等），臨時擴編兩個軍（包括十九路軍的翁照垣師）；另外廣西民團已訓練有素，能作戰的有九十九個大隊；一起約十多万兵力。

兩廣兵力總計：陸軍部隊不下三十多萬人；空軍方面廣東有六個中隊（司令黃光銳），廣西三個中隊（司令林偉成）；海軍方面廣東有江防艦艇數十艘（司令張之英）。

蔣介石方面，兵力比較分散，隨着紅軍向西北長征，蔣乘機跟着紅軍走過的后方，對黔、川、康各省實行了軍、民、財政的統一，並分別派兵駐防：在北方以一部兵力進入山西，在潼關、洛陽一帶駐重兵，促張、楊繼續“剿共”，在閩、浙、蘇、豫、隴海綫各地，也各分別駐有一部分部隊。估計這時蔣能用于對付兩廣的兵力，不過十餘萬至二十萬人左右。

此時，蔣除將原駐貴州的薛岳所部威脅桂北邊境、以原駐福建的蔣鼎文所部威脅粵東邊境外，另調甘麗初部集中衡陽，陳誠、衛立煌等部集中湘、贛邊境，準備進攻兩廣；並將空軍集中在贛、湘兩省基地，以一部海軍集中廈門，準備從海空方面協同陸軍作戰。

兩廣方面準備好了之後，為了打出抗日的幌子，就先于五月二十七日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以激起全國反日情緒，爭取輿論的同情，並積極延攬接納各方抗日反蔣人士；于六月一日公開揭起抗日旗幟，實際進行反蔣。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于六月二日以“冬”電通請中央領導全國從事對日抗戰，並通電全國黨政軍民各界吁請一致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

两广“冬”电发出后，立即动员两广各级国民党党部和群众团体纷纷响应，在两广各地举行宣传示威运动；同时由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率全体将领及海、空军、要塞司令等，联名于四日以“支”电响应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冬”电的号召，说：“自‘九一八’以来，……我政府隐忍委曲，……俱不足以压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钧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云云。旋即由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颁发印信，部队仍沿用第一、第四集团军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

蒋介石本人则伪装镇静，在六月八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会上表示：中央这次派员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诚专一，尽哀尽敬，决无向西南提出五项条件的事；并表示决不相信外边一切谣言，相信西南必能和中央团结一致，企图用这来安定各方舆论，缓和反蒋气氛。于是，蒋一面布置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商讨，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中向两广调集军队，并设法分化和收买陈济棠内部，又假惺惺地和西南文电往还。蒋首先复陈济棠一电说：今天要救亡图存，必须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骤才行，否则，就会减损对外的力量，要他们的“部队征调，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望推派负责人员来京，共同商决一切”。同时，蒋又于九日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以“佳”电电复西南各委员说：“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中央秉承

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決議，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針，遵循不渝。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內，召开全体执监會議，于一貫方針之下，进为步驟緩急之謀。希飭所屬部队，勿因輕率之自由行动，致誤救亡大計”云。蔣企图以开会商討为名，制止西南部队自由行动。

西南方面立即发出“真”(十一)电，针对“佳”电內容逐一駁复，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指出：“中央若果有御侮决心，則日本正在华北增兵，何以不見中央向北开动一兵一卒，而反將北方及中部各省駐軍紛紛向粵、桂压迫？御侮不可徒托空言，救亡必須見諸事实。华北危机既迫，唯有实行抗战，始克救亡，决非从容坐談之时。只須中央领导抗日，則全国統一之势立成，一致御侮之效可睹。乃不此之图，反欲一面以召集全体會議搪塞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之要求；一面調集重兵，压迫湘、粵、桂之四境，是对外之实效未图，而內战之危机先啓。此不独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亡国之禍，即在目前矣。何去何从，惟鈞会实利图之。”

两广方面除徹底駁复“中央”外，同时又假意地遇事向“中央”請示，报以“根据一、四两集团軍將領慷慨請纓，并請改頒軍号，以便出师抗日。当經屬部屬会联席會議通过決議：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軍，并頒发印信令遵在案”；并报以“复据一、四集团軍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会报，两粵部队悉数可調遣北上；后方治安，两省民众武装足可巩固，特請中央指令北上路綫及集中地点，并对北上部队餉糈械彈源源接济”。两广方面就这样来进一步逼請“中央”领导并支持抗战。

同时，两广方面为爭取輿論同情，并宣傳主張开放民众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权利；主張取消中、日間所訂非法屈辱協

定；在两广各地发动群众示威，宣傳抗日救国。当时的宣傳口号，除喊出“日本是我们的死对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經濟絕交！”外，还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軍隊不打中国軍隊，反对內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为要抗日救国，必須全国动员！”等口号。并由各地党部、群众团体，紛紛电請“中央”順应輿情，速調南下的部队，兼程北上抗日。在七月初还組織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北上請愿代表团，請“中央”回师抗日。这个代表团到达香港后，住了好几天，因中外輪船公司受南京指使，拒絕卖船票給他們，只好中途折回广州。又为不放弃一切宣傳机会，还派了五位中委——黃麟書、邓青阳、崔广秀、李任仁、李綺庵北上，出席二中全会，向“中央”提出五項救亡方案（大体是：早定抗日决策、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廢除中日間一切协定、开放人民民主权利之类等，詳情記不起了），准备作誓死的力爭。

在双方互相攻訐、战事密云不雨的醞釀中，蔣介石的阴謀逐步一幕幕地搬出来了。为了給他御用的二中全会打气，他首先使收买来的广东空軍人員黃志剛等四十多人于七月六日駕机投蔣。据說为了收买这批空軍，蔣介石花了比买陈济棠全部飞机多得多的錢。最初蔣認為太不合算，不肯出那多的錢，但听到經紀这项买卖的人說，把陈济棠的空軍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問題，而是搞垮陈济棠在广东的全部实力的問題，在軍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錢的数量来衡量的，蔣才答应了。

蔣把陈的空軍收买成功后，就指使这些空軍人員黃志剛等通电指責陈、李、白等借抗日之名，实行反叛“中央”，并說他們有“派潘宜之赴日要求日軍进占华北，扰閩南，牵制中央”等勾結日本的行为（那时两广为了反蔣，确有一部分人主張利用日本浪人搞

蔣，也在所不惜，但潘宜之赴日一說則非事實；當時且有派翟歧卿到蔣統區去暗殺日本人，以增加蔣的麻煩的計劃，也沒有搞出甚么名堂來）。陳部副軍長李漢魂也於七月六日電陳濟棠，表示“封金掛印”而去。這些事實都給陳濟棠帶來了不利的空氣，給蔣召開的二中全會打了強心針。

蔣御用的二中全會於七月十日開會，由張群（外交部長）作了關於中日外交的報告，重申“安內攘外”的主張，然後通過決議，對陳濟棠、李宗仁分別採取一打一拉的政策：一方面發表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省綏靖正、副主任，以安他們的心；另一方面對陳濟棠則採取強硬手段，免陳的本兼各職，另命余漢謀為廣東綏靖主任兼四路軍總司令，以徹底拆陳濟棠的台。余漢謀是陳濟棠的第一軍軍長，余部是陳的主力所在，蔣通過孫科、上官雲相等和余的關係把他收買過去，這對陳濟棠確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余漢謀於七月十四日在大庾通電就職，聲明擁護“中央”，對陳濟棠實行“逼宮”。余漢謀的通電，可以反映出舊社會軍閥們爭權奪利、寡廉鮮恥的一個典型。他的通電說：“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圖存；非統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圖和平統一，實為集中力量之救國要圖”；說他以前之“奉命率師入贛，即矢志‘剿匪’御侮及和平統一救國”，卻不幸“我廣東當國難日亟之際，忽然稱兵，陰結外寇，進窺鄰省，發動內戰，破壞統一”，說他“忠言見拒，計智俱窮，用特飛京，請示挽救。……自念半生戎馬，淡泊自甘，詎有權利在念？惟國家民族生存，不可不顧。是以毅然就職，貫徹初衷，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於是他單刀直入地說：“今日粵局安危，系于伯公（陳濟棠）一身，應請听命中央，釋兵入京，贊翊中樞，則和平統一，立可告成，御侮大計，不致中廢。”他說出了要陳濟棠走路的目的之後，接着又

对粤籍将领安撫一番說：“粤中袍泽，夙著勋劳，中央寬大为怀，一視同仁，絕无歧异，当共喻此心。”跟着他就限陈济棠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隨即把他的部队开回韶关，到十五日已把他的主力集中英德、軍田一带，着手进入广州接替陈济棠对广东的統治地位了。

同时，陈济棠的第二軍軍长張达也已被蔣收买，于十四日声明服从“中央”，并着手迎接余汉謀来广州上任。

陈济棠之統治广东，本来是在蔣、桂战争时，因李济深被扣，不費吹灰之力揀便宜得来的。比之其他大小軍閥來說，他的“天下”并不是亲自动手打出来的。因此，他的内部并不象其他軍閥有什么“子弟兵”的关系，也不能形成陈济棠为中心的巩固的团結。他过去之所以能順应时变，維持现状，除利用各方矛盾取得掩护之外，完全是靠他能够逐級分肥，維持一种表面的“和平共居”，真正到了利害关头，就必然分崩离析。經蔣介石一威吓利誘，空軍首先跑了，余汉謀、張达叛了，李汉魂走了，李揚敬（第三軍軍长）消极了，于是内部意志涣散。陈济棠对反蔣本来就患得患失，极不坚定，一看到这种形势，馬上就丧失了信心，認為大势已去，遂于十八日电余汉謀以广东治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書，声言下野，隨即到香港去了。李宗仁見陈济棠这样軟綿綿地倒下去了，也只得于十八日悄悄地回到广西。粤軍将领就一致向余汉謀劝駕。余于二十三日晨由韶关偕錢大鈞、黃鎮球等飞广州。作为两广事变中心地的广东，就以陈济棠的迅速垮台而落入蔣手。

三、事变的第二阶段

自陈济棠下野、李宗仁回广西后，事变中心就移到广西了。从

当时的形势看，蔣有利用广东问题的解决来乘机消灭广西的可能，因此，广西当局已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当时曾和李、白开玩笑地说，“你们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李、白对当时情况的判断和决心大致如下：

首先是：以破釜沉舟之計，作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用持久战和蔣介石糾纏到底，即使失败，也是为了抗日救国，虽败犹荣，发得出計文，在历史上仍将有一定意义。

其次是：糾纏到使蔣知难而退时，万一有和的可能，就应适可而止；因只有广西一省的力量，究竟是有限的。

那时，广西約有十多万可以作战的兵力，内部有子弟兵的关系，团結力强，且曾經多次失败的考驗，决不会象广东陈济棠的军队一样。蔣介石想收买内部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利用黄紹竑，也分化不了广西的内部。广西部队一般能吃苦耐劳、能作战，蔣介石的部队最怕和广西兵作战，碰上他們就吃不消。同时广西处在內綫作战地位，容易集中优势兵力，灵活运用，把兵力重点放在桂林、梧州方面，可以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曠日持久的战争。蔣介石这时正有事于华北和西北，特別由于張、楊不稳，是他的最大心病，因而他利于速决，好騰出手来去全力应付华北和西北問題。若广西和他拖到底，积年累月地下下去，則越拖得久，对蔣就越为不利。——这就是当时的形势。

事后听人家說：蔣当时認為对广西作战有五不可，是不得已的下策，他認為如果战事拖上三个月以上就糟了。所以，他最初用武力包围广西，本想迫李、白就二中全会所任命的綏靖主任职就罢战言和的。因李、白对二中全会的任命久无表示，故在部署兵力的同

时，就派了接近李、白的張定璠去广西劝导李、白。張定璠在廬山受蔣指示后路过南昌，把蔣的使命向熊式輝說了，熊式輝不以为然，要張不去广西，熊自己連夜赶上廬山向蔣建議，大意是蔣应乘广东問題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調虎离山之計，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之患。据說熊式輝对蔣說，日本人虽猖獗，还有可以緩冲的余地，即使对日本人讓出华北，将来还可利用英、美的力量再算帳，并且如果真讓出华北，則还可以借刀杀人，讓日本人去消灭共产党，蔣反而可以丢掉这副对中共的沉重担子；唯有李、白却是蔣的心腹之禍，不于这样有利的时机去消灭它，还待什么时候呢？不过必須同时以重兵压迫广西，使李、白慑于威勢，才可以削除李、白兵权，达到調虎离山的目的，云云。

蔣听了熊这番話后，就改变了原来的主意，于七月二十五日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免李、白原任广西綏靖公署正、副主任职务，另任李宗仁为軍事委员会常委，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以原浙江省主席黃紹竑为广西綏署主任；一面以大軍包圍广西。張定璠得知蔣要对广西用兵，就中止了广西之行，只写了一个信給我。

李、白原来就惴惴不安，料想蔣会采取强硬手段。这时看到要把他們調离广西，更加肯定蔣是要端他們的飯碗，要徹底消灭他們，这就到了非打不可的境地。他們于是更坚定了繼續坚持抗日反蔣的决心，积极欢迎并邀請各抗日反蔣的党派、团体、人士等到南宁来，共同繼續反蔣，并进一步动员抗日輿論，增强軍事准备。这时，除李济深和蔡廷鍇已在南宁外，反蔣的各党派团体也都派代表到了南宁；其中救国会的楊东莼，我对他記憶得更真切，因当时桂系很想拉攏各党派、尤其是救国会，想以此作为与蔣介石对抗的資本。对救国会方面，桂系先有电給陈劭先，要他邀請沈鈞儒赴

桂，陈把这个电告诉了楊。当时，救国会方面認為沈老不宜赴桂，因楊东莼过去在广西工作过，就决定派楊去，并由陈劭先电广西，得到桂方同意。但楊本人因为过去在广西工作，是跟桂系鬧翻了才离开的，怕有不便。楊和我既是同乡又是同学，所以他先打电給我問他赴桂是否适宜，我曾回电促他赴桂。

那时，代表华南救国会去的是何思敬。有一个自称作“共产党駐港代表”的胡鄂公（听說是冒称的），他先后带了两个人到南宁去，一个是錢鉄如（当时說姓楊），另一个是姓黃的女人。代表第三党的是章伯鈞；其他如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設派、民社党、青年党等，也都有代表到南宁。此外，教育界和其他各界人士，有邓初民、彭泽湘、刘廬隱（胡汉民派）、張文、邓龙光、翁照垣等，还有許多人，名字已記不起来了。

当时蔡廷鍇在南宁号召原十九路軍官兵来广西报到，首先成立了一个师，由翁照垣任师长。广西的民团、学生，大多数已动員入伍，抗日救国熱潮，一时汹涌澎湃。除救国会坚持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外，各党派多主張立即成立抗日政府，坚决和蔣介石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

在这种双方輿論沸騰、已經形成战时景象的情况下，李、白为了先礼后兵，并向南京有关的人士进行宣傳攻势，乃攻击蔣介石擅自以政府名义更調李、白原来广西綏署主任职务，是“別有用心”，完全是“違反二中全会決議、違法失信”的行为，并間接表示他們本来已决定定期就职的，現对此“違法失信”的措施，也就更不好遵循了。

蔣介石这时则采取威迫利誘、軟硬兼施的办法。他一面調主力部队卫立煌部由广东北江方面，从連山向广西富、賀、八步方面

進逼；又以陳誠部由西江肇慶方面向廣西梧州方面進逼；并以甘肅初部由湖南威脅桂林；以薛岳部由黔南威脅廣西西北的宜山；另外余漢謀一部由廣東南路威脅廣西南部；以空軍不斷在桂林、梧州一帶上空進行威脅攪亂。一面他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促李、白速就新職，并令何應欽等聯名電促李、白赴京。蔣原先見李、白對於新的任命不正面表示意見，只向中央有關的人攻擊蔣違法失信，很擔心李、白不就范，并傳聞廣西將于八月一日組織政府，內心很不安。到八月一日，蔣見廣西組府之說并没實現，就主動用軟硬兼施的口吻，以“東”電向李、白促駕，并解釋兩點：第一點，說他調李、白任新職的唯一作用，是為了擺脫他們自六月一日以來所處的困難境地，并徹底實現國家統一，加強團結，以便一致對外。第二點，對李、白攻擊他違反二中全會決議的問題，詭說二中全會發表李、白廣西綏署職務后，曾經托多人勸請就職，未見答復，到陳濟棠去職后，還未見他們正式就職，以為他們一定有現實的困難，所以另調新職作為轉圜，只要真心想完成黨國的統一和團結，則任何命令都應該是樂于接受的；至說到任命地方官吏，本是政府的職權，全會（中執監委）也並沒有不能變更的限制，斷不能看作是違反決議、違法失信。接着蔣就威脅地說，現在新的任命發表一個星期了，沒有見他們有接受的表示，還聽說他們有攻粵犯湘的決心；這就要他們曉得，固然中央愛惜國力，企望和平，也決不容對內有用兵自殘的舉動，如果他們竟出兵鄰省，只有自陷于絕境，勸他們要順應時勢潮流，接受新命，表示就職。電文末了并說，他（蔣）短期內要到廣州去，尤其希望能面談一次，只要統一得能實現，和平得以貫徹，國家與地方都有好處，一切都可以盡情商酌，云云。

蔣介石這些話，不外是說，你們听“中央”的話，一切好辦；否

則，就不行；他所謂不久到廣州去，固然是希望李、白親自去面談，但言外之意，也是讓李、白知道，他到廣州來當然就是親自指揮作戰，這也是不待說的了。

當李、白聽到蔣有調虎離山的新命時，即通過南京的有關方面攻擊蔣獨裁，擅改二中全會決議。李、白正式接到蔣于二十八日以政府名義任命的“儉”電後，又于三十日以“世”電敷衍說：“‘儉’電收到了，更調職務，中央苦心措置，我們無不諒解，但‘關於抗戰救亡大計，仍懇為明確具體之指示，俾便遵循。此間善後事宜俟與季寬（黃紹竑）面商決定’，云云。實際上，自黃紹竑從桂系分化出去投蔣後，桂系和黃紹竑早已形成水火不相容的狀態，除非黃紹竑能夠以武力打回廣西，所謂‘面商決定’，不過是一句不能兌現的‘官話’而已。而他們要蔣明確具體指示‘救亡大計’，也無異是‘問鼎輕重’的意思。這時蔣已發出上面說過的‘東’電，就再復李、白的‘世’電說：‘所謂救亡大計，關於外交方針與抉擇國策之限度，二中全會亦曾明白具體宣示，若謂具體計劃，不但于千里之外非可以文電宣達，且就國家權責而言，……只有中央最高機關可責令政府提出報告’，并以他們‘分屬軍人，……只有依照執行’云云為借口，責令李、白‘第一要義，仍在接受中央所畀予’的一切任務，就不愁不知道具體措施。蔣并替黃紹竑解釋一番，說‘中央’要黃去收拾廣西局面，并非黃的本心，如果在他們沒有接受新職以前，黃當然也不好回廣西去，勸他們要‘能斷能舍’，‘即日離桂赴京，接受新職’，或照他‘東’電所約，赴廣州會晤。

如前所述，蔣、桂雙方調兵遣將，劍拔弩張，鑼鼓打得很緊，同時電信往還，互相責難；但雙方都有所顧忌，所以，也互留余地，暗中尋找轉圜的辦法，遂形成當時一種外張內弛的局勢。蔣的死黨中，

一般眩于陈济棠的失败，揣测蒋一定会趁此机会彻底拔掉李、白的根子。他们为迎合蒋的心理，故主战的多。那时程潜在蒋政府中列名于无权的参谋总长的地位。我因私人的关系，在一九三四年由日本回国时，曾和他交换过关于中、日问题的意见；同时，他因业务关系，多少要从国防上考虑问题。到蒋、桂双方剑拔弩张时，他会有电给我，大意是说：中国要抗战，就不应该再打内战，自毁抗战力量，应敦劝双方和解，问我的意见如何，看广西方面有无和的可能。我复电同意他的看法，希望分途进行敦劝。他得我的复电后，就商量与何应钦联名电蒋（在庐山）建议主和，蒋立即复电同意，并要程先从海道赴广州，待他不日飞广州详商。于是程在动身的同时，来电约我去广州见面。

我之斡旋和平，首先是应程潜之约，以私人资格去的。我于八月十一日到广州，正在同一天，蒋也到了广州。我先看了程潜和他的随员唐星，了解了一下情况。蒋听说我到了广州，就急急忙忙要找我见面。我根据诸种情况判断，认为蒋对广西问题有和的可能，因为他的大部兵力如果被广西拖住了，旷日持久不决，其他的问题就会更多。即使他解决了广西问题，将来西北问题就会更难解决，甚至还有许多类似广西的问题出来，这些都不是蒋不知道的。当我去看蒋时，他也毫无掩饰他那种急迫的心情，一开口就问我：“广西情况如何？一定要打吗？你看怎么办好咧？”

我说：“广西问题，好办、也不好办。问题很简单，广西要抗日，也不能包办抗日，要全国一起来抗，且并要你领导来抗，那不很简单吗？”

蒋：“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里不安，叫我怎么来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能够抗日吗？”

我：“你說要安內才能抗日；廣西說，你先抗日，則內自然安。如果為了要安內，自己打來打去，只有替日本人造機會，這就是自速其亡。”

蔣：“如果在軍事上、國防上一点準備也沒有，也不聽中央的命令行事，這樣的輕舉妄動，能夠抗日嗎？”

我：“安內和準備抗戰條件是兩回事，安內是自己打自己，消滅抗戰力量；準備抗戰，就不應該打內戰。”

蔣：“我之安內，就是為了準備抗戰，要從外交、國防、軍事、內政等各方面作充分的準備；否則，輕舉妄動，只有自取滅亡。”

我：“日本人貪得無厭，永無止境，若茫茫無盡期地準備下去，究竟準備到何時為止呢？”

蔣：“只要地方能服從中央命令，不發生內戰，我們就可積極進行準備抗日，從現在起，日本人不前進，我們就積極準備；若他再進一步，幾時前進，幾時就打；否則準備好了再打。”

我：“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無盡期地準備，而是有限度地來從事抗戰準備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勸說廣西當局。”

蔣：“好！就照你的意見去辦罷，看他們還有甚麼要求？”

我見蔣出來，俞飛鵬請我到太平沙西餐館去吃飯。當我去時，蔣家來廣州的一般主戰派好漢們都已經在座了。我記得除陳誠、衛立煌、錢大鈞、熊式輝等外，連何鍵也在座，他是當面向我答應過只要兩廣出兵他就響應的，我們彼此自然是心照不宣。那時，從這些主戰分子的神情看，似乎以為我這時還想和，簡直是不識時務的夢想。他們用譏諷的眼光和幽默的口吻問我：“怎麼樣？你看會打嗎？能和嗎？”我說：“這要看你們呀！”我問陳誠：“幾時上前方？”他說：“吃完飯，馬上就走！”他心目中自以為自己猜透了蔣的心理，認

为和是假的。

我回到了广西，把上述情况和在广州所見到的种种向李、白彙报之后，就商量具体和平的办法，大体上是以蔣接受抗战、收回事变以来調动李、白职务的成命和派大員入桂正式和談等三点为基础，逐步补充成为以下各点：

一、关于抗日問題：“中央”承認以中、日現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証出兵参加作战。

二、“中央”收回以前調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協調职务。

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財政开支及部队复員費用。

四、复員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編制員額及經常費用。

五、“中央”特派大員入桂和談，公开昭示信守。

六、和議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領導。

当我和李、白商量和平問題期間，程潛曾来电說，他想派唐星来广西看看情况，我复电欢迎他来。唐来后住在我的家里，他知道我們对和談的态度与和平条款的大体内容后，即回广州。唐临走時，我拜托他从旁向程潛了解一下蔣能否接受那些条款。唐回广州后曾来电說大致不成問題（是用事先約好的“可”或“否”的代字来电的），我才第二次赴粵見蔣。这次，我是以正式斡旋和平的姿态去的。

我第二次去广州，大約在八月二十三左右，我記得是到黄埔去見蔣的。当我坐去的小汽艇駛近蔣住处的碼頭時，蔣穿着一件綢長褂，手上拿一把白扇子，已經从住房的門里出来到了台阶上。小汽艇剛一靠岸，他就已經走过小草坪到艇旁来迎接了。他說：“你来了，好！”从这些細小的情节上，也反映出蔣那時早就盼望着我的

到来,也反映他望和心切;把前后情节联系起来看,更足証明蔣見我来从中轉圜,是喜出望外的。因为那時蔣的亲信都从表面揣測蔣的心理是要消灭李、白,于是绷着一股勁儿喊打,而蔣又不好洩他部下的气,这就弄得蔣毫无轉圜的余地,实际蔣的真心反而是要和。

当我向蔣談到在南宁和李、白商定的那些条款時,他在神情上并没有表示不乐意;談到要“中央”收回以前調李、白离广西的新职的成命时,他还說:“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們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們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們吃亏。”

但在談到要“中央”补助財政和复員經費时,蔣表示不愿意了。他說:“誰教他們造反的?他們既造反,还要給他們錢,那不行!”

我說:“广西地方穷,这次动用太大了,收不了場。国家要抗战,他們既是拥护“中央”,他們的問題就是中央的問題嘛!就象討亲娶媳妇,你把聘礼送过去,結果还不是連人带礼一起回来了嗎!碗里倒在鍋里,有甚么不好咧!”

蔣考虑了一下說:“好罢!多少給一点,但不能太多,可以考虑。”

到我把所有的条款說完了,最后他說:“好,大体就照这样办罢,你回去再同他們好好說說,要他們体会中央的苦心。”

我答应回广西后尽量同李、白說,并說我認为他們不会有什么問題的,希望“中央”早派大員去桂,以便早日解決問題,实现团结救国的目的。他就把将来拟派的“中央”大員的名字(包括程潜在內)告訴我了,他說:“我准备要頤云(程)、觉生(居正)、益之(朱培德)三人去一趟。”(实际上当时广西要求要“中央”派大員出面斡旋,除

了上面所說的用昭信守的理由外，同時是要爭得一個面子，表示對這件事情的解決，並非出自廣西的求和。）

我回廣西後，向李、白彙報了同蔣談話的情形，對六項條款大體不會有問題，並告訴他們不日就有“中央”大員來了，連大員的名字也告訴了他們，問他們還有什麼事情要考慮的沒有。

白崇禧就說：“沒有問題了，打個電報歡迎他們來好了。”李宗仁却扭扭捏捏，總想在六條之外還出點花樣，又不肯明白說出來（因為他自以為在北伐時，一、四、七軍聲望相等，蔣以廣東為基礎，他以廣西為基礎，共同北伐，因此在蔣家王朝中總想要維持“次高”地位，即第二把交椅的地位，自北伐以後到他从政治舞台上倒下去為止，這種思想一直支配着他），談來談去總不就范。我揣測他一定是在他的地位問題上還想做點文章，以致到了深夜還沒有作出最後決定。我心上有些不耐煩，就以夜深為辭告辭出來。可是，第二天，李宗仁一清早就來找我，他說：“算了罷，就這樣和了罷！”

於是，就在八月二十五日電程潛等，表示歡迎他們入桂和談。

自廣東方面因陳濟棠垮台，事變中心移到廣西以來，已經一個多月了。經過約四十天來的明爭暗鬥，雖然和的問題在骨子裡已經肯定了，但外面的鑼鼓一直是打得震天价響的。在廣西方面的黨派團體，天天開會宣傳，準備組織政府。翁照垣率領原十九路軍所編成的一個師，已進入欽廉方面，準備打開一個出海口，余漢謀又電廣西責難，要求廣西撤兵離開粵境。八月中旬，廣西空軍第三隊副隊長鄭梓湘等駕飛機逃廣州，並通電指責李、白；同時桂空軍司令林偉成又和廣西空軍二、三隊各一部分人員聯名通電忠告李、白“幡然改圖”。廣西本來只有幾架破飛機，根本沒有戰鬥力，就是跑了，對廣西局面是毫不相干的；不過這些事實，頗使蔣幫主戰分

子幻想广西会成为广东第二而垮台，故主战气焰益为嚣张，力请蒋下总攻击令，只是蒋始终要他们按兵不动，他们才莫可如何。

到李、白发电欢迎程潜等去桂和谈，主战派的陈诚却又转过来想把和平的功劳抢在自己手里。他对蒋介石说，“程潜、刘为章这种人搞和是靠不住的”，建议由他和宋子文出面直接同白崇禧谈判为好，蒋也答应了。于是陈诚就打电话约白崇禧来和宋子文与他会谈和，地点指定在香港、澳门、广州湾三处，随白崇禧选择，结果碰了李、白一个软钉子。李、白因我和程潜进行和谈已具有成议，对陈诚玩的新花样就置之不理。这样，陈诚等主战派又造谣言，说李、白讲和是骗人的，致一时武力解决的空气又为之高涨，程潜也不敢轻于赴桂了。直到陈诚等所造成的沉闷空气无法转圜时，程又电我说：“战云高起，是否桂方已改变前议？”我复电说：“只要蒋方不变，仍如前议。”程才和居正、朱培德等于九月一日飞桂，不料那天飞机到肇庆上空遇着恶劣气流，又折返广州，到九月二日才飞南宁开始和谈。事后程潜谈到这次事件时总是说：“我当时之主和，完全是靠你的嘛！”可见，在那时和战混沌不清的情况下，他对和谈是没有信心的。

在广西方面呢，如上所述，原来自陈济棠垮台之后，各党各派人物就集中到南宁，桂系也乐得利用他们作为反蒋抗日的政治资本。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宜园，李济深也住在那里。李宗仁的老婆郭德洁每天都到宜园去，一去就坐在李济深房里，以便打听各方消息。

当杨东莼代表救国会到达南宁时（杨到南宁前后只留一个星期），最初也被接待住在宜园。他到时打电话告诉我，我就到宜园去看他，了解了救国会对这次事件的大概意见。他问我广西的情

况如何,我說:“广西嘛,一塊錢小賭本,只拿出六毫子在桌面上賭,还有四毫子留在口袋里。”楊領會我的意思,就从宜園搬到我的住处来寄寓。

那时桂系邀請救国会派代表到南宁来,有两層用意:一、借救国会以自重,增加桂系的政治資本;二、知道救国会受中共領導,想从救国会代表方面知道中共对抗日和反蔣的态度。那时自称“中共駐港代表”的胡鄂公,是把抗日和反蔣同时提出的,因而桂系更有徹底明白中共政治动向的必要。正如前面所說,那时蔣、桂双方的形势是外張內弛的。蔣尽管装腔作势,但始終按兵不动,很欢迎我去从中調停。在桂系方面,虽在政治上运用各党各派来增加声势,发动学生游行示威来形成緊張局面,但仍在寻找和的途徑。上面已經說过,我之两次赴广州,就是这方面的具体表现。現在和已經有了头緒了,但要和就不但要說服部下,并且对各党各派也必須有个交代。楊东莼之来,正是和談已在骨子里开始的时候,所以李、白对楊这次来广西极为重視。楊到南宁的第二天,就由李、白接到当时的总司令部去談話。楊把救国会的主張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道理說了一遍,同时表示反对广西开府反蔣。李、白(尤其是白)觉得楊的話很有道理(其实是对李、白当时情况下很有用处),于是第二天、第三天又連續約楊到总部談話,这两次談話,李、白和黄旭初等都在座。第二次談話出席的还有廖磊、夏威等軍事方面的高級將領。第三次的談話,人更多一点,出席的有邱昌渭、王公度(托派)及各厅长等政治方面的人士。在这两次談話时,都首先由白崇禧发言,說“請楊先生談談救国会的主張”。楊以責任所在,就都把头一次同李、白談过的那一套說了一遍。楊每次从总部回来,都同我分析研究,最后的結論是:李、白是借楊的話来轉弯,以便为和平

扫清障碍。

正在这个时候，宜园的各党各派鬧着要在广西开府，他們內定李济深当主席，胡鄂公任秘书长，彭澤湘也安排了一个什么名义。在楊东莼到南宁的第五天，总部召开各党各派各团体的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胡鄂公、彭澤湘、刘蘆隱、蔡廷鍇、張文、邓龙光、李任仁等約六、七十人。會議由李济深主持，李宗仁坐在李济深的右手。我記得在宣布开会后，有的在发言，因李济深的眼鏡上的螺絲釘脫下来了，李宗仁却拿出小刀在替李济深修理眼鏡，会場景象簡直不象是討論开府那样十分严重的問題似的。白崇禧則坐在长會議桌的一端，手拿着一叠电报，一面看电报，一面在电报上写些什么，并且在整个會議時間內，离开会場到外面去了好几次，对开府这样重大的問題，也好象是若无其事似的。至于黃旭初、夏威、廖磊、邱昌渭这班人，在会場上根本是呆若木鷄，一言未发。大約三小时的會議，自李济深宣布开会和討論議題过程中，爭先恐后地发言的，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言的，就是胡鄂公、章伯鈞、彭澤湘、刘蘆隱这些人。他們一致強調要立即組織政府，意見可說是一边倒。直到快要散会的时候，白崇禧站起来說：“还是听听救国会的意見罢，請楊东莼先生談談罢！”我正坐在楊的旁边，觉得关键已經在他的身上了，兴奋地从桌底下踢了他一脚。楊随即談了約半个小时，內容同以前和李、白談的完全相同。楊說完之后，白崇禧沒等別人发言，就向李济深說：“好罢！既然如此，关于开府的問題，还是从长計議罢！”这时，李济深也只好說：“以后再談罢！”就宣布散会。从这次會議以后，就再沒有开过这样的大会了。

以后和議漸趋成熟，“中央”和談使节也将定期来桂，李、白对

和談問題分別進行了一些個別聯繫說服工作。李、白那些部下是唯李、白馬首是瞻的，當然不成問題。托派的王公度等，雖然自己有陰謀，但沒有得逞，也只能順着李、白的意思去作，等待以後的機會再說。（托派以王公度為首，其下有謝蒼生、張威遐等，他們結成一個集團，其勢力分布在廣西各个方面，而以王公度等人包圍李、白，參與許多內幕活動。“六一”事變時，他們也同胡鄂公等一樣，主張西南開府反蔣，只是各人的用意不同罷了。“六一”事變結束後，王到上海活動了好幾個月，其內容雖不詳，大概跟反蔣活動，跟托派當時整個活動有關。抗戰爆發後，王的陰謀活動被揭發，引起桂系許多將領的不滿，李宗仁與王的关系最密切，設法袒護不果，最後組織特種法庭審問，卒處王以死刑，同時被處死的和被判处徒刑的還有若干人。）

但對各黨各派（救國會除外）進行說服時，由於李、白不好把背着他們談和並且已成定局的情況說出來，所以只對他們說：現在“中央”有些大員出來斡旋和平，碍于面子，不好過於拒絕，姑且允許他們來談談，如果條件適當，我們也可以讓他們和。各黨各派（救國會除外）有些不滿意和的人，不知其中底細，以為還是試探性質，就想阻撓和談的實現，因為他們原來是想利用廣西的實力作為政治資本，來無本起利地大干一番的，如果一和，他們就搞不成了。他們認為廣西利用他們把鑼鼓打響了，現在廣西又要出賣他們，因此，對和談心懷不滿。後來程潛等代表到南寧時，有些人就拿着請願書去請願，提出些苛刻的要求，當着他們痛罵蔣介石，想借此使和談搞不成功。作為蔣介石代表的居正、朱培德等氣得只叫“要回廣州去，不談了！”他們認為這是廣西玩的鬼，認為原來已經談妥六條範圍，他們才來的，既然李、白歡迎他們來，現在又變卦，出這些

花样，使他們从中作难。因此，他們深悔这次不該来，居正气得一句話也不說，只叫“要走！”朱培德也說：“我自信平生是比較有修养的；可是，这次使我气卡在喉管里下不去！”只程潜还保持着慣常的沉默。

后来經過許多解釋，說明各个党派或个人提出的不同意見，并不是共同的決議，也不是当局的正式文件，都不能影响大局，和議仍根据原議基础进行。这样解釋清楚之后，就根据六条原則，照例通过談判形式加以表面化，再由程潜等照例电蔣請示，蔣自然复电同意。程潜等就于九月四日飞返广州向蔣复命，和平实现了。

和平实现后，隨即开始了和平条款的执行。蔣介石于九月六日以国民政府名义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綏靖主任，白崇禧为軍事委员会常委(后来还兼第五路軍的副总司令)，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紹竑仍回任浙江省主席，其他关于复員补助等具体問題也均有了头緒。李、白于九月十日电程潜等表示接受新命，并定于十六日宣誓就职，請“中央”派員監督。蔣就派程潜、黄紹竑于十三日飞南宁監督。李、白等于預定日期举行宣誓就职典禮，并于就职前(十四日)发表和平通电，表明服从“中央”，大意是說：他們“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驅使，爰有前次請纓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請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閹牆之禍将起，內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咸惧。所幸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緒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大員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已徹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項意見，并全部俯予接納，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云云。

李、白就職后，对广西善后問題、部队編遣复員等問題都已具体决定，并即着手进行部队复員、整編、及軍政人員人選的安排、学校之复員開課等事。省会也决定于十月十日前迁往桂林，所有机关均限于十日前一律在桂林开始办公。所有从外地来参加这次事变的各党派各界人士，亦先后礼送出境。

蔣在这时也已陸續撤兵，他本人于九月二十八日离粵飞赣，两广事务另設广州行营，由何应欽負責处理。一場軒然大波，到此才告結束。

由于我对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担負了保証广西履行条件的义务，特別是要保証在“中央”决定抗战时广西應該如約出兵，因此，在事变結束后，我为了保持在蔣、桂之間的超然地位，便于公正执言，就决定不受任何方面的职务，于十月初由南宁經广州去湖南南岳休养。

我在南岳住了大約两个多月，西安的十二月事变爆发，蔣介石被扣了。这时，李、白由桂林来电，要我下山赴桂林一趟，何应欽也从南京来电，希望我劝广西当局不要趁这时有什么意外行动（其实何是別有企图的），并約我去南京一談；救国会的楊东莼又由上海来电，說他要到南岳来，叫我等他。

这时，何鍵也上南岳来探听消息了。当时我对广西的态度尚不明了，同时又在两广事变时領教过他的作风，便沒有把我心里所想的告訴他。

我等到楊东莼来后，知道了救国会对这次事变的態度，然后同他去桂林見李、白。这时知道胡鄂公、章伯鈞等已到了广西，他們极力要李济深乘机推动李、白起事。我同李、白商量的結果，認為不能輕举妄动。楊东莼反对胡鄂公与章伯鈞等的作法，到梧州戎

據去看李濟深，要李不要上胡等的當。我就到南京去見何應欽，向何轉達了廣西方面的意見，認為國難當頭，不能乘機增加困難，引起日本人乘虛而入。何應欽對廣西的態度表示滿意。

我到南京沒兩天，蔣介石恰從西安被釋放，回到了南京。記得那時他找我去和他見面時，因他在西安摔斷了腰骨，還躺在沙發上不能動。他對廣西當局這次沒有乘機出事，表示很滿意，又要我和程潛一道去廣西，代表他表示慰問。

我同程潛從桂林回南京後，看當時形勢一時不致有抗日的實際舉動，決定趁此時去歐洲考察。於是，我就去上海住了幾個月，一面治裝，一面辦理出國手續。正當我準備完畢、將要動身出國時，“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了。

蔣隨即來電要我去南京，當我見到他時，他說，現在要抗戰了，要我去廣西促李、白履行出兵諾言。我答：“一定辦到！”立即乘飛機赴桂林見李、白，一見面就談妥了，馬上出兵。第二天，我就同白崇禧、李任仁飛南京，決定共同抗日。由於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而保留下來的一點戰鬥力量，從此投入了抗日戰爭的前線。

一九六〇年一月

一九二八年粵桂戰爭

黃紹竑

粵桂自一九一五年以來就斷斷續續地發生戰爭。一九二一年以前，是舊桂系陸榮廷與廣東之間的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是新桂系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等與廣東之間的戰爭。我現在所寫的是後一階段的第一次戰爭。

這次戰爭是由於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等反對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把持下的南京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並反對桂系黃紹竑伸張勢力到廣東而引起的，但是情形很複雜，還牽涉到蔣介石和李濟深。當時一方以李濟深為首，軍事上有黃紹竑（桂軍）、陳銘樞（粵軍）、陳濟棠（粵軍）、徐景唐（粵軍）、舒宗鑾（粵海軍）等；蔣派政客則有戴傳賢、朱家驊、邵元沖、曾養甫等。另一方以汪精衛為首，參加的有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繆培南、吳奇偉、許志銳、李漢魂、朱暉日、李福林、薛岳、黃鎮球等。以後的幾次戰爭，情形更為複雜，兩方面有些人物彼此互換了位置，成為交叉循環式的混戰，而蔣介石則是戰爭的操縱者。

新桂系初起的形勢

一九二〇年侵入廣東的舊桂系陸榮廷等被粵軍逐出廣東後，次年粵軍進攻廣西、討伐陸榮廷，占領了廣西的各重要城市，陸榮

廷等逃往上海、苏州，旧粵桂战争至此结束。这时李宗仁、黄紹竑等乘机崛起，到一九二五年的秋天，他们驱逐了侵入广西的唐繼堯的滇軍，肃清了陆榮廷的残余势力，从而统一了广西。广西的统一，李宗仁、黄紹竑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粵軍李济深、邓演达、陈銘樞、陈济棠也在政治上、軍事上直接間接给了他们不少的支持。这就为以后两广合作、两广统一和桂系参加大革命、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直到一九二七年底，两广之間沒有战争。

一九二七年秋天，桂軍李宗仁、白崇禧部队与蔣介石的何应欽部队在龙潭附近(南京下游)歼灭了孙傳芳的渡江部队后，李、白就勾結西山會議派鄒魯等以国民党中央特別委员会的名义把持南京政权，蔣介石被迫下野赴日本。而黄紹竑則与李济深、陈济棠、薛岳等击败了八一南昌起义后回粵的葉挺、賀龙率领的部队，桂系黄紹竑的势力从此伸張到广东。因此桂系就成为蔣介石、汪精卫等共同反对的目标。

黃琪翔第四軍回粵以后

四·一二事变后，到七月底汪精卫、陈公博等也在武汉漸漸暴露了反共的面目。但他们既要反对南京的特別委员会，又不願在武汉屈居唐生智之下，他們就想利用張发奎的第二方面軍(包括黄琪翔的第四軍、陈銘樞的第十一軍、賀龙的第二十軍)去打南京，創造局面；各軍都到了南昌、九江地区。汪精卫提出了“夾攻中的奋斗”的反动主張，即是既要反共，又要反对南京；他們政治上的口号是“护党”，他們認為国民党已被南京特別委员会篡夺了。但共产党领导下的葉挺、賀龙部队于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了，这样就打烂了汪精卫的計劃。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入粤，蔡廷锴率十一军一个师东走福建，去找陈铭枢；黄琪翔则率第四军沿赣江与东面的叶、贺部队平行南下，彼此互不侵犯。正当黄绍竑、陈济棠、薛岳等与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梅对战的时候，黄琪翔的第四军就悄悄地进驻广州。当第四军到赣南的时候，李济深派人欢迎第四军回粤。等到第四军到了广州以后，李济深即找黄琪翔商量，要他出兵协同黄绍竑、陈济棠、薛岳等去打叶、贺部队，黄琪翔当时提出了交换条件，先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疏远桂系；但李济深没有答应，他就不肯出兵，在广州坐观成败。

在黄琪翔等的打算，以为黄绍竑等部队未必能把叶、贺部队打败，并且有可能假手叶、贺部队来消灭黄绍竑等；即使叶、贺部队把黄绍竑消灭了，叶、贺部队的力量仍然有限，他们再出兵去打叶、贺部队，仍然可以获得胜利的。如果这样，以后广东的局面就完全由他们掌握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黄绍竑、陈济棠、薛岳等把叶、贺部队打败了，于是李济深、黄绍竑就成为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敌对目标。他们首先对李济深施加政治上的压力，要求把李济深的亲信馮祝万的财政厅长换给他们的亲近鄒敏初，把朱家驊的民政厅长、曾养甫的建设厅长及农工厅长都换成他们的人，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也由邓彦华换成第四军师长朱晖日。在军队方面，他们又秘密与第五军李福林联成一气。薛岳、黄镇球两师原来是李济深的基本队伍，他们也早和黄琪翔有了秘密勾结。

十月初，我由汕头回到广州，李济深把种种情形告诉我，问我以后怎样应付他们无厌的要求。那时我觉得我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军队分散，广西空虚，不能不先把军队主力向广西边境撤退，仅韶关还留有一个师。我想脱身事外，看看以后的演变，同时也想回

广西从事“建設”。因此，我对李济深說：“他們要求什么，就給他們什么好了！横直广东的事由广东人自己去搞，你是他們的老长官，你虽然是广西人，但你不是桂系，他們不会对你有什么恶意。”李济深听了我的話，默然很久，不說什么。我临回广西之前，張发奎、黃琪翔等还到我家里去談。我把撤兵回广西的情形和以后从事广西“建設”的意願告訴他們，并希望他們也把广东建設好，表面上大家談得很融洽。次日我就回广西去了。我以为这样的退讓，問題就沒有了，战争就可以避免了，殊不料問題还在后头呢！

汪精卫回粵的阴谋

汪精卫、陈公博等自八一南昌起义、張发奎的第二方面軍瓦解之后，打南京另創局面的計劃流产了，張发奎也脫离了部队，武汉便成为唐生智的独霸局面。国民党上層人物如譚延闓、孙科、程潛、陈友仁等紛紛离开武汉，有些投奔了南京，而汪精卫和其亲近大約是十一月上旬就回到了广州。他既反对南京特別委员会，亦不滿武汉的唐生智。他原来是国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国民党中他是不肯以第二人自居的。他想利用張发奎、黃琪翔回粵的实力，以国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名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員联席會議，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南京特別委员会对抗，来維護所謂“党的正統”。那时李济深是国民党中央政治會議广州分会主席，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軍总指揮，汪精卫的这个打算不能不商得他的同意。究竟他們怎样商量的，我远在广西，一点也不知道，而事实上李济深是不同意的。于是他們就定下了送走李济深、騙黃紹竑来广州加以杀害的阴谋。

抗战时期，我与李济深、張发奎、吳奇偉等去参加蔣介石召开的南岳軍事會議。那时我与張发奎等已經合作了好多年，混得很熟，彼此无話不談了。大家在火車上談起一九二七年广州的事情。我問張发奎：“向华（張发奎号），那时候你們为什么要把李任公赶走呢？”張发奎說：“我对任公劝了不少次，流了不少眼泪，任公都沒有答应，”他不說明劝李任公的是什么内容。李济深笑着說：“我当时不知道你們想做什么，叫我怎么答应呢！”当然李济深不会不知道他們想做什么的，而是不同意罢了。我又問吳奇偉：“梧生（吳奇偉号），假如那天晚上（十一月十六日晚）你把我拿着了，你怎样处置呢？”他說：“唔唔，恐怕对不住了。”說得大家哈哈大笑。唉！这几个軍閥的大笑里面包含着多少人的性命和多少人的哭声啊！

現在我才清楚：汪精卫他們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別委员会、反对桂系，但李济深不同意，于是他們就决心把他送走。当时李济深由汪精卫陪着、实际上是監視着过香港，馬上搭船到上海。表面上說是他們两人去上海同南京方面交涉取消南京特別委员会，实际上是因为李济深是張发奎、黃琪翔等的老长官，他在广州，不好怎么样做，所以就把他送走了。他們把李送走以后，就把我騙到广州，打算动手捕杀。

蔣、汪勾結和当时我对他們的态度

蔣、汪之間素来是有矛盾的，但为了要反对桂系，他們就統一起来了，勾結起来了。蔣介石因为受西山會議派和桂系所把持的南京特別委员会排斥，下野到日本。汪精卫回到广州后，蔣就派宋子文去广州，在葵園汪精卫公館商議共同倒桂系。当孙傳芳大举渡江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蔣介石曾秘密电何应欽把第

一軍部隊向浙江撤退，不与孫傳芳作戰，說是局勢不利，撤退后准备再革命，听由李宗仁的第七軍单独对孫傳芳作战。蔣介石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想假手孫傳芳消灭桂系部队。但是由于何应欽当时已与桂系有了勾結，不肯坐視第七軍孤軍作战，沒有把第一軍撤退，于是第一軍与第七軍合力把孫傳芳渡江部队在龙潭附近（鎮江、南京之間）完全歼灭。龙潭之役在国民党与北洋軍閥的战争中，战績是很大的，但蔣介石却很不高兴，后来甚至要把龙潭战役的紀念碑毀了。蔣介石从此一直不喜欢何应欽，并且更加嫉視桂系。

汪精卫自从他行刺前清攝政王之后，我就景仰他的大名了。一九二六年春，他曾以国民党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身份同譚延闓、甘乃光来梧州訪問，那时我就被他虛伪的面貌所迷惑，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的，后来两广統一局面的促成，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两广統一會議中，我觉得他是帮我的，因此我对他更有好感。

蔣介石以前与我接触比較少。我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参加上海反共會議后，又和蔣介石同車去参加徐州會議。在火車上我对他說：“象曹万順、周凤岐等北洋投降部队为什么还原封不动地放在第一軍指揮的系統內呢？为什么不把它繳械或分散撥給各軍呢（我当时所說的“各軍”是指第一軍和第七軍）？”我說，这样的处置是不徹底的；又說，統一广西战争的时候，我們对于旧軍是一律繳械或分散給自己的基本部队补充，以壮大自己基本部队的力量，因此广西才有这样的安定局面。其实，北伐后蔣介石对于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早就怀有疑惧。这几个軍虽然地位与第一軍相等，但战斗力、战功和威望都在第一軍之上，在蔣介石看来，这是他实行独裁的主要障碍，不如北洋投降部队的馴服可靠。我說要把曹万順、周

凤岐等部队分散给第七军补充，正好触到他的隐处，他当然不能接受，而且很严肃地说：“全国的局面怎好与广西相比呢！你要知道全国各省各地未接受三民主义的部队有多少呢？他们如果看到曹万顺、周凤岐的结果不好，谁肯再投降呢？他们必定死战到底，革命就不能迅速成功。你不懂得政治上的道理，以后这种意见不要再说了。”我一向是以两广统一和反共的功臣自居的，那时并不把蒋介石看得很大。我碰了蒋介石这个钉子，心里很不好过，对他很有反感。

可以说，那时候我对汪精卫的信仰比对蒋介石好一些。正因为如此，我便上了汪精卫的当，几乎把命送掉。

汪精卫骗我去广州的电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我正在广西柳州一带巡视，忽然接到汪精卫个人署名的电报，说有重要问题要同我商量，希望我立刻到广州去面谈。电报里虽未说明要商量什么问题，但我也料到他回广州是想在广东另搞政治局面，而我对这个问题是相当有兴趣的。我素来就有两广小朝廷的幻想。当出师北伐、举行会议的时候，我就曾主张先把两广搞好，然后出师北伐，因为那时候在我看来，两广刚刚统一，基础是不稳固的。鲍罗庭（苏联政治总顾问）、季山嘉（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等都反对我的论点，我也就放弃我的主张，赞成北伐。但我自己并不肯亲自率兵北伐而是由李宗仁以第七军军长的名义率领桂军（第七军）的一半参加北伐，我自己则有意留在广西，想把广西搞好，作为万一失败的后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长江方面闹得乱糟糟，我想北伐是不会成功的了，还是先搞好两广再说吧。我对汪精卫既有好感，张发奎、黄琪

翔都是保定同学，也还没有恶感，同时，我认为两广局面由清一色的两广人来搞，比之同蒋介石的外江帮一起搞，可能搞得好一些。因此，我就立刻复电，说等候轮船，即行前往“聆教”，但并未说明那一天动身。

我之所以毫不怀疑地答应前往广州，首先是因为汪精卫在广州开府的主张适合我两广小朝廷的幻想，并且对汪精卫有好感。我当时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我想汪精卫既然想在广东搞局面，必然要取得广西实力派的拥护，他如果先得罪了我，局面就搞不成，这种情况他们是应该考虑到的。这就是我认为到广州去没有危险的可靠的保证。因此，虽然电报没有李济深的署名，虽然李济深并没有来电阻止或促我前往，我也就坦然不疑，很快地去了。当然，他们既然定计送走李济深，驱我来广州加以杀害的电报决不会让李济深知道的。

十一月十六日广州事变

我乘专轮到达广州的时间，是十一月十六日的中午。我一到就打电话给汪精卫要去见他，他约我下午四点钟到葵园见面。我准时去了，在那里见到汪精卫、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一班人，但是看不到李济深及他左右的任何人。我一进去，他们都愣住了，神情十分尴尬。我问汪精卫：“李任潮主席呢？”汪精卫说：“任潮先生因有要事，马上就要到上海去，不在这里。”他也没有说明他自己要同李济深前去上海。他又说：“季宽先生，你初到，路上辛苦了，请你休息一下，我们改天再谈吧。”其余的人一言不发，好象心里有什么重要事情似的（后来才知道，他们当时正在准备欢送李济深去上海）。我看神情不对，就辞了出来，一路上盘算：为什么请我来商

量重大問題而李濟深又走了呢？為什麼不讓李濟深與我見面呢？為什麼他們那班人用這樣的神態對我呢？

我想來想去，這回來廣州多半凶多吉少，就打算搭船逃到香港，但是省港的夜班船已經開了，只好回公館里等到明天再說。入夜，我同妻子坐在小阳台上閒談，看見馬路上有些人坐着敞蓬汽車，速度很慢，時時在我的門口經過，向我公館里探望。我的妻子說，“天氣已經很涼了，為什麼還有這多人遊車河（廣東話，坐汽車乘涼的意思）？”我心里動了一動，恐怕是他們已派人暗中監視我了，但又不敢對她說。我倆談到十一點鐘，就上床睡了。忽然馮祝萬到來要見我，我的侍從人員告訴他說我已睡了，可否明天再見。他說，無論如何要立刻叫醒我一見。我披衣下樓，在扶梯上與他相值，他拉着我的手匆匆忙忙對我說：“得到確實的消息，他們今晚將有舉動，目標完全在你的身上。你不管確實與否，今晚一定要避開為妥”；又說“任公已被迫走上海，我深夜冒險到來就是為通知你。”他說完就走了。

我平日對馮祝萬相當敬服，他為人持重，不苟言笑，他說的話我是相信的；加以有日間的情況和印証，看來這個消息一定是確實的。於是，我就忽忽改裝，一個人逃出後門，也沒有對我妻子說到什麼地方去，恐怕她知道了，會被他們追問出來。那時正是十一點四十分，我象喪家狗、漏網魚一樣，逃到西關我的秘書石楚琛家里，時時打電話回家里問，知道還沒有什麼事情。到夜里兩點鐘，槍聲就必剝必剝不斷地响了，電話也不通了，才知道事情出在我家里。我那時心里想，我雖然不是聰明一世，也就糊塗一時了，竟然上了汪精衛的騙局。他們認為我是桂系的幕後主持者，早就想搞我，而我自己一點也沒有警覺。

我在石楚琛家里，終竟是危險的，因為他們會派兵到與我有關係的人家里來搜查的。於是，我又一次改裝，變成普通商人模樣，天未亮就同石楚琛步行到西村火車站，想搭火車到韶關，因為那里駐有黃旭初的一師桂軍，但是廣州至韶關的火車不開了，車站軍警林立，不敢進去。我也聯想到廣三火車也不會開，就又逃到南澳（廣州西南方的小鎮）躲了半日。挨到下午，再回到長隄，想看看香港船開不開，好設法逃走。長隄到處都貼滿了“歡送汪主席李主席北上”、“打倒侵略廣東的黃紹竑”、“打倒南京特別委員會”、“打倒桂系”、“打倒西山會議派”等等五顏六色的標語，我才知道這把政治的大火燒在我的身上了。省港輪船仍然照開，我趁臨開船、人最擁擠的時候擠上了一隻外國船逃到香港避難。下午五點多鐘，這條船就象擺脫了釣絲的大魚向珠江里游去，我就象出籠的飛鳥飛到天空，他們再沒有機會來捉我了。我在甲板上面對廣州吐了一口氣，心里想：“此仇不報，非丈夫也，”等着吧！

在船上碰到我的妻子，她說，昨晚兩點鐘，好多軍隊包圍公館，把憲兵連繳了械，並打死了好幾個人，是由姓吳的師長來搜查的。他審問我的妻子，問我逃到什麼地方去了，還加以種種威吓。因為她的確不知道，才把她放了，但僅許她抱了孩子同她的母親出來，一切財物都不准帶。

我們在香港的布置

我到香港住在以前廣州市公安局局長鄧彥華的家里，陸續逃到香港的人有馮祝萬、張文（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副參謀長）、李民欣（第八路軍總部總參議）、鄧世增（第八路軍總部參謀長）、徐景唐（十三師師長），還有戴傳賢、朱家驊、邵元沖、曾養甫等。舒宗鑑率

領飛鷹艦一路開火，打出虎門，也到了香港。大家都來相見，首先是談論事變的經過，其次是布置以後的行動。

他們說：“汪精衛回廣州後，他們天天逼李任公要他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反對桂系，並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聯席會議；但李任公不贊成，他們就強迫他離開廣州。李任公於十六日上午乘坐飛鷹軍艦由汪精衛作陪去香港，準備到港後當日就轉船去上海，但飛鷹艦走到黃埔附近時機器壞了，於是又折回來改乘火車去香港。那天三四點鐘他們正在葵園集會，準備去送李任公，不料你來得這樣快，忽然闖到了。他們本來就可以在那裡把你扣留起來，但葵園是汪精衛的公館，恐怕這樣作，汪精衛的面子不好看，同時又要去送李任公動身，所以當時不同你說什麼，讓你回家，然後晚上再到你家圍捕。如果把你拿着，就可能當場打死你，橫直那時候你已是籠中之鳥，有翅也不能飛出廣州去了。”

大家談起，都很憤慨，於是除打電報到上海報告李濟深外（那時他正在船上），並決定由舒宗鑑同馮祝萬、鄧世增乘飛鷹軍艦去汕頭找陳濟棠，把實情通知他，要他戒備。據說陳濟棠當時已有些動搖，準備走路，他們到了之後才穩定下來。此外，又由飛鷹艦把徐景唐送回阳江，掌握他自己的部隊；戴傳賢、朱家驊、邵元沖、曾養甫去上海，把情形報告李濟深并轉知蔣介石和有關係的人；又電駐韶關桂軍黃旭初戒備并向桂邊撤退。我在香港報紙發表談話說明此事經過：首先說明我一九二七年出兵到廣東，是奉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深的命令，我的部隊是第八路軍指揮系統下的，來廣東是奉令協防，並不是我侵略廣東，葉、賀部隊在潮梅失敗後我就撤兵回廣西；其次說明我在廣東除擔任第八路軍副總指揮之外，我沒有委任或推薦過一個縣長或財政稅收官吏，並說明我的軍隊初到廣東的

时候軍餉都是广西带来的,后来因广西货币在广东不能通用,每月才由广东补助二十多万元(到一九二九年才增加到三十几将近四十万元);最后說明十一月十六日的广州事变,是由于他們是想为在潮、梅失败的葉、賀部队报仇(那时候我对他們与共产党的关系还不很清楚,这样的說也是很自然的)。不久吳稚暉也在上海发表談話,譴責汪精卫、陈公博、張发奎、黃琪翔等是准共产党,广州事变是为葉、賀部队潮、梅战败报仇。他說,如果不然的話,屋簷上一滴水怎么会恰好滴入油瓶口里呢!那正是四·一二事变后反共高潮的时候,这种說法在反动政治上是有市場的(吳稚暉是李济深的兒女亲家,是汪精卫的死对头,汪精卫等常把吳稚暉叫做“吳老狗”)。

我見在香港沒有什么事可做了,就想設法回广西。香港、梧州間本有直通的外国輪船,十一月十六日事变后广州方面在三水、河口、肇庆等处对于港、梧輪船檢查得很严,我不敢走这条路。于是我找到陈炯明部下的黃强(他是法国留学生,与法国人很熟),由他介紹,取道安南的海防、河内,到了桂边的龙州,再由龙州坐小汽船,沿途不停,直下梧州,佈置軍事,准备打仗。但用什么名义打仗呢?他們正罵我侵略广东,难道就这样的出兵去打广东嗎?总要有个政治上的名堂才行。

广州公社起义

十一月十六日事变,張发奎、黃琪翔的目标既然是我,而我又僥倖走脫,回到广西老窠,这是他們最大的威胁。于是他們就把第四軍的主力調到西江扼守,由軍长繆培南坐鎮肇庆,以防桂軍东下;其余部队以一部分調去东江方面監視陈济棠,以一部分調到四邑方面監視徐景唐;广州方面仅留第四軍教导团和朱暉日的警察

維持治安。第四軍教導團原有很多共產黨員，“八一”南昌起義后張發奎、黃琪翔並沒有把他們清除出去。十一月十六日事變前后，香港各地的共產黨員也公開或秘密地在廣州集合；張、黃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們以為他們的政治主張和行動是進步的，是中立的，還存着可以領導共產黨或與共產黨合作的幻想，因而他們沒有作任何的防范。共產黨以張太雷、葉挺等為首，便在十二月十二日在廣州突然起義，占領廣州市區，圍攻他們的司令部，并把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等與蔣介石并列，懸幾萬元的重賞通緝他們，要他們的腦袋。這是他們所料想不及的。他們這時候不能不把以前調出去防黃紹竑、陳濟棠、徐景唐的部隊一起調回廣州來鎮壓起義。

廣州公社的武裝力量是有限的，當然經不起他們各方面大軍的攻擊。在他們鎮壓廣州公社起義的時候，焚燒了很多房屋，屠殺了很多。那時他們對共產黨恨極了，比之最初反共的人還恨得厲害。他們以為廣州起義的共產黨極大多數是外省來的，因此聽到操外江口音的就當作共產黨殺了，外江人因此被害很多。這是廣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災難，人們對這次災難，很少人歸咎於共產黨的暴動，極大多數人則歸咎於汪精衛、張發奎、黃琪翔，認為是由於他們趕走李濟深、黃紹竑而引起的，因而把這次事變叫作張（發奎）、黃（琪翔）廣州事變，把一切的責任都推到他們身上。

大戰前雙方部隊的情況

當時雙方軍隊實力是這樣的：在李濟深方面的有桂軍黃紹竑的第十五軍三個師（師長黃旭初、伍廷飭、呂煥炎），兩個獨立團（黃紹竑部原來是後方第七軍部隊，那時已改編為第十五軍），徐景唐的一個師，陳濟棠的一個師和舒宗鑑的飛鷹軍艦。舒宗鑑在廣東

海軍里頗有聲望，對於對方的海軍艦艇頗有影響，此外，“八一”南昌起義後進入福建以圖自保的陳銘樞的第十一軍有兩個師（師長是蔡廷鍇、黃吉勝，蔣光鼐是副軍長，戴戟似乎是參謀長），他們也想借着這個題目趁着這個機會染指廣東的地盤；十二月十二日廣州公社起義後，蔣介石、李濟深也可能有電報要他們開回廣東打張發奎、黃琪翔。因此，他們也算是站在李濟深方面的。在對方方面的則是第四軍繆培南的三個師（第四軍原來是三個師，南昌起義後，周士第帶走了一個師，剩下兩個多師和一個教導團），薛岳一個師，黃鎮球一個師（以上兩師原來是李濟深的基本隊伍，張發奎、黃琪翔回粵後才投過去的）。此外則是李福林的第五軍兩個師。李福林原是廣東三角洲的土匪頭子，民國以後投誠改編的。他是四面擺的隨風竹，誰力量大、誰占領了廣州，就服從誰。從龍濟光時代起，直到陸榮廷、陳炯明以及大革命時期，他都是這樣應付的；只要不動他三角洲的地盤不調出去打仗，他都順從的。他以河南王自居，是那一帶地方治安的維護者。有人告發他部下在他防區內搶劫，他集合官兵訓話，開口就罵：“契弟（土匪對同道晚輩的稱呼，也是粵語罵人的口語），在尼處（粵語，這裡）吃，又在尼處屙，要屙就去遠一些啊（就是說防區內是不許搶劫的，要搶就去遠一些地方搶）。”他這次以同樣方法參加在張發奎、黃琪翔一起，但力量是沒有的。海軍方面，他們除了中山艦可以出海之外，還有二三十只內河兵艦，都是以廣州的政權為轉移的，雖然一時依附了他們，並沒有什麼用處。因此，在數量上看，對方似乎占優勢，而實際上是處於劣勢，尤其是張發奎、黃琪翔在鎮壓廣州公社起義之後都離開了部隊，對於他們的士氣影響很大。

繆培南的战略

广州公社起义虽被镇压了，但張、黄等由于各方面的谴责，即以前与他們有勾搭的蔣介石亦不敢公然维护了，他們在反动的政治上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陈公博、張发奎、黄琪翔于是离开广州，把军队交给了第四軍軍长繆培南指揮作战。他們在軍事上也处于各方面受包圍的形势。据说他們事前定有三个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全力先打西江，把黃紹竑部队击败，占領梧州后，再回师去打东江的陈銘樞、陈济棠部队。这个作战方案比較危險，因为如果不能迅速把黃紹竑部队徹底击败，陈銘樞、陈济棠的部队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占領广州，他們就有完全被包圍而被歼灭的危險；而那时黃紹竑的力量最强，又有广西作后方，是很难迅速击败的，因此他們沒有采用这个方案。第二个作战方案是放弃广州，以全力出击东江，把陈銘樞、陈济棠打败，然后回师广州，乘黃紹竑兵力分散的时候把桂軍歼灭。这个計劃就我看是比較好的，即或不能取胜，也可以向江西逃走。蔣介石看到这个形势，事先已派人与他們接头，在江西为他們准备好退路和照顧。于是他們就采用第二个作战方案。第三个方案是退出广州，据守韶关、南雄，看以后形势的变化，或是作战，或者向赣南安全撤退。照我看来，这个方案最稳，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着，因为我們很难应付。但是他們不肯这样消极地做，他們仗恃第四軍北伐时“鉄軍”的威名，想把我們各个击破，然后汪精卫、張发奎、黄琪翔等仍然回广州开府。

我們的战略部署

在广州公社起义之前，我們在战略上是采取防御待机的态度。

虽然他們把李济深送走了，但是捕杀我的計劃沒有达到目的，同时社会上知道內容的并不很多。虽然我在香港发表了十一月十六日事变經過的談話，吳稚暉在上海发表譴責他們是准共产党的談話，而在当时社会上看来，不过是一方面控訴之詞罢了。他們在政治上、軍事上还不很孤立。那时国民党内部的战争还没有开始，彼此都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发动战争，可以说那时彼此都有些顧慮，因而都是采取防御待机的态度。我把入粵桂軍集中在梧州、怀集的边境上，張发奎、黃琪翔也把主力集中在肇庆、四会，彼此对峙着。我們等待什么呢？第一是长江方面虽然李宗仁、白崇禧同何应欽把孙傳芳的渡江部队歼灭了，而唐生智的部队据說与孙傳芳有默契，正向长江下游压迫，醞釀大战。第二是蔣介石的态度尚不明瞭，他对于在福建的陈銘樞十一軍的影响很大，陈銘樞是接近蔣介石的，而在汕头方面的陈济棠，在四邑方面的徐景唐，态度尚不十分坚决，必須等待时机成熟，才好作战。

等到十二月十二日广州公社起义以后，由于他們进行了殘酷的鎮压，广州受了空前的大劫，于是各方面都把責任推到他們的身上，他們便成为各方面的共同譴責的目标，連事前与他們有勾結想消灭桂系的蔣介石，也不能公开維護他們了。这时长江方面战事已經发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軍隊把唐生智的部队击败，向武汉进攻。以上这些情况，我認为是十分有利的，于是就以討伐張（发奎）、黃（琪翔）为名，向广州进军。黃旭初、呂煥炎两师由怀集經广宁、清远，沿粵汉鉄路南下攻广州。我率伍廷勳师及两个独立团沿西江会攻广州，毫无阻碍地就占領肇庆、三水、河口。我到达三水、河口的时候，李福林已派代表在那里欢迎，向我說明李福林是受了汪精卫等的騙，迫不得已才与他們搞在一起的，并且說李福

林是素来反共的，是拥护李主席（济深）的。他还报告說，張发奎、黃琪翔已离开广州，軍隊交由繆培南率領。他們已經按照原来的作战計劃，放弃了广州，以全力出击东江，先消灭陈銘樞和陈济棠的部队，再回軍广州来消灭黃紹竑和徐景唐的部队。

东江大战

我得到李福林代表报告，清楚知道敌人的計劃和行动，觉得時間非常紧迫，如果稍有迟滞，就会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險，于是立刻改变我軍的計劃和行动。我們原来的計劃是分进合击、在广州会师的，現在敌人既放弃广州，去东江迎击陈銘樞、陈济棠，西江方面的各部队就沒有到广州的必要了。于是我电令已到达清遠县的黃旭初、呂煥炎两师不要再向广州南进，而逕由清遠經花县、增城向河源急进；伍廷飈師也不在广州停留，由水路乘船到石龙登陆，与黃、呂两师会合向河源前进；徐景唐师由江門方面乘船到惠阳登陆，沿东江东岸向紫金前进。我在广州逗留了几天，等候李济深由上海回来，見面后彼此交换了情况，我隨即出发东江指揮，時間大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

这时繆培南的第四軍和薛岳、黃鎮球等师已到五华县以西、龙川县以东地区的歧岭圩，与西进的陈銘樞、陈济棠部队碰上，遂发生遭遇战，把陈銘樞、陈济棠部队打得大敗，伤亡奇重。繆培南等一面以小部分向五华、兴宁追击，一面立刻把主力抽回来迎击由紫金北进的黃旭初、徐景唐等师，在紫金东北百余里的潭落圩又发生遭遇战。彼此的兵力大致相等（都是四个多师），血战三晝夜，双方战綫仅距离百十米达，双方官兵不断冲杀。第四軍北伐以来素以鉄軍自命，战无不胜。他們的士兵說：“前方第七軍还可以同

我們踢兩下，后方第七軍就是‘豆坭’（广东話，不硬的意思）。”我們的士兵說：“你們是鐵軍，我們就是鋼軍，鋼軍一定要把鐵軍打碎。”几晝夜血战的結果，第四軍素以勇敢著名的师长許志銳被打死了，黃鎮球也受了傷，他們敗退了，向老龍圩和平縣方面退却，退入贛南。我們也因傷亡重大，無法追擊。這場大戰，雙方都是大革命時期的最堅強部隊（第四、第七兩軍的基本部隊），因此雙方的傷亡都很重大，將近兩萬人，雙方也沒有俘虜，是內戰中空前激烈的一次戰鬥。

尾 聲

那時長江方面桂系李宗仁已打敗了唐生智，占領了武漢，蔣介石回到南京重新登台。蔣以前曾派宋子文到廣州勾結汪精衛反對桂系，本是一時權宜之計，並不希望汪精衛等真正成功，因為汪精衛等如果成功，在廣州開府，于他自己也是不利的。繆培南既已失敗，他就企圖收買第四軍來加強他的軍事力量，作下一次打倒桂系的準備。因此，當繆培南放棄廣州，去東江打陳銘樞、陳濟棠的時候，他就為繆培南指示了一條失敗的退路——退入江西補充整頓。繆培南等的失敗，毋寧說是蔣介石的成功。

繆培南戰敗后退入江西，桂軍就進駐興寧、五華，我的司令部就駐在興寧縣中學里，以防止第四軍的重來反攻。後來探知繆培南等部隊已向贛北移動，一時不會反攻了，同時，潮、梅方面共產黨所領導的以古大存為首的農民游擊隊，乘我軍作戰的時候又活躍起來，李濟深要我留兵一師會同粵軍辦理善後，我即留黃旭初師執行這個任務，其餘都調集北江，陸續開回廣西。第一次新粵桂戰爭，就象疾風驟雨一樣地結束了。李濟深統治廣東的局面重新恢

复了，黄紹竑的势力仍然伸張到广东，与武汉李宗仁等互相呼应。这时真是桂系躊躇滿志的黄金时代，而蔣介石正在处心积虑进行第二次倒桂的计划。

附注：本文是与黄琪翔、舒宗鑑談后才写的，并送他們看过，其中某些个别的地方是經過他們补充和修改的。

三一八慘案親歷記

樊 溪 春

一九二六年春，我在北洋軍閥執政府衛隊旅擔任上校參謀長，當時旅長是宋玉珍中將（此人解放後三、四年在北京病故）。

當三一八慘案發生前半個月，已經有幾次學生遊行，反對外人欺壓我國，均未出事故。那幾次學生遊行，都有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的大刀隊在兩旁隨行。三一八慘案前一天，衛隊旅接到上級命令說：第二天學生要在天安門前開會，會後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請願，要我們旅告知守衛官兵到吉兆胡同和執政府（即原海軍部，今張自忠路人民大學東邊那座樓）分別嚴加戒備，並一再叮囑在與學生接觸的時候要萬般忍耐，打不准還手，罵不准還嘴，以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當時又聽說，這次遊行北京警衛司令部沒有派大刀隊隨行，因為鹿鍾麟帶着隊伍到天津與奉軍作戰去了。旅部當天晚上就召集衛隊旅負責警衛的軍官們訓話，按照上級命令執行任務。

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下午，為了怕學生開會後到吉兆胡同請願，鬧出事故，我便親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備事宜；執政府那邊，派當時衛隊旅少校參謀王子江去布置警備事宜。布置時要求警備部隊前几排的士兵不許繫皮帶，以免接觸時發生無理的毆打；中几排的士兵可繫皮帶，但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許帶武器。守衛

执政府的是卫队旅第一团第三营。

我在吉兆胡同段宅等候很久，計算時間，游行的学生队伍早該到来了，可是还一直毫无消息。我就想用電話去問执政府，但是我把耳机子剛拿下来，就听見西方傳來几声枪声。我想那方面一定出事故了，沒有来得及搖電話，就坐上汽車奔执政府而去。当时段执政的侄子段宏綱还劝我不要去，我說：“恐怕已經发生誤会了，我不能不赶紧前去处理。”我坐車走到东四牌楼十条中間的时候，看到很多学生手拿小旗，滿街滿巷，迎面跑来，有沒戴帽子的，有滿臉泥土的，有不穿鞋的，有的大声喊叫“真厉害呀！真厉害呀！”因为人太拥挤，汽車不能再往前开，我就下車向西步行。出了十条西口，就到执政府大門前，进了东轅門，看見約有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还在呻吟。卫队旅的警卫士兵还在端着枪四下搜寻。我当即吹哨命令士兵赶快集合到营房里去，大声命令他們：“赶紧回去！”

官兵正在集合回营房时，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鳴鐘和当时在警卫司令部担任对文化教育界的联系工作的李泰棻也坐汽車同时赶到。李鳴鐘見到我时，神态很惊慌，說：“晴波（我的号），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我說：“已經到了这个地步，我們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我随李鳴鐘馬上坐汽車赶回吉兆胡同段宅看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吳清源下围棋，見我們两个人进屋后，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鳴鐘說：“李鳴鐘，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枪斃你！”李鳴鐘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后退，連声說：“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祺瑞接着對我說：“楚參謀长，你去告訴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还要賞他們呢！这

一群土匪学生……”我和李鳴鐘赶紧退出。我們离开段宅，就分手走了。

那一天是阴天，天上飘着小雪花，当我再经过执政府門前时，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摆在执政府門前。

当天晚上，我們卫队旅奉命严加戒备，幸而平靜无事。

过了三五天(日期記不清了)，司法部、高等法院、陸軍部联合組成了一个处理这个案子的机构，要我們卫队旅派人去对質作証。我当时因为另有一个重要會議，打算找少校參謀王子江去出庭对質，因为他当时正是負責在执政府門口指揮警卫的人。当我面告王子江时，他神色不定，連声說：“我不能去，我不能去，还是請參謀长去吧！”我当时莫名其妙，不知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胆小。稍后，上尉軍械員邱霖(現是北京市民革成員)偷偷告訴我說：“寿图(王子江号)不能去，您知道开枪时的实在情形嗎？”我說：“我不知道当时实在情形”。他說：“当学生向执政府門口拥挤时，学生拿着带鉄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罵士兵是‘卫队狗’、‘軍閥走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門口时，寿图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鳴枪，把学生吓跑了就算了，不料东西轅門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以致酿成当天的慘案。”我这才徹底了解了具体情况。既然沒有人肯去出庭作証，我只好自己去了。

当时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开会決定，馬上找来几支旧手枪，說是学生們的兇器；又找了几把条帚和几个煤油桶，装了一些煤油，說学生拿这些东西准备放火燒执政府；同时还拿了学生們的各色紙旗子一大捆(这捆旗子是真的証据，我記得旗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字样)；并且以执政府南面樓上玻璃被子彈

打穿的圓孔作为学生先由南向北开枪的証据。这个圓孔是真的當場被打穿的,不过不一定是学生打的,也許是东西轅門的卫队士兵向北打偏了的。当时卫队旅也有一名士兵被枪彈打死,于是又以此来誣賴学生先开枪、卫队旅是被迫自卫开枪的。到底被打死的这个卫队旅士兵是怎样被枪彈打死的,我們也搞不清,可能是混在学生群众中被流彈打死的。

陸軍部、高等法院和司法部当然袒护段祺瑞卫队旅,偏听卫队旅这方面的一面之詞。当时問案子的法官,我只熟悉一个高等法院法官蔣貢梁(直隸博野县人),其余全不認識。

这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地結了案,官兵未受到处分,被打死的学生也就含冤而死,无声无息地被埋葬了。

以上的經過,是我亲眼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經歷的事实。我今天追忆这一段历史事实,目的就是为了暴露当时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殘酷与无耻。从这一段事实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动統治政权是怎样地在迫害、殘杀爱国青年学生;人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青年学生們在党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軍閥的爱国运动,正如星火燎原,不管反动統治政权怎样殘酷迫害和血腥鎮压,是始終扑灭不掉的,終于最后和党领导的全国人民革命力量汇在一起,将反动統治階級埋葬。

一九五九年八月追忆

一塊銀元和一張收据

——張學良槍斃楊宇霆、常蔭槐
和收买日本政友本党的内幕
王家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寇进占沈阳后，当时他们进城后首先掠夺的目标是大帅府，因为大帅府是張作霖、張学良父子两代統治东北四省的中心，也是他們的私宅。日軍如狼似虎地闖入大帅府后，由一日本寇軍官率領寇兵数人直奔二楼，搶先闖进張學良將軍的臥室。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集中在室内一角的一隻保險櫃上，他們各自心中忖度着里面除了大量的机密文件外，一定还有许多珍珠财宝可供分肥。当寇軍在軍官的命令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保險櫃打开后，内部竟空空如也，只有一塊銀元和一張收据妥善地保存在里边。那塊銀元是一塊袁大头。那張收据上面写着“收到現大洋五十万元正”，具名的是赤塚某、鶴見某，日期是一九二九年八九月間。这帮寇軍觀此景况，大失所望，只得将这两件小东西作为战利品繳上。

以上情况曾見于一九三四年日本各大报纸，当时我国的許多报纸也曾轉載过。经过研究，原来那塊銀元是張学良將軍用以占卜决疑、处置楊宇霆、常蔭槐时使用的。那張收据曾在日本政治上掀起过一場軒然大波，保守的政友本党从此便一蹶不振而衰落下去了。这两件小东西實質上代表着有历史意义的两件大事：一件是

我亲眼目睹，并且曾参与一些机密的；一件是我亲手经办的。事隔三十余年，我对于这两件事记忆犹新，现在追述于下。

(一)槍斃楊宇霆、常蔭槐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上午，我不在家。大帅府給我家来了几个电话，說总司令(張学良那时是东北保安总司令)有要事找我，并向各方面打电话找我。等我得知时，已經将近十一点鐘了。我一边急忙上大帅府，一边想总司令平常在上午找我的时候很少，今天这样急迫，一定有特別要紧的事。我气吁吁地跑到張学良將軍的臥室时，看見他正背着双手在屋內来回踱着。他看見我进来，也沒有說話，仍然来回踱着。我很奇怪，問：“您这样早这样急找我，有什么事？”他沒有答話，仍然来回踱着。过了片刻，他提高嗓子說：“沒有什么事！”我莫明其妙地怔了一下，轉头要走时，他才說：“喂！我說，咱們内部人事要有个变动的話，你看外交上会不会引起什么大問題呢？”

我当时是总部的外交处长，但我不知道他問的是什么事，同时，我知道他的脾气，在他这样郑重其事的时候，是不会把事情随便告訴人的。所以我就說：“若是純粹是我們內部的事，那就用不着理会外国人的意見了。”他沒有再說什么。我停了一下又問：“还有什么事？”他說：“沒有什么事啦！”

从張學良的臥室退出来，我很奇怪他的問話和他的严重而神秘的态度，我簡直猜不到他所說的“内部人事变动”是什么意思。所以我由大帅府出来，就到辽宁省政府找翟文选省长。不料翟文选这时正为省政府内部的人事問題糾纏不清，所以所問非所答，我不得要領而回。

这里順便提一下辽宁省政府內部的人事問題，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北新旧两代的人事糾紛和斗争，也可以看出張学良的用人原則。

原来張学良和翟文选并没有什么个人間的亲密淵源。翟文选是吉林省双城县人，前清举人，旧国會議員，做过多年东北盐运使，論岁数、論行輩，是属于張作霖时代的人。在盐运使任內，翟有剛直廉洁的聲名。張学良掌握政权之初，求治求賢的心非常殷切，又鉴于張作霖对王永江知人善用的先例，所以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就請翟文选当了省长。但是組成省政府的有力的厅、处长却都是追隨張學良多年的三、四方面軍团的人，如財政厅长張振鷺、交通委員會委員長高紀毅、官銀錢号总办魯穆庭等。这些人觉得天下是他們打出来的，翟文选既不是他們圈內的人，又不是辽宁人，他怎能高高地在他們的上边呢？其中尤以張振鷺为最跋扈，他常常連吵帶罵地說：“真看我們奉天沒有人，叫翟大麻子来做我們奉天的省长。”因为这个原故，省政府內部人事糾紛鬧的很厉害。当我向翟文选談到“內部人事变动問題”时，他就把这問題引到自己身上来了。

他說：“有什么內部人事变动能引起外交上的問題呢？反正我是干不了啦！这些不学无术的小子簡直騎在我的脖子上拉矢，太欺侮我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大約三、四點鐘的時候，我被電話鈴聲吵醒了。侍者來告我說：“大帥府來電話說，總司令請您就去”，我一面叫侍者打電話要汽車（我用的汽車一向放在大帥府車庫），一面起床穿衣；同時又在想：“一定又是打了一宿牌，散局后忽然想起什么事來叫我去；也許等我到大帥府，他已經睡熟了。”所以我沒有慌張，

慢慢地盥洗完毕，等我出門上汽車時，東方已經發白了。

車一開出大門，司機何潤德告訴我說：“昨晚半夜，把楊督辦、常省長的汽車扣住了。”我沒有吱聲，因為我沒有理會到他說話的意思。等車進小西門時，差不多有一排人在警衛着，並檢查出入的汽車，我這才感覺一定出了什麼事了。這時何潤德又告訴我說：“昨晚楊督辦、常省長的汽車被扣後，他們倆就沒有出來。”我這才聯想起日本人一向的挑撥離間和造謠生事，這兩個人一定被扣押了。

當我進大帥府一樓大廳時，看見站在西屋門口的孫傳芳向我擺手，好像不要我進東屋似的。東屋是經常接待客人的老虎客廳（因為有兩隻老虎標本陳列在室內）。我正在猶豫間，張學良從西屋門口探出頭來，說：“好！你進屋來！”我進屋一看，滿屋子的人，東北首腦人物如張作相、翟文選、萬福麟、王樹翰、王樹常、袁金鎧、莫德惠、劉哲、臧式毅、孫傳芳等全在場。東北政務委員會的委員差不多全到了。張學良把我招呼到里間屋內對我說：“你到鄭秘書長那兒去看看他們擬的电報，回頭可以向外交方面將這件事解釋清楚。”

鄭謙秘書長正在他自己的辦公室里和劉鳴九處長心驚胆戰地草擬一件電報，尚未草擬完畢。我在一旁閱讀，那電報很長，列舉楊、常怎樣吞扣軍餉、怎樣任用私人、怎樣遺誤戎機、怎樣圖謀不軌等等几大罪狀。後來我看到“正法”兩字，不覺大吃一驚，說：“怎麼？正法啦？”鄭老先生說：“兩個尸首還在老虎客廳里呢！”我這才恍然大悟這是怎麼回事。

我沒看完電報（實際上是他們還沒有把電報擬好），就到日本總領事館去了。林久治郎總領事才起床，他接見我，說：“我知道您這麼早來，一定有要緊的事，”我把楊宇霆、常蔭槐二人如何圖謀不

軌、发动叛变的事告訴了他，并且說：“幸亏我方及时发觉，當場捕获，沈阳未蒙灾禍，实是万幸。两个罪犯已就地枪決。”林久治郎听了这消息，一面甚为惊讶，一面感謝我即时将这正确的消息告知他，使他可以即时电告外务省，以免为一些新聞消息所混扰。我离开日本領事館后，本拟再到英国和苏联两領事館去解释一番。但我轉念一想，还是不去的好。因为向日本解释是迫不得已，日本在东北有偌大的势力，若不买它的帳，有时就吃眼前亏。昨天張学良那种謹慎持重、迟疑不决的态度，以及他所謂的外交上的关系，主要的恐怕也是指的日本。至于英、苏两国，就没有必要将純屬我們內政的事向他們去解释。所以我由日本領事館出来，就逕回大帅府复命。

当我走到大樓正厅前的台阶时，正值人們将地氈包裹着的楊、常的尸首分別由老虎客厅抬出来。西客厅的人已經全散了。走进里間屋的門口时，張学良突然由一張小床上跳下地来，說：“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唉！树人（我的別号），咱們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閣（楊号）、翰香（常号）在地下了。”我把去日本領事館的情形和沒有去英、苏两領事館的原因报告給他。他沒有說什么，又上床躺下了。于是我又說：“您好好休息吧！不过这样突然的大事，人心总难免浮动，特別是楊、常两个家族一定很恐慌。基于罪不及妻孥的原則，您是不是可以对这两个家族設法安慰一下？”張学良听了这話后，又騰地跳下床来，高聲叫道：“叫刘統带来！”刘多荃剛一进屋，他就說：“你赶快去慰問楊大嫂、常大嫂，各送慰問費一万元。”

过了沒有几天，張学良拿出一大堆材料，全是明信片大小的照像卡片，叫我审查，并对我說：“这些东西，我化了不少錢才弄到手

的，你要詳細地研究一下。”這種照像卡片，大約有一二百張，我拿到家里，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明白上面寫的是些什麼。我仔細看了十幾張後，才明白這就是楊、常罪案的來源。這些東西一多半是日本車站附屬地警察署的情報，一部分是日本特務機關的情報。這些情報都是日本人用五元至五十元的現金從一幫專門販賣情報的中國人手里收買來的；當然也有專門人員搜集的東西，不過很少。日本人又將這些沒有什麼價值的情報，故作神秘地照了像，再賣給中國人，內容全是些似是而非的日常瑣事：如某某人到楊公館密談了兩個鐘頭，楊家的私人某和常家的私人某為了避免外人的耳目，在一家小飯館密談許久，等等。還有些無中生有的事，如說楊為支持常組織省保安隊二萬人的武器，不惜叫兵工廠工人加班加點等（楊時兼任東北兵工廠督辦，誰都知道，東北兵工廠工人有一兩萬人，從沒有加班加點的事）。我費了好幾天的工夫，看完了這些材料，真叫我又氣又恨。恨的是這些日本人隨意欺弄中國人，氣的是中國人太沒有志氣，甘受日本人的愚弄。我很坦率地將我的看法和我的意見向張學良說了。他沒有說什麼，只是把那一堆材料往旁邊一扔，說道：“事情已竟過去了，算了吧！”

現在我再談談當時我對於這一事件的前因後果的觀察和感想。

一九二八年我們從關內回到沈陽不久，有一次張學良對我說：“楊督辦很說你的壞話，你和他熟嗎？”我答說：“不熟，僅見過一兩次。”我當時認為這是趙欣伯等挑撥所致，亦是政界常事。從此我亦很少和楊宇霆接近，僅有一次和他長談過。那次他說的話比較多，他的談話涉及到東北政治的趨勢、對日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對張學良的評論。他的整個談話給我的印象是：這個人精力充沛，自負很

高，对張表示亲切，但帶有輕視的口吻，認為張只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兒罢了。可是他对东北政治与日本问题的分析还是很透徹的，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这期間，日本顧問們，特別是土肥原賢二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等对楊宇霆不断加以誹謗。我每次听到这些攻击，就有一种“邻国之賢，敌国之仇”的感觉，認為日本人总是故意挑撥离間我們內部的关系。因此，我就从来没有把这些不利于楊宇霆的言論告訴过張學良。張偶尔和我說起日本人对楊的評論时，我总是勸他不要鼓励外国人干涉中国的內政。

在張作霖时代，楊宇霆是張作霖的左右手之一，叱咤风云，盛极一时，馳騁中原，曾做过江苏督軍，是張作霖的言听計从的总參謀。在那时候，他已与郭松齡結下了不解的仇恨。迄郭松齡叛变失败后，三、四方面軍团的人（軍团长是張學良，实权完全操在副軍团长郭松齡手中）便以張學良为中心，执掌了东北的政权。这些人觉得郭松齡叛变的目标之一，就是打倒楊宇霆。現在郭松齡虽然死了，不过張当了权，目的也算达到了。但是，为了替郭松齡报仇，他們对楊宇霆怎能善罢甘休呢？

張作霖死后，楊宇霆倘若能够認清局势，韬光养晦，或許不致演成如此慘局。可是楊宇霆不但不自收斂，反而比張作霖在世时更显得目中无人，飞揚跋扈，自炫聪明，乱出主意，借作寿炫耀他的势力在东北比任何人都大，对張學良儼然以监护人自居。不在他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也强作主張，例如东北换旗事，主要是由張學良和蔣介石方面接洽的結果，可是楊宇霆同时又与桂系李、白有所勾搭。他与人談話的时候，給人的印象，好象他是东北唯一的主人似的，这些都是張學良最难忍受的地方。实际上在当

时东北已有不少人趋附于楊的门下了（我这里所說的不少人指的是文人，即所謂政治活动家；至于軍事方面，楊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力量）。

常蔭槐是楊宇霆的私党。我記得，在張作霖被炸、东北軍撤退到北京的时候，張学良是殿軍，最后撤退的。当張的撤退列車經過各火車站时，所有車站的水塔都被常所屬的交通部队炸毀一空。当时三、四方面軍团的人們，对此恨之入骨。可是張学良在东北执政时，仍給常以黑龙江省省长的重任。这說明，張不以私人恩怨而忘公，渴望将东北的事情办好。因为常蔭槐当时在东北人的心目中是最有本領的干才之一。他的为人虽然有些粗野，学識也不見得怎样高明，但是办起事来，精明强干，魄力很大。打通鐵路（从打虎山到通辽）就是由他負責，在日本人不知不觉中迅速修筑成功的。北宁鐵路（北京到沈阳）也是經他的手整頓成为中国的模范鐵路之一。他在黑龙江省省长任內，也能大刀闊斧，励精图治，可惜時間不长，尚未作出显著的成績。他的缺点也和楊宇霆有相似之处，自負甚高，目中无人，对張学良都滿不在乎，其余当然不在話下了。

以上是我当时对楊、常两个人的概括的認識。因为始終有日本人在这中間挑撥离間，所以我每次一听到这些挑撥离間的話，总是联想到“邻国之賢、敌国之仇”的道理。

当我知道楊、常两个人在老虎客厅里當場被張学良的心腹五六人击斃时（二人是被請进府里玩牌的），我馬上感觉，这是張学良自毀万里长城，中了敌人之計了。同时又特別感到刺激的是，張学良的这种行动还是中世紀爭夺政权的喋血亲友之間的表现。依我当时的書生之見，認為最好的处置方法，是将二人免去一切职务，讓他們以在野的政治活动家的身分，在国外或在中国內地休息，等我

張學良干不好的時候，你們再來。次一點的處置方法是：將他們看管起來，肅清他們在當時所造成的政治影響。最壞的處置方法才是將他們處決。但是我的這些書生想法，被楊、常事件以後的一些實際政治生活証明了不一定是符合實際的。因為自楊、常二人以叛變罪伏法後，東北的政治空氣為之一變，張學良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事無掣肘，人心統一，充分發揮了人治的效果。這時我才想起他和我說的“以後我們若不好好地下，那真對不起凌閣與翰香于地下了”這句話的深刻意義。我可以想像當時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和苦惱的；若不下此決心，那就是讓臥楊之側，任憑他人鼾睡。東北政局既不能定于一，就不能不政出多門，人心散漫，意志又怎能統一，政權又怎能巩固呢？但是當他下此決心時，多年袍澤，又那能不为情感所擾呢？他的那種沉重和苦惱的複雜而矛盾的心情，就只好寄托在那塊袁頭銀元上了。

據說張學良在下決心殺楊、常之前，曾躊躇再四不決，最後在一天夜里，曾用一塊袁頭銀元占卜。在占卜時，他曾默禱天地神靈顯示，假如楊、常可殺，銀元的袁頭面向上；假如楊、常不可殺，銀元的袁頭面向下。張禱畢，用手將銀元扔向空中，很偶然的，扔了三次，銀元落地時面都向上。張因此乃下定決心殺楊、常。及至殺了楊、常以後，一切順利，張于是將那塊銀元妥藏在保險櫃中，以作紀念。這就是日寇在“九一八”時在他臥室的保險櫃中所發現的那塊銀元。

（二）收買日本政友本黨

張學良回到東北執掌政權一年多以來，對日本一些主要交涉，如對皇姑屯炸車案的追究責任問題、東北換旗問題、吉會鐵路草約交涉問題、撤換日本顧問問題等，大抵已經結束或告一段落。這時

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正是比較正常平靜、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張觉得很得意，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說：“咱們年青的人干的也不錯啊！他們还很佩服我們哩！”

一九二九年晚夏初秋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众議院代議士拿着介紹信来沈阳找我，介紹信上說他們两位是来东北考察和觀光的，願意和我談談。这两个代議士，一个姓赤塚（名字忘了），以前做过駐奉天总領事，也做过張作霖的顧問；另一个姓鶴見（名字忘了），是律师出身。二人全是屬於政友本党的議員，政友本党是由政友会分化出来的、以正統派床次竹二郎为中心組織的一个新的党派。床次竹二郎原来是日本第一次政党内閣、即所謂平民宰相、政友会总裁原敬內閣（一九一九——一九二一年）的内务大臣，为当时政友会的第二号头目，人极能干，有鉄腕之称。原敬被刺身死后，国内外的形势，对于日本这个保守性很濃厚的政党——政友会很不利，在野時間稍长一点，人心就显得涣散。他們于穷极无聊之余，請出軍閥田中义一大將做总裁，又重掌政权。不料田中暴死，民政党濱口登台，政友会又离开政权了。一个以爭权夺利为目的的集团，一旦离开了政权，最容易鬧家务，政友本党的出現就是这样的产物。

一九二八年年底，床次本人携同秘書曾来东北考察，当时我們盛情地招待过他。他年逾七旬，精神还很焕发，議論风生，頗有政治家风度。这次他的两个心腹赤塚、鶴見来沈阳，当然不是象表面上所說的那样，是来东北觀光游玩的。我和他們接談一次后，就知道他們是抱有特殊目的来的。据他們說，日本在这次选举中（日本第十七次大选已決定在一九三〇年二月間举行），无论从人心背向上說，或从人物的号召力上說，都是非政友本党莫屬了，并举了好

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因为他们是新成立的政党，没有什么准备，所以经费特别感到困难。两个人又互相吹嘘一番。鹤见说：“赤塚先生在东北多年，不但做过日本总领事，并且深得张作霖阁下信任，做他的顾问很久，东北简直是他的第二故乡。我党一旦掌握政权，日本对东北的事只有依靠他了。”赤塚也说：“鹤见先生是我们党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我们党掌握政权的时候，他当然是大臣级的人物呀！哈哈，哈哈！”两个人又吐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筹集选举经费而来的。我对当时日本政党的情形还比较熟悉，觉得他们的谈话有些夸张。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自告奋勇来满洲找选举费的呢，还是奉了政友本党干事会干事长的命来的呢（当时政友本党干事会干事长的名子我知道，现已忘了），还是受了床次本人的委托来的呢？”经我这一问，他们的态度显然比较严肃多了。他们肯定地表示：他们是受床次本人的委托，并且干事长也同意这样做的。换句话说，他们是代表政友本党来筹集选举经费的。于是我就说：“承政友本党和床次先生看得起我们，愿意和我们合作，那么肯定彼此能够对双方都有利益的事，作出各自的贡献。我愿意先代表张学良将军将这一点肯定下来。”

我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将军，得到了他的许可，就和他们两人商量细节。他们说：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九十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圆（日金）。他们希望我们能担负一百五十万元至二百万元（他们说要我们负担三分之一，折合中国钱为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元之谱）。我就提出：若是床次组了阁，日本在东北保有的不合理的特权，如在商埠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所设的警察，应该合理地另行

規定有限制的职权等。他們于是說：那么主要的条件是，日本應允許將南滿鐵道公司逐漸改為名實相符的中日合辦公司，象中东鐵路公司（中蘇在北滿合辦的鐵路公司）那樣。我們雙方并約定：在日本大選以前，我到日本面見床次懸談一次，不過我和床次見面，不能在東京舉行，恐怕為人注目，必須在日本的某處溫泉或休養地邂逅相遇才好。

我將這些商談的結果報告給張學良后，他很興奮地說：“多少錢都可以，不用說二百萬，就是再多也可以。”我說：“我的意思是先給他們五十萬元，等我見了床次以后再說。因為床次所領導的政友本黨在日本的聲望，並不象他們所說的那樣大。當然啦！我們能和日本的一個政黨挂上鉤，就是它現在拿不到政權，也划算得來。”張學良同意了我這種謹慎的作法，並且決定由我親手先交給他們五十萬元，用現款而不用支票，以免發生意外波折。

我在張學良處拿了由他簽字的領款條子，便到官銀錢號去取款。官銀錢號沒有那么多現票（因為沈陽通用奉票，現大洋兌換券有時缺乏），我又找官銀錢號總辦魯穆庭請他設法幫忙。這位謹慎的總辦覺得我用款太多，不願意一次付清，我又不便向他說明這筆款項的用途，几費週折，才將現款領出。不知道官銀錢號是否與我故意為難，付款全是五元以下的小票，五十萬元整整裝了兩大柳條包。我將這筆現款交給赤塚、鶴見二人，他們也無法清點，就給我寫了一張收據了結。

赤塚與鶴見和我將密契商洽妥當后，二人就携款歸國。我和他們約定：我們提出的要求需要床次先行批准，并確定我和床次見面的日期，因此他們二人之中必須有一人在最近期間再來東北一趟。他們這次在東北期間并未與張學良見面，原因是他們非常謹

憤，怕为人所注目。

他們返國，不过两个多星期，鶴見就又回来了。我們商定的条件，已由床次批准，床次并約定我在日本大选前去日本某处温泉与他会面。这一次鶴見和他的夫人同来，在沈阳住的时间比較长，我們过从也比較頻繁。他透露了他希望和我合夥做大豆生意，我婉辭謝絕了他，但对他說，倘若他能在日本議會里對我們特別帮忙，我們当然可以对他个人事业給以帮助。他欣然答应了。

这年年底我和張学良作了詳細的商討，帶了充足的現款，第三次（从我随同張学良回到东北后）踏上去日本的征途。这也是我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到日本的旅行。我这次去日本因为有以往的經驗，行动比較謹慎，在入日本国第一个港口下关时，就避开了新聞記者們的糾纏，一直坐火車到那个指定的温泉休养地（这个温泉的名字，我忘記了，我記得是在下关与东京之間离开鉄路不太远的地方，不是一个很出名的温泉）。我在温泉旅館休息一宿，第二天就找到了床次的住址，由旅館的人代为联系，約定了会見的时间。

床次由于被汽車撞伤，在这兒养病已經很多日子了。我和他見面时，他象会見了多年的朋友似的，很热烈地欢迎了我。他很自豪地說，他虽已七十多岁的人，伤口縫綫好的非常快，医生都觉得吃惊。他暗示他的政治生活前途还很远大呢！当他談到赤塚和鶴見由滿洲回来所傳達的我們的盛情和意見，使他非常感动，表示了感謝之意。他以他的政治抱負和他的政治綱領能吸引海外人士的共鳴和贊助而感到自豪。我們暢談了好几个鐘头。他这次給我的印象不象我以前想象的那樣了。当我在日本念書的时候，他正是原敬平民宰相的内务大臣，我觉得他能干、正派，有进步的思想。他前次到东北訪問的时候，我和他虽然沒有多大的接触，但是仍然觉得

他的气度不错。这次和他长谈了以后，我才感觉他已经落后了。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他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自己所津津乐道的，也不过是誇耀其过去罢了。所以我这一次来日本的目的——帮助政友本党选举，由于和他这次的谈话，失去了不少的信心。我在温泉只住了两三天就上东京了。

到东京，正是大选竞选开始的前夕，人们和报纸上都在谈论着选举的事。我访问了几个熟人，并和我的驻东京办事人研究了一番日本的政局。我的驻东京办事人也认为政友本党这次很少获胜的机会，不过保守势力可能占上风。倘若是那样，床次可能分得大臣一席。我的这位办事人的判断还没有大错。不过这次选举是民政党获胜，若槻登台。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政党内阁就全部垮台了。组织官僚联合内阁时，床次得到了递信省大臣一席。

当时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以床次为首的日本政友本党的竞选，这虽然是一种秘密外交，也可以说是互相勾结利用，但是，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由于当时中日关系的复杂，我们在商谈过程中都采取了极端慎重的态度。谁也没有料到这张由赤塚和鹤见具名的五十万元的收据，后来会在日本政治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九一八”事变时，日寇在张学良的卧室的保险柜中发现了这张收据。一九三四年，日本法西斯蒂军人荒木曾以这张收据来反对岡田内阁，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将赤塚和鹤见两个代议士逮捕起来，并涉及到当时递信省大臣床次竹二郎和政友本党。日本报纸曾公开揭露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床次病故，政友本党亦消声匿迹了。这就是那张小收据反映大事件的前后经过。

中村事件真相

董 昆 吾

一九三一年在东北兴安屯垦区发生的“中村事件”，我是亲身参与的一个，现将这一事件的实际经过概述于下。

一九三一年我任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附，团部与所属的第一营同驻兴安余公府（蒙古王府，在王爷庙北约四十华里，居洮索铁路线上）新建营舍内。在那年的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字雁宾，皖人）率领士兵正在团部门前操场操练，见有四人乘着大马，并驮载行装甚多，由团部西边大路上从北向南奔驰而去。陆以形迹可疑，遂令士兵将该四人追回到操场问话，但言语不通，改用蒙语，仍不通，陆疑其为日本人，遂报告于我。时值团长关瑞璣（字玉衡，吉林宁安县人，现任该县历史博物馆职员）去外防巡查，未在团部，由我代理团长职务。我到操场以日语询问，其中一人答话，自承是日本人，并取出名片一枚，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等字样。据称，他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东北，此次系由洮南出发，将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以前方道路不安，据说时常有土匪抢掠，因此将由此折回，仍返回洮南，等语。我看见他的马匹高大，非东北所产；又该一行四人，除去中村震太郎外，还有一个日本军曹（等于中国军队中的上士），一个喂马的白俄，一个带路的蒙古人，而且时当夏季，他们

还穿着棉袄棉裤，并都化装成中国农民模样。我遂向他们说明要加以检查，当于他们的行囊里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图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我检阅其笔记、地图，方知中村系在一个月以前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调查军事地理；他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我既经知道中村是日本的军事间谍，遂以“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为词，将他们四人扣留。当时的关团长去外防巡查，尚未回团，我即派人向他报告并召他回团。翌日关团长回来，我将扣留中村的经过向他详细报告，并向他建议说：“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以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当日下午关团长在团部召集全团连长以上的会议。我仍主张我的前述意见，并说明理由，当时在场干部一致通过，无一异议。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四人用绳捆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派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然后把他们的骨灰扬散，使无痕迹可寻。他们所带的马匹则用枪击毙后推入团部西边的洮儿河内顺流浮走。他们所带的行装衣物，除保留其笔记、地图、手枪、测图器外，其余全部焚毁，

投灰于洮儿河內。

当时为了避免此事被日寇調查知曉，我們曾想尽方法消灭痕迹。不意洮南日本領事于接到中村已經由海拉尔出发的电报后，計算預定到达洮南的日期已过了二十多天，还不見中村等到达，遂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洮索路綫（那时該鐵路尙在鋪修路基中）向北寻找，及至余公府地方，遂得到該处蒙人告密。中村被扣后，他所帶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舖中，后被洮南日本領事查获买去，日方以此作为中村被杀的鉄証。尔后日寇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也曾化装亲到余公府調查，遂得知中村被杀的真相。沈阳日本总領事随即向我东北代理长官荣臻（那时張学良还在北平）提出严重交涉，此时始知中村是日軍大尉，是日本的参谋本部所派出的軍事間諜，为了准备出兵兴安岭对苏联作战而由东北海拉尔出发，經兴安岭、索倫山一带調查軍事地理的。日本軍閥借口“中村事件”激憤嚷叫，摩拳擦掌，遂于九月十八日之夜，不待交涉解决，而发动“九一八”事变，进攻北大营，占領沈阳。当时張学良遵奉蔣介石的命令，采取不交涉、不抵抗主义，不数月而将全部东北大好山河，以及飞机武器等拱手讓于日寇。

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我被調任为东北講武堂（在沈阳东山嘴子）步兵研究班队长。荣臻曾召我詢問“中村事件”的經過。我就把这事件的真相向他作了詳細报告。荣为应付日寇的严苛要求，当将关团长傳到沈阳，派宪兵看守于一旅館中。在“九一八”的当夜，日寇在沈阳各处搜捕关团长未获。关在旅館中以錢散給士兵，于当夜脫逃，后到北平；我亦化装到平。

同年冬季国际联盟所派出的李頓調查团来到东北时，关于“中村事件”这一部分的材料是我和荣臻商量写的，并繪图加以說明，

交給調查團，其內容大意是：“余公府到王爷庙間，时有土匪出沒，道路不靖，为了保証中村一行四人的安全，拟派兵护送，故暫留他們于团部中。当日深夜，中村一行四人乘隙逃跑，守兵追赶，中村等以枪射击守兵，守兵还击，当將他們四人击斃。該团干部以中国系一弱国，而日軍强橫，恐有无理要求，遭受处分，故將尸骨焚化揚散，以图天迹”，等語。

一九三六年夏間，有长春天宝堂国葯店商人常某往来于长春、上海間販賣人參，他到沪告我說：屯垦軍的三团一营营长陆鴻勛于“九一八”事变后投降日寇，任伪滿炮兵团团长，一九三六年春日寇偽称調他赴新京(长春)受訓，將他逮捕。陆供出“中村事件”的詳細經過，曾在滿洲報上以大字登載。日寇對我和关团长再次懸重賞通緝。陆被日寇处以剮刑，零割肢体，为中村奠祭。日寇並將中村殘杀經過編成戏剧、电影，大肆宣傳，借此來鼓動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仇視中國的情緒。

同年春間日本大使川樾曾為“中村事件”尋訪我的踪跡，當時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王家楨(現任全國政協委員)以此事告我，讓我注意。我即由那時起把我的原名“平輿”改為“昆吾”。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五日

閻錫山在大連時期山西各派的斗爭

南桂馨 趙承綏 趙丕廉

一九三〇年秋，閻、馮反蔣失敗後，閻率國民黨擴大会議的重要成員退歸太原；隨之，各部軍隊也陸續退至晉綏。閻見大勢已去，決定下野。他除以四十萬元晉鈔資送擴大会議成員離晉外，他本人也逃到大連。當閻錫山在大連期間，山西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就日益尖銳化了。

晉軍派別，大體可分四部分：

第一，商震部分。商自從和陸建章分裂、率所部一團歸閻後，在晉軍中立功不少，升官也不慢。在閻失敗時，他正任山西省主席；而他的部下李培基同時也任綏遠省主席。表面看來，似乎閻很信任他們，但事實上并不如此。一九二八年商任河北省主席時，各重要廳局，閻均派人擔任，而且故意與商為難，因而商甚不滿。後來商要自己成立一個師，向張學良購了一批槍械，被傅作義的警備軍隊扣留，報告于閻，閻因之大加懷疑。有一次，蔣介石北來，對閻部駐在平、津的將領，各賞洋數萬至十萬元，別人得賞，都立即報告于閻，獨商未報。至此，閻更不滿，即調商為山西省主席，同時派王平任省府秘書長。王平與綏遠省府秘書長王謙都是閻的亲信。所以，商震在山西，李培基在綏遠，毫無實權，只能畫諾而已。但閻在下野以前，也難以更換他們，只得把山西的善後交給商震，同時再

讓他的亲信楊愛源等監視着商震的行動。

第二，徐永昌部分。徐永昌原来是国民軍第三軍孙岳的旧部，在一九二六年秋季国民軍西退之际，因为他是山西人，经过从中拉攏，他才率部归了閻錫山。徐为人緘默，不似商震那样鋒芒外露，所以閻对他的戒心，較之对商震稍逊一等。徐本任山西省主席，閻調商震任山西省主席，而以徐繼商任河北省主席，即可証明。閻反蔣失敗后，徐放弃河北省主席，率部退回山西。

第三、傅作义部分。傅作义自从保定軍官学校卒业后，就回山西，从練習生升到了軍长，都是閻錫山一手栽培的。但他毕竟是山西南部的人，不能和五台、崞县一带的軍官相提并論。他曾守过涿州，在当时也算赫赫有名的將領。他在保定被軟禁时，認識了不少奉軍的显要；蔣介石也想拉攏他。因此，閻对他的信任，尽管高于以上两部分，但这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絕对的。

第四，閻的亲信部分。山西有句民謠：“会說五台話，就有洋刀跨。”这就是說，閻在軍隊方面是以五台人为骨干的，但也不能說所有軍官都是五台人，大約五台附近各县如崞县、定襄、忻州等地，也都包括在內。甚至不屬这一带地方的，只要死心塌地听話的人，如孙楚之类，也能爭取到他的信任的。这一派的軍官是以楊愛源（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这时退回山西）为首，其次孙楚、赵承綬、王靖国、李服膺、楊耀芳、楊效欧、丰玉璽等均屬之。

平常，这四派之間即有矛盾，但对閻还都能服从，閻也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使他們互相牽制，互相揭发。

在閻到大連以后，奉軍早已入关，并且也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而山西、綏远两省，按蔣、張的約定，也必須由張学良妥为处理。当前的重要問題，就是閻、馮以及杂牌軍隊的改編。为此，

張學良在天津召开了一个編遣會議，山西的与会人員是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和傅作義。結果，他們四人，各編一軍，其余均改為師，分隸各軍。但商、徐、傅所部，軍隊不至過額；而楊愛源軍則不能容納閻的亲信軍隊，所以會議決定，把孫楚、趙承綬和李服膺三部編遣。商震當然贊同，楊愛源也未力爭，徐、傅更沒有說話的必要。商震等回晉發表後，孫、趙、李均不服從。由上所述，已經說明四派各有矛盾，但以商與閻派之間的矛盾比較尖銳，至此几乎要爆發了。

閻的亲信軍長(沒有改編以前的)很多。為什麼單裁這三部分呢？這不是由於張學良的調查，而是由於商震等人向張反映的結果。這三人中，以趙承綬敢作敢為，最難駕馭，所以，誰都怕他，從而也恨他，甚至說他和張宗昌一樣。商震等感到，如果不消滅他的武力，山西不好統治；如果不消滅孫、李，趙就不致孤立。這是要裁這三部的原因。

這事公布後，趙對楊愛源說：“你這軍長，多年來是我和孫楚捧起來的。人家殺我們，你都不能刀下留人，真是軟蛋！”從此，趙等對楊也有芥蒂了。但趙亦不肯示弱，而且舍得花錢。在編遣之前，張學良派點編大員戢翼翹到達大同，趙送了他兩箱鴉片烟土。戢翼翹就在張學良面前替他說了一些好話。他又親自到了沈陽，面見張學良，送張左右好幾萬元的禮物。結果，張學良說：“他是軍官學校學生出身，怎麼能象張宗昌呢？”從這一句話里，就可以知道張對趙已經諒解。因此，孫楚、李服膺也都到沈陽見張。這時，遠在大連的閻錫山聞知此事，很替他們耽心說：“假定漢卿把三人都扣了，如何辦理？”實際上，他們不但安然回防，而且把孫楚部編為護路師，趙承綬部編為省防師，李服膺部仍舊。趙等勝利了，這更造

成商震不能在晋立足的原因。

正在以上各派明爭暗斗的时候，忽然异軍突起，靜极思动的溫寿泉，也向南京活动，并且邀南桂馨同往，相約他主軍，南主政。南不假思索地說：“閻錫山失敗到蔣介石手里，並沒有失敗到你我的手里。他虽然身在大連，心还未死。你看，太原、大連之間，要人往返，山西軍政大权，隱然操在他的手里。現任的主席都管不了，何況你我，你去可以，我是敬謝不敏。”溫經南說，也知道他回太原主軍不能成为事实，但他野心不死，又到南京运动孔祥熙回晋主持。孔初有意，适逢国民党政府导淮委员会开会，南桂馨时任委員，到京出席，也見了孔祥熙。孔因轉述溫意，南力說不可回晋，回去沒有办法收拾殘局，孔遂决心謝絕。溫寿泉因此恨南，又遇上海各报大載溫在河北建設厅长任內的种种劣迹，溫疑南揭发，因而更加恨南。后經張繼解釋此事与南无干，溫始釋然。

一九三一年夏秋之交，石友三叛变了張学良，杀了張派給他的秘書长張云貴，率部从順德北上，已过石家庄。張調商震部从娘子关出击石友三部的后路。結果，商部完成使命，石友三部失敗，但商震却不能再回任省主席的原任，以后就脱离了晋軍，投靠了蔣介石。

在商震未出娘子关以前，赵承綬等早已知道商震总有一天要率部离晋，因而他和孙楚相約：如果商部出娘子关，孙楚从正太路堵击；如果他們出雁門关，赵承綬从平綏路堵击；总而言之，不讓商軍整旅走出山西。赵、孙并且临时还和石友三通气，甚至图謀与石合作，共同反对張学良。但因商部行动迅速，孙楚未能如愿。迄商到平后，电知他所联系的周原健的一旅，开出山西归他；并电約李培基也到北平开会，商量晋、綏的后事。正在这时，閻錫山忽

从大连乘飞机由日本人护送，降落到大同机场，当夜接见了周原健，不让他这一旅开出，又接见了赵承绶。在晚餐后，赵問閻說：“总司令回来，蔣、張必定压迫我們，如何对付？”閻沒提蔣，只說：“各方对汉卿很反对，恐怕他自顧不暇，哪能顧及我們呢！”（这时距九一八事变不过一两个月，这话意味着对九一八事变，閻可能预先知道的。）閻住了一夜，就回到五台河边村。第二天，李培基乘专车入平，路經大同，被赵承绶扣留，并說：“閻老总已經回来了，你見完他再走。”李不得已，只好見了閻；他們談些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李虽到平，但迟了几日，會議已經过去了。事后，赵承绶說：“李席卷細軟逃出，我本意要劫他的財物的，但閻既不为已甚，我只得放他过去，孙楚未截住商震，我拿他出一口气。”

先是，在商震未曾离晋之先，徐永昌已經有所活动。做了山西的清乡督办。但他并不滿足，还想再作一任山西省主席，替他說話的主要人物就是李石曾，而跑龙套的还有段子鈞等等。徐永昌是孙岳的部下，而孙岳是高阳县人，与李同乡，因而徐也早已認識了李。李在張学良易帜归蔣的过程中，奔走甚力，所以蔣、張对他也还相当信任。李为了削弱閻錫山的实力，以便有利于蔣，更愿为徐說項。所以，在商震不能归任之际，徐就被任为山西省主席了。在徐任主席后，張繼、李石曾和吳欽城因事到了北平，那時南桂馨曾应張繼之約，由津来平和晤。李石曾主張由徐永昌統一管理山西軍政。南對他們說：“閻錫山实力尚在，楊愛源就是他的代表。中央既然无力消灭閻部，不如以清乡督办一职給了楊愛源，以安閻派。”后来張繼、吳欽城听了南桂馨的話，即刻电蔣任命了楊，这是楊任督办的由来。

在徐永昌活动的时候，傅作义也不甘落后。前面說过，他在

保定被扣時，認識了不少張學良的部下和幕僚。這次張學良重掌華北的軍政大權，他又進一步地和張結合；同時，張勳之、張曉山等又向南京替他有所活動。適逢李培基不能回任，水到渠成，傅作義經過蔣、張的同意，就任了綏遠省主席。

徐永昌任山西省主席後，本來打算有所作為，但不久閻就回到河邊村。他見閻說：“我奉中央命令，應有責任，總司令突然歸來，讓我怎麼處理？”閻說：“你看該是怎麼辦吧？”徐說：“只好說因為老太太有病，回來侍奉湯藥，不提政治罷了！”閻說：“好，就這樣說吧！”從此，徐亦喪氣，不再想有所作為，事實上也不能有所作為。省政還是由閻暗中操縱，徐只畫諾而已。後來徐也離開晉軍，投到蔣介石方面去了。

傅作義是在閻初回來後就任的，當然也想搞些名堂出來，但閻使趙承綏的軍隊駐在平地泉、大同之間；又派王靖國的第七十師駐在包頭、五臨一帶，以鉗制傅的三十五軍，使他不能活動；而省政亦由建設廳長馮義把持着，所以，傅的主席也是有名無實。

結果，徐、傅兩位，同一命運，晉綏軍政，在閻未任綏靖主任之前，已經掌握在閻錫山的手里了。

（李泰棻記）

一九六〇年一月五日

我 与 政 学 会

李 根 源

一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統治，結束了中国二千年的帝制。胜利的果实，旋为袁世凱所窃夺。于是全国人民有討袁护国运动的兴起，在广东肇庆組成軍务院，我被任为軍务院副都参謀；都参謀是梁啓超。由于反对帝制、建立共和的愿望已深入人心，故自封为洪宪皇帝的袁世凱，在人民巨大压力之下，仅仅过了八十三天的皇帝癮，便被迫取消帝制，終于忧懣致病而死。

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依法繼任大总统，段祺瑞被任为內閣总理，实际大权掌握在段祺瑞的手里。黎元洪就职后，段祺瑞电請西南护国軍取消軍务院，西南各省取消独立，以便实行統一。六月十日，云南都督唐繼堯以軍务院撫軍长的名义，向北京政府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四项：（一）恢复民元約法；（二）恢复民二被非法解散的国会；（三）抵抗护国軍的北軍全部撤回原駐地点；（四）召集軍事善后會議。随即由代理軍务院撫軍长岑春煊发表通电，通告以上四项办法为西南各省所拥护，繼又提出惩治帝制禍首的主張。

六月十六日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着各省軍隊撤回原防，实际上段祺瑞仍欲利用袁世凱的約法，并勾結陕西陈树藩、广东龙济光

取消独立，同时还唆使龙济光与军务院为难，我护国军继续前进，占领韶州。六月二十五日，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等，联合发表宣言，加入护国军。北京震动，迫使段祺瑞不得不容纳军务院提出的旧约法有效、召集国会、恢复各省省议会和通緝帝制祸首等項主張。

根据军务院组织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军务院至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廢之。当时段已经由黎元洪任命为国务总理，而国务院之组织，即将提交在八月复会的国会同意。因此，军务院的存廢問題，由岑春煊致电云南唐繼堯及各撫軍商榷。唐繼堯、陆荣廷、蔡鍔、刘显世、陈炳焜、戴戡均主張撤廢，而唐繼堯身为撫軍长，亦遂通电撤消。章太炎由北京脱桎至肇庆，却不同意撤廢。他認為袁世凱虽死，余孽犹存，段祺瑞专横恣睢，大难未已，军务院不能輕易收束。当时有一部分人所見亦同，但军务院内部，各謀权利，人心涣散，已至无法保存。

在军务院成立之初，对撫軍人选，意見已有分歧。撫軍长唐繼堯、副撫軍长兼攝撫軍长事岑春煊，撫軍蔡鍔、陆荣廷、刘显世、李烈鈞、陈炳焜，秘书长章士釗，外交专使唐紹仪、伍廷芳、温宗堯等，是岑春煊、梁啟超提出来商量的。当时我与程子楷建議說：此次护国是癸丑討袁的繼續，癸丑討袁失敗的都督及軍师旅长柏文蔚、胡汉民、譚延闓、陈其美、陈炯明、程潛、赵恒惕、許崇智、熊克武、冷通、龔振洲等十一人，应一律加入撫軍。梁啟超不以为然，他說：撫軍名单，已經唐繼堯、蔡鍔同意，勿須再增加。這項意見，遂被擱置。

七月十四日，军务院正式宣告撤廢，我被任命为陝西省长，黎元洪邀我至北京。我过上海时，两次謁見孙中山先生，当时有廖仲

愷、古应芬、胡汉民在座，中山先生并約餐。中山先生对北洋軍閥的专横禍国，憤恨不已，教我再努力，并贊許我去陝西，勗勉备至，叫我和陝西国民党人于右任、井勿幕、宋相辰联系，密切合作。时黄克强先生病咯血甚剧，我每天都去看望他。他对我說：“黎黃陂太懦弱，段祺瑞、徐樹錚专为北洋派謀，不象是拿得起来的人，拿不起全国，則統一无望，內政无从言，对外更无从言。我病危急，恐将不起，奈何？”克强先生催我动身，黎黃陂亦来电催促，我不得已，啓程北上。过南京，見馮国璋、齐耀琳。过徐州，張勳在車站迎接我。我在徐州住了两天。馮国璋和張勳都是当时的大軍閥，他們之間，是有利害矛盾的。張勳是安徽督軍，他却把徐州作为他的大本营，將隴海路自徐州以东的地区占为己有。而这些地区又都是屬於馮国璋所管轄的地区。由于張勳与段祺瑞相互依賴，故馮国璋亦无奈張勳何。我在徐州住留两日的观察中，得知徐州是督軍团的大本营。又會見了万繩栻、解四端及張文生等人，言談間隱約得其陰謀：段祺瑞、徐樹錚利用張勳作乱，張勳則利用段祺瑞以逞其复辟的陰謀。

我抵达北京时，北京政界中正醞釀副总统选举人选，孙洪伊等力为馮国璋活动。时国民党議員吳景濂、張繼等成立“益友社”，孙洪伊操縱其間。孙洪伊原系国会“韜園派”的首領，这时他是与吳景濂、張繼靠紧的，因此被称为“小孙派”。孙洪伊出任內务总长，經常同段祺瑞发生爭执。孙洪伊是直隶人，因同乡关系，和北洋派中的直系軍閥馮国璋等頗为接近。他为馮国璋活动选举副总统，目的在于联馮制段。吳景濂也是主張联馮制段的，而且他和馮国璋都是北方人。孙洪伊和吳景濂在国民党内活动，党人頗多傾向于馮国璋。是时，谷鍾秀等提議开临时会討論，会場在殷汝驪家，参

加人数約計一百八十余人。在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李执中、張耀曾、孙光庭、刘彦、王恒等提出黃兴、陆荣廷、岑春煊、蔡鍔、蔡元培为副总统候选人。我亦提出我个人意見說：“段祺瑞任內閣总理以来，恣睢专横，一年内必有战争，副总统一席务必选举南方人，在黃兴等五人中任选一人，但以黃兴为最宜。否則請孙先生屈就副总统。我們必爭此席，決不能选举馮国璋。”但是張繼、景耀月等持反对論者亦不少。我对孙洪伊等所主張的联馮制段，亦提出不同的看法。我說：“有的人主張联馮制段，他們認為馮和段之間互爭雄长，存在着矛盾，但是他們就沒有想到馮、段互爭雄长，只是他們北洋派的內部紛爭問題。如果对付我們南方的話，不論是馮国璋或段祺瑞，都是采取敌对态度，把我們看成仇敌的。因此，我們不能对联馮制段存有幻想。”参加会议的人，有一部分同意我的意見。鈕永建在会上列举陆荣廷在护国运动中的貢獻，他主張选举陆荣廷为副总统。但大多数人，还是傾向于孙洪伊和吳景濂的意見，选馮国璋为副总统。遂決定在党内投預备票，投票結果，陆荣廷得一百二十余票。祖馮者如秦广礼、刘恩格等起而用武，茶壺茶盃打破若干，會議无法进行，一開散去。十月三十日，参、众两院举行副总统联合选举会，出席議員共計七百四十一人，馮国璋得五百二十票，当选为副总统。

有許多位議員如李克明、文群、王有兰、刘彦、孙光庭、潘大道、韓玉辰、李执中、謝树瓊、李为倫、蔣举清、刘盟訓、楊擇、李述勝、鄧际平、秦錫圭、謝蔭南、符鼎升、李英銓、周之翰等，对吳景濂受人利用、为馮国璋活动竞选副总统、不守党紀，已不能理喻，主張另成立一个会，即政学会。“政学会”三字，遂初見于中国报刊上。會員无入会手續，无拘束，合則来，不合則去。“政学会”三字之名称，是由

張耀曾提出的，寓意是对政治我們个个都要努力学习。政綱是由歐陽振聲与李肇甫提出的，包括四項：（一）政学会仍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二）拥护孙、黄两先生；（三）奉行三民主义；（四）拥护共和，实现宪法，成員以国会議員为主，議員以外不收入；只有鈕永建一人不是国会議員，由于大家都很推崇他，所以邀請他参加。会中推張耀曾、谷鍾秀、鈕永建和我任总务。

張耀曾等簡历如次：張耀曾字銘西，云南大理人，留学日本，老同盟会會員，国民党員。谷鍾秀字九峯，河北定县人，留学日本，老同盟会會員，統一共和党黨員，国民党員。鈕永建字惕生，江苏松江人，留学欧洲，老同盟会會員，国民党員。

十月三十一日，黄克强先生因肝病在上海去世，享年仅四十四岁。国喪元良，党失重心，能不慟哉。十一月八日，蔡松坡先生病逝于日本福岡医院，我与松坡先生曾共患难，辛亥云南光复之役，出生入死，今聞噩耗，不禁潸潸泪下。

二

府院催赴陝任，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国民党本部設宴送行，居正、田桐、李永聲（即李錫九）、彭养光、謝持、丁維汾、呂天民、馮自由等俱在。林森主席講話，頗亲切誠懇，以彼此團結相勗勉。七日，黎黃陂招宴，并亲書联語贈行，上联为“集众思广群益”，下联为“开誠心布公道”。黎黃陂随云：“我只愿促成宪法，就了事矣。”八日，从北京动身，經开封、郑州、洛阳、观音堂入潼关，过华阴、渭南、临潼，登驪山，望三輔，沃野千里，古称天府，信非虛譽。二十日，抵长安，迎者載道，我自八仙庵步行入城。此次得以入陝，皆陝省内外人士热誠贊助，我应尽力所及，以报地方。陝省督軍陈树藩起先是

拒絕我到任的，但在陝省人士壓力及勸導下，亦不得不對我表示歡迎。我抵任後數日，在省議會宣布治陝綱要草案：（一）興修全省水利；（二）墾辟邊荒；（三）普種林木；（四）普查礦產，開發延長石油；（五）開通潼、長汽車道；（六）開辦西北高等師範學校，另辦一千人的速成師範；期望每縣能辦一所中學乃至二三所中學；（七）修纂陝西通志；（八）修整古帝王及歷代先賢陵墓；（九）充實圖書館；（十）禁煙，禁賭，禁貪污、土劣等，我願負責，竭力進行。議員們皆贊成。

到陝西後，所任用者多為陝西國民黨人，我約井勿幕同路回陝，任以關中道尹，宋相辰任以潼長公路局局長，並連電邀約于右任回陝，俾得隨事商承一切。于右任推薦的郭希仁，任以陝西省全省水利局局長。井、宋、于三人是孫先生囑咐的，故對他們更為倚重。

治陝五月，雖無大成就，全省民意，尚以為然。誰知五月三十一日督軍團亂作，倪嗣沖、徐樹錚電陳樹藩，叫他要我署名附和叛變，如不署名，就將我殺了。我拒不署名，叫他砍頭，他不敢，而將我拘禁在西安土地廟街五個月之久。我所以不死之故，其一，陝西人士大力維護；其二，陳樹藩的父親配岳先生從中維護；其三，在北京的陝省府代表劉治洲四方奔走呼號救援，深情俠誼均不可忘。後來耿直在西安起義，討陳樹藩，陳樹藩迫不得已，將我釋放。總之，陝省人士對我情誼之厚篤，雖事隔四十餘年，今猶不敢忘懷。我遂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出關，二十五日返抵北京。

我在到陝西省長任以前，遵照行政官應辭去議員的規定，辭去眾議院議員，由劉夢澤（楚湘）補，同時政學會的總務亦辭去。在陝又遭督軍團的叛亂，被陳樹藩非法拘禁，再加張勳復辟，對外音訊

隔絕，不會預問政学会事。返回北京時，議會已停閉，政学会同人在順治門外北京中華新報館預定開聯歡會，每星期一次，我到過會二次，每次集談都歡洽有益，互相期勉，並通過一致贊成孫先生之護法運動。據張耀曾言，政学会議員響應孫中山先生護法的号召，去廣東者已達六七十人，現在北京者只有三十多人。中華新報在上海出版，系政学会的機關報，由張季鸞、谷鍾秀、張耀曾、吳敬恒等主持。尚有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新書頗多，由歐陽駿民、趙南公、吳應圖等主辦。

三

我自出陝到北京以來，專心一志讀書習字，凡有應酬多半謝絕，日約姚茫父、丁佛言游廣肆看書。因岑西林迭函催促南下，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起程。時云貴、兩廣以督軍團之亂，宣布護法，湘南劉建藩、林修梅，荆襄王安瀾、黎天才、石星川，渭北胡景翼、曹世英先後獨立。海軍總長程璧光率第一艦隊偕孫先生、唐紹儀暨國會議員入粵，開非常會議，舉孫先生為軍政府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副之。陸、唐辭不就，另組各省聯合會議。二十七日，湘、粵、桂軍攻克岳州，北軍大創，馮國璋出京，乞曹錕、張懷芝、倪嗣沖、張敬堯出兵。我即乘是日京滬客車南下。我到上海後，岑西林告以廣東組成大元帥府，唐、陸不就，現吳景濂、褚輔成等擬改組軍政府，約往參加主持，問我意見如何。我答不贊成。我說：“公完成討袁護國事，已萬幸，不去最好。”時譚延闓在旁說：“唐、陸有電來，已復電允可矣。”我還是勸西林不去最好，仍以在滬養老為是。是夜，廣州方聲濤轉來程璧光一電，云：“滇軍餉糧無着，龍濟光又入犯，已占阳江，即至新會，廣州岌岌可危，又南雄亦將有戰

事，乞兄速来。”李烈鈞、莫荣新、魏邦平、朱培德、楊益謙均来电，催促速至粵。时谷鍾秀来沪，在座，看完程电后对我說：“快走快走，广东若失，唐、陆将如何，天下将如何，只有向北洋派磕头矣。毋犹豫。”随偕陈强起身赴粵（程璧光与黎黄陂皆海軍，有深切关系，黄陂曾介紹我和程璧光共談过話），二月十八日抵广州。时段祺瑞利用龙济光，任以两广巡閱使，由瓊崖渡海，攻陷雷州、高州、化州，势張甚。滇軍在粵，給养不繼，与桂軍迭生齟齬，桂軍視滇軍亦多疑忌。我到广州后，滇軍官长开会，公推我为駐粵滇軍总司令，李烈鈞、方声濤亦各具書面贊成。莫荣新、李烈鈞乞余即日就职，我仍坚却之。我自壬子解兵后，声明不再統兵，盖恐再造恶孽。二十四日夜，龙济光連陷恩平、开平，四邑岌岌，全省震撼。孙、伍、程三先生及国会催促我就职，迟則龙济光之禍将无底止。不得已于二十五日就职，次日出师，乘船待开，忽聞程璧光在海珠遇刺殞命，艤舟往視，适孙、伍二先生亦至，拊尸流涕，相对歔歔，孙先生亦催促迅速出兵。翌晨我率朱培德、楊益謙、張怀信等之众，开至台山县之新昌。刘志陆、刘达庆、魏邦平陸續到达，我推李烈鈞任前敌总指揮，李烈鈞讓我不，最后仍推李烈鈞，因为李烈鈞是參謀部总长。三月初二日，我軍攻克恩平，乘势下阳江，再攻高州、化州，龙济光逃广州湾。其时，段祺瑞命吳鴻昌、丁效兰等率众三万余人，越庾岭攻南雄。我星夜由高州旋师，进驻周田，以成桃、李明揚、穩玉廷所部扼守始兴，对抗于馬子坳。五月，李烈鈞亦率部来韶州，部署就緒，命朱培德出仁化、扶溪，楊益謙出都坑、罗壩，同时进攻。激战四日，北軍潰走，遂收复南雄，乘胜追上大庾岭，我临时总司令部住大庾岭。自是相持于大庾岭及信丰、崇文之間。滇軍官长士兵，先后在广东护国、护法两役陣亡有一千五百余人（見滇軍在粵死事录及

趙樾村先生的序文），英勇犧牲的精神，可敬可佩。

在湘南北軍官譚延闓、譚浩明、程潛、馬濟、李書城、韋榮昌、張其鎧、林俊廷、陸浴光、趙恒惕、林修梅、莫克昭、馬鋈、宋鶴庚、魯滌平、馮玉祥、潘鴻鈞、張克瑤、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彥、張福來、穆文卿、楊清臣等、聯名通電全國主和。蔡元培、熊希齡、張謇、張耀曾、谷鍾秀、王寵惠、張紹曾、黃郛等發起“和平期成會”應之，戰事遂停。南北各派代表，在上海開和平會議。軍政府擬提出唐紹儀、蔡元培、伍廷芳三人為南方總代表候選人，經軍府各部長及各總裁代表通過唐紹儀為南方總代表，南方分代表為章士釗、胡漢民、繆嘉壽、曾彥、郭椿森、劉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饒鳴鸞、李述膺。北方總代表為朱啓鈴（后辭任）、王揖唐，分代表為吳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樞、汪有齡、劉恩格、李國珍、江紹杰、徐佛蘇。三月二十日集議，五月十三日南方代表提出八條件：（一）對於歐州和會所擬山東問題條件，表示不承認；（二）中、日一切密約宣布無效，并嚴懲當日訂立密約之人，以謝國人；（三）立即裁撤參戰軍、國防軍、邊防軍；（四）惡迹昭著、不洽民情之督軍、省長，即予撤換；（五）由和會宣布前總統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無效；（六）設參政會議，由和平會議推出全國負重望者組織之，議和條件之履行，由其監督，統一內閣之組織，由其同意；（七）其他已經議定及付審查或另行提議各案，分別整理決定。以上七條，如北方同意履行，則第八條為由和會承認徐世昌為臨時大總統，執行職權至國會選舉正式總統之日止。

南方代表提出的八條件，系唐紹儀及南方各分代表擬出，送軍政府審查，議會中益友會、政學會、政友會等均贊成，我亦極為同意。南北在滬續開會后，朱啓鈴宣言八條件不能同意，不能接受，

會議破裂，

当我駐軍韶州時，經常有議員來韶州游南華寺，其中有政學會的舊友，但亦有其他會系的朋友，我對他們總是隨來隨招待。

政學會中有少數人不顧全局，只圖個人騰達。廣東省長翟汪辭職後，岑西林欲推溫宗堯繼任，宗堯不承。岑西林又屬意于我，我亦不承。我向岑西林推薦胡漢民或陳少白繼任，借以調和粵、桂關係。岑西林也同意，無奈陸榮廷不贊成。楊永泰靠攏桂派，乘機活動，因桂派支持，終于做了廣東省長。此事更加引起吳景濂和他的小孫派等對政學會的不滿，其實政學會并無一人愿楊登台也。

一九二〇年，吳佩孚決心從湘、鄂撤防，回師北方，請求軍政府幫助。同年一月三十日，岑、陸決定秘密接濟直軍開拔費六十萬元，先付三十萬元，其餘三十萬元在開拔時付清。吳與岑、陸和約，在直軍撤防以後，武漢長江一帶由湘軍推進接防。吳還提出與南軍共同組織救國同盟軍，在推倒皖系以後召開國民大會、另組織南北統一政府的計劃草案。這時軍政府的財政部長伍廷芳携款去滬，不能撥款，先由廣西借墊，再由軍府籌還。事前我不知之，事後始知之。岑西林問我意見如何，我說：“有好处，有坏处。好处使北洋軍閥自打自，其实力总要消灭若干。坏处是我們內部意見不統一。我以為應該對內部公開拿出来商量，求內部意見一致，進即同進，止則同止為是。”時冷遜、程子楷、王恒在座，亦同此意。

我嘗說，軍府組織，自屬同床異夢，已不足担此澄清時局的大任，加以議和停戰以來，嗜欲日滋，黨爭時起。吳景濂輩極尽撻闢毀謗之能，安福系人隱藏在小孫方面以逞其挑撥離間之術。一時謠言風起，要打倒三個人，第一個是軍政府的“保鑣人”李根源，第

二个是“老官僚”岑春煊，第三个是“霸占广东”的陆荣廷。（一）对李根源：利用唐繼堯等煽动滇军风潮，使二李斗争。幸李协和与我尚能忍耐，其时虽不无纷乱，但不曾开过一枪、杀过一人，风潮一过，仍如兄弟一般；惟大气已泄，只求一去自了。我推举方声涛接替，未得准。（二）对岑春煊：用議會提議改組軍政府案，并提不信任岑春煊案。又伍廷芳竟將軍政府关税余款一百八十余万元带走，使軍政府无法維持存活。岑春煊接會議改組案及不信任案，即备文向議會辞职，通电各省解职。乃陆荣廷、唐繼堯、譚浩明、陈炯明、譚延闓、刘显世、熊克武、王安澜、石星川、黎天才、顧品珍、王电翰、盧巖等来电挽留，并反对改組案，且囑請林葆懌、莫荣新竭诚挽留，不放行。岑西林不得已，只得暂时住下，过此“难过日”（岑之自語）。（三）对陆荣廷及其部下，则非用实力驅逐不可，陈炯明找李厚基，由段祺瑞給款五十万元、子彈六百万顆及飞机枪炮等，所以桂系在东江一败不振，連战連敗，两方死亡近万人。陆荣廷发布桂軍回桂、粵人治粵之命令，由是桂軍全部撤回广西，其間虽不无多少賄营之波折，总之，粵省全境已在粵人掌握中矣。

其时，陈炯明飞机連日炸广州，秩序已乱。益友社、民友社等議員离粵已多，住在石行会館及南关五十号的政学会朋友，尚有三四十人。我前往看望，請他們回上海或到昆明，或回家。有几位才避飞机回来，形状悽愴。我說：“我們无才无德，不能調和軍府，不能調和粵、桂兵事，使諸君不能行使职权，空負护法之名，使諸朋友受險受累受惊，真是罪該万死，慚恨已极。”有几位朋友說，去昆明者很少，大家都不相信唐繼堯，有八成去沪或回北京，但安福系太凶了，常与政学会人斗。談一小時許，我遂起身握手告別，情极依依不舍。我隨到照霞樓一看，已走得光光矣。譚延闓来謁、莽两电迎岑西

林赴湘，并請滇軍全部赴湘，桂省府亦来电約滇軍赴桂，但是滇軍已不能去湘，又不能去桂，在粵又无地可容，我只得交待与參謀長張鑑桂、旅長梁說、周兴权相机处理，随时請李烈鈞救济指示。我遂通电偕岑西林离广州，去上海，真是一塌糊涂矣。时十月二十四日也。至沪我痢疾未愈，遂去苏州休息，所有岑西林的辞职电皆不知之矣。后听岑西林說，徐世昌派其秘書吳某来看，并送銀二十万元，他堅辞不受，吳某始返去，云云。

四

一九二二年，直、皖战起，战争結果，直系曹錕、吳佩孚战胜了段祺瑞。直系軍閥为了籠絡人心，准其恢复国会，迎請黎元洪恢复总統位，并懲办安福禍首。黎元洪派胡瑛初到上海来邀章太炎、謝鏡虛，并到苏州邀我去北京。我应邀前往，先后参加汪大燮与張紹曾的内閣，被任为农商总长。我在內閣會議提案有可記者如下：遵守約法，坚持和平；不借外債，不发公債，国用从儉，編預算交国会；取消邮电加价；严繩不法軍人；通令各边省詳确考查边地情形，准予特設机关垦殖；調查各省地質，提倡开矿；分令川、滇、黔、桂四省考查土司情形，酌准設治；創設国立編譯館等。

張紹曾就任国务总理后，于一九二三年一月致电西南各省，主張和平統一。二十六日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裁兵救国宣言，南北响应，和平有望。但和平统一是与直系軍閥的黷武行为不相容的，二月十七日，曹、吳电請中央任命沈鴻英督粵，孙傳芳督閩，和平显然破裂。

三月間，政学会旧友在北京聚会。政学会曾于一九二〇年八月被暴力解散，經今三年，乃得再开成立会。高仲和、李肇甫等提

議將政学会改名为“宪政社”，因政学会之名，已备受安福系的恶意詆毀，未得同意。張耀曾提議兩名并用，遂通过，并通过各項組織委員名單。政学会于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中鉄匠胡同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張耀曾、谷鍾秀、孙光庭、李肇甫、刘治洲、王有兰、王侃、周家坦、欧阳駿明、鍾才宏、文群、赵仲、刘盟訓、李文治、李克明、蔣举清、刘楚湘、金兆棧、李述膺、丁文瑩、張魯泉、饒英裳、周之翰、郑际平、秦錫圭、韓玉辰、李根源等。我在会上提出了守法、卫国、持正、不畏强禦等政治主張；当时直系軍閥专橫，故提出以上主張，供会友共同勉励。其时，政学会人士参加張紹曾內閣的，有彭允彝、李根源。国会議員出席当天大会的約有七十人，并有国民党益友社人居正、田桐、覃振、彭养光、李永声、焦易堂、謝持、鄒魯、吕占东等以来宾身分参加，看我們应付选举之主張如何，会毕頗滿意。

通过政学会之組織名單如下：

政学会下部人員（一九二三年三月改組）

（一）政務部各股委員：

法制股：正主任委員王侃 副主任委員李自芳 朱騰芳
委員張耀曾 陈祖烈 周庆惠 李春荣 廖輔仁 孙鏡清 胡兆沂 曾干楨 徐兆璋

外交股：正主任委員張端 副主任委員沈智夫 欧阳鈞
委員谷鍾秀 文群 高仲和 王烈 李溥恩

財政股：正主任委員王源翰 副主任委員王猷 張联芳
委員楊永泰 程修魯 楊荣山 陈子斌 余仿 楊擇
李为倫 雷煥猷 陈煥章 杜华 王觀彤 陆定 鍾才宏 李肇甫 楊其觀 李振鈞

內务股：正主任委員王吉占 副主任委員張国俊 杜树勛
委員郭椿森 刘新桂 王有兰 蕭汝玉 祝光懋 陈祖
基 寶奉璋 孙清源

社会股：正主任委員郑际平 副主任委員李英鈴 桂殿华
委員張魯泉 田稔 郭步瀛 乐山 彭建标 曾庆模
饒芙裳 黄汝瀛

經濟股：正主任委員陈鴻鈞 副主任委員文登瀛 秦錫圭
委員李根源 張全貞 王凤翥 刘治洲 林玉麒 瞿啓
甲

交通股：正主任委員張大义 副主任委員周續 陈国璽
委員金兆棧 范毓桂

教育股：正主任委員孙光庭 副主任委員赵守愚 丁佩穀
委員符鼎升 石銘 刘楚湘 馬文煥 刘景云 黄紹侃
沈鈞儒

軍事股：正主任委員李安陆 副主任委員姜繼 張佩紳
委員丁文榮 韓玉辰

边务股：正主任委員車林桑都布 副主任委員張树枬 陈光勳

(二)事务部各股委員如下：

文牘股：正主任委員楊擇 副主任委員楊式震 陈子斌
委員谷鍾秀 金兆棧 秦錫圭

交际股：正主任委員張魯泉 副主任委員高仲和 杜华
委員周之翰 李凤威 刘新桂 郭步瀛 王猷 王有兰
張树枬 張国俊 余仿 王凤翥 姜繼 李安陆 朱騰
芳 周庆惠 李春荣 陈煥章 乐山 廖輔仁 李自芳
陈光勳 蕭玉 王吉占 寶奉璋 陈鴻鈞 李英鈴 車

林端都布

編輯股：正主任委員符鼎升 副主任委員胡兆州 陈匪石

委員張耀曾 文群 韓玉辰 楊其觀 孙清泉

游艺股：正主任委員陈祖烈 副主任委員石銘 雷煥猷

委員郭榕森 王侃 張联芳 林树椿 董其昌 李振鈞

會計股：正主任委員李为倫 副主任委員高家驥 孙鏡清

委員王觀彤 王源翰 李根源 黃汝瀛 陈国璽

其时，王承斌、高凌霄、王毓芝輩为曹錕攫取总统的阴谋，日愈显露。高凌霄曾邀我和彭允彝谈话。高说：“你们二位和黎总统比较接近，最好劝告黎总统不要坚持先宪后选；如果坚持下去，对黎总统是不利的。先选后宪，对黎总统好，对大家也好。”我答复道：“公布宪法，是当今急务，制宪工作，最多不过二个月即可完成。黎黄陂性强，恐不易劝说。”彭允彝从旁调解说：“待我们研究劝说黎总统。”后来在政学会聚会上，我将和高凌霄谈话的经过当众报告，同人们都很愤慨，发言者多，有张华瀾、李执中、鍾才宏等十余人。会后，张紹曾专约我一人在什刹海荷泡楼上小吃。他对我说：“曹家必要总统，奈何？”我说：“依法正当选出，余等无法反对；否则不敢赞同，在曹家亦不利，恐动天下之兵，公其善劝之。”张不语，歛歔慨歎而已。直系军阀夺取总统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但吴佩孚原先之意，颇欲利用黎之名义拖延选举时日，以完成其武力统一；乃见黎不易为用，对黎颇为失望，始附和曹錕的选举，不促成也不阻止。

当时为曹錕选举鑽营奔走者，内閣以高凌霄、吴毓麟为主干；内閣以外，以天津曹銳、王承斌、边守靖等为主干。彼輩在国会方面与吴景濂、張伯烈等互相勾结，并以大选告成后以第一任总理許

吳景濂，在京軍人有力者均加入選舉團。一時空氣以為黎一日在位，則大選一日不成。張紹曾是不附和曹錕的，但性情游移，欲干而又不肯干，故亦為曹錕心腹所排擠。彼輩認為擁曹必先驅黎，驅黎必先驅張，張去而由高、吳等主持內閣，操縱大選。彼輩在國會方面先行發動，四月二日參議院提彈劾案，五月十五日眾議院通過不信任案。

五月間我母親生病，請假回蘇省親。六月四日啓程回京，過南京時，齊燮元延我至督署，商選舉曹錕為總統事，誘我幫忙，以繼任閣員和餉。我答復他說，我之參加內閣，是為了做事和做人，並非為了做官；我的意見是：（一）幫助黃陂促成憲法，在他任內宣布，約三個月可了事；（二）兩院根據憲法，自由選舉總統，不得威逼利誘，仲珊（曹錕）既已水到渠成，自然當選；（三）黃陂久已聲明不做候選人，源之進退，尤無關輕重。齊以為然，由孫純齋擬電王承斌轉曹錕。我於六月五日抵達北京，京中政潮日愈擴大。初眾議院通過不信任案，張紹曾亦不為所動。至五月二十四日，黎黃陂批准出使經費、國會制憲經費、江海關經費，照數勻撥。高凌霨、吳毓麟等遂以責任問題威逼張閣總辭職。六日開緊急閣議，張為高凌霨等所脅，提出辭呈，即日去天津。張去天津後，黎黃陂派劉治洲、金永炎、黎澍赴津挽留。據張表示：此次政潮，醞釀很久，原因複雜，個人力難銷弭，只得遠逝，云云。挽留無效，黃陂邀孫寶琦組閣，孫以老病辭。再邀周樹模、褚輔成、顧維鈞組閣，均謂力不勝任。曹黨以為張出走後，即由高凌霨代替組閣，但黎黃陂並不願意于高。曹黨所希望之高閣既不能實現，於是發動軍警，借口索餉，演出逼宮之醜劇。

八日，有軍警官佐數百人，佩刀入新華門，圍居仁堂，借口索餉，

經再三劝导，始各散去。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崗，天安門前复有千百人，散发傳单，虛构罪狀。新华門外及东厂胡同總統住宅，守卫尽撤。午后，總統住宅電話、自來水被軍警派人監視，不許接傳取用。曹党以断絕水电恐吓黎黃陂，但黎黃陂堅強不为所动。曹党見黎黃陂既恐吓不动，打算暫時改用和緩手段，推顏惠庆組閣，遂由軍警当局正式向黎提出。黎于十日晨約顏商量，顏初有允意。是日午后，京畿各師旅軍官數百人闖入黎宅，包圍索餉。三日，复有自称市民請愿团將近二三千人，手執“改造政局”、“總統退位”、“總統戀棧”等紙旗，包圍總統住宅喧嚷，并推举代表、軍官三十余人守索不退。顏惠庆觀此情狀，遂答复黃陂新閣无成立之望。黎黃陂召集名流會議，邀請的人仅來了一半，約三十余人，面面相覷，歛歔太息，會議无結果。

十一、十二兩日，各方愈逼愈緊，十二日王懷庆等亦通電辭職。我自六月六日曹党逼宮之時起，即住宿在黎總統宅內，凡橫逆之來，勉為總統应付。劉治洲及韓玉辰、劉楚湘同在黎宅全力相助，不离开一步。劉楚湘云：“北洋派是闖大禍了，我們跟北洋軍閥斗，隨着黎死也是快活事。”谷鍾秀听說曹党將以暗杀之卑鄙手段加之于李根源，馮玉祥不肯，故未見实行，急托楊秉权來告，叫我注意。政学会人堅決反对北洋軍閥，張耀曾、谷鍾秀、李肇甫、殷鑄夫、王吉占、王有兰、金兆棧、李克明、趙仲、文群等，均向黎黃陂表示愿与黎共險難，褚輔成、彭養光、焦易堂、王用賓、呂占东、鄒魯等，亦常到黎宅安慰黎黃陂。十一日，金兆棧偕程硯秋來見黎總統，云是來护卫總統的。黎黃陂笑着說：“好，这总算有正义感的人。”这几日黎宅的小客厅內，賓朋滿座，大多是国民党及政学会的議員。他們都說是來帮助總統、打倒北洋軍閥的。十三日晨，我依法副署大總統

令，免張紹曾及全体閣員職，以李根源兼署國務總理，并发布裁撤巡閱使、巡閱副使、檢閱使、督軍、督理及討曹錕諸令，共七道。茲錄四道当时发布之命令如下：

(一)大總統令

國務總理張紹曾呈請辭職，張紹曾准免本職，此令。

大總統蓋印

農商總長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二)大總統令

署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高凌霨、署財政總長張英華、海軍總長李鼎新、兼陸軍總長張紹曾、司法總長程克、教育總長彭允彝、交通總長吳毓麟呈請辭職，顧維鈞、高凌霨、張英華、李鼎新、張紹曾、程克、彭允彝、吳毓麟，均准免本兼各職，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三)大總統令

巡閱使、巡閱副使、陸軍檢閱使、督軍、督理，着即一律裁撤，所屬軍隊，歸陸軍部直接管轄，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署陸軍總長金永炎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四)大總統令

此次京師亂起，显有發蹤指使之入，本大總統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毀法亂政，罪恶昭彰，举国人民，当同义憤，扶危定亂，愿与天下共图之，此令。

大總統蓋印

署國務總理李根源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黎元洪在京已不能行使職權，決定於六月十三日移駐天津，并於行前通知參、眾兩院及外交團。黃陂於十三日午後一時二十分以金永炎名義租用專車赴天津，同行者有新任陸軍總長金永炎、侍衛武官唐仲寅、秘書韓玉辰、熊少豪等十餘人，并護衛十餘人。黃陂臨行時，將大總統印信大小十五顆，交秘書瞿瀛隨其眷屬携至東交民巷法國醫院。我在黃陂動身後，原擬與饒漢祥坐汽車去天津，為了安全起見，我改乘馬出哈德門，并邀劉治洲同行，然後由丰台上火車。黎專車至天津車站，直隸省長王承斌攔車劫印，几危黎性命。王承斌攔車劫印事經過，詳載劉楚湘《癸亥政變紀略》、張國淦《癸亥政變篇》、李劍农《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覃壽堃《六月十三日紀事》諸書，不贅錄。

十月五日，曹錕賄選成。賄選議員（即豬仔議員）每票受賄五千元，廉恥蕩然殆盡。浙籍議員邵瑞彭曾將賄選之五千元支票一張制版作為証據，向法院控告高凌霨等選舉納賄，惟因當時法庭處在軍閥淫威之下，未能實行檢察。其時，旅滬拒賄議員百餘人聯名發表宣言，主張“明正賄選之罪，一致聲討”。浙江盧永祥、奉天張作霖、淞滬何丰林、四川熊克武、雲南唐繼堯、廣東胡漢民、廖仲愷、李烈鈞、楊希閔均先後通電反對賄選。十月十日，上海舉行討曹遊行大會，杭州舉行救國大會，各省學生掀起誅議員、討曹錕之運動。上海工商學各界開省區公民大會，議決將此次應選與受賄之豬仔議員，由本省各法團抄沒其財產，并剷除其籍貫，以示與眾共棄。浙、皖各省學生，更有搗毀議員住宅，發起鑄像除奸會，欲將受賄議員一一鑄成銅像。由以上事實可見，曹錕賄選已為舉國人士所痛

憤与唾弃。

黎元洪在天津曾电邀西南各省派代表来天津，以資請教。广东派汪精卫，四川派但懋辛，云南派繆嘉寿，广西派曾彥，會議后亦无結果。中山先生来函欢迎黎去广东，惜未能成行。九月十一日，我随黎至上海，本拟在上海設置政府，但不为盧永祥、何丰林所礼遇。黎黄陂遂决定暫去日本。我在日本小住一二月后，仍返天津，并由饒汉祥拟稿函复中山先生。十一月八日，黎黄陂赴日本，我遂閉門謝客，奉亲讀書，中山先生約赴粵，張作霖約赴奉，赵恒惕約赴湘，均婉辞之。

此次倒曹錕、倒北洋軍閥，政学会人可算是不畏北洋軍閥，拼命以赴，事固失敗，难得是全国人民的正义支持，主張公論，虽敗亦胜矣。惟是中鉄匠胡同之政学会事务所招牌，恐遭曹党寻衅，不得不撤銷之，張耀曾、谷鍾秀亦暫避至上海。

五

曹錕賄选以后，軍閥混战，迄无宁日。初而盧永祥与齐燮元交閥，即所謂江、浙之战。江、浙之战方終，直、奉之战随起。馮玉祥、胡景翼自古北口返兵，改軍号为国民軍，孙岳响应，囚曹錕于中南海延庆楼。吳佩孚敗退天津，最后退至洛阳。張作霖入关，住天津，拥戴段祺瑞为执政。胡景翼邀我入京，我应邀往。段祺瑞約見，聘我为善后會議委員，我函辞不受。

我到天津見黎黄陂，时孙中山先生已由上海繞道日本来到天津，李烈鈞、耿毅同来。孙中山先生臥病張园，我同黎黄陂往視其疾，又偕冷遹、赵仲去看望第二次。先是，孙先生由广东北来抵达上海时，我同舍弟根灃往見，欢談一时許，孙先生握根灃手，奖其救

石龙之功，并命随之北行。

拒絕贿选議員在曹錕贿选成以后，大多数离京南下，至直系軍閥失敗，始北返，谷鍾秀亦回京。我到天津后，遇見褚輔成、居正、馮自由、徐謙、鄒魯及黃一歐等，聚談甚久。馮玉祥住天台山，邀我往遊，我与刘治洲、黃郛、張耀曾等同往。馮見面握着我手說：“你是有骨气、有干劲的，今日局面，你有大力。”我言：“不敢当，这都是举国人士的正义支持，諸好朋友的合力，有以致之，我何有焉。”遂留宿一夜暢談，次晨返京。

孙先生由天津到北京，病住在顧維鈞宅，我往看望多次。孙先生問馮煥章、胡笠僧事最詳，催我动身去河南，并問根澤何不同来。

我到开封，笠僧接待甚厚。我为笠僧整理河南圖書館，收集金石，并为經營龙亭公园及潘楊湖。

这时开封英豪聚集，老国民党人經常去来开封的約四五十人，其中有李烈鈞、柏文蔚、譚人凤、方声濤、葉荃、耿毅、冷遯、柳亞子、陈匪石、覃振、居正、褚輔成、彭养光、王用宾、白逾桓、田桐、呂天民、徐謙、饒汉祥、陈嘉会、謝持、刘成禺、王源翰、王恒、張华瀾、符鼎升、李英銓、刘楚湘、赵仲、張耀曾、韓玉辰、郑际平、秦錫圭、饒芙裳、李为倫、王觀彤、張季鸞等。

苏联朋友有十余人来开封，我和他們同住在外交署。笠僧派楊召棠做我的俄文翻譯，使我常能与苏联朋友交談，我因此知道苏联革命的事情不少。列宁领导俄国人民推翻沙皇統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真使人佩服。

笠僧是辛亥同盟会人，癸丑討袁失敗，亡命日本，又是浩然廬的朋友，他左右办事的，多是国民党、益友社和政学会的人。他对

来开封的人，謁忱欢迎招待。他說：“現在中山先生已在广东改組国民党，黨員愈多愈好，人不嫌多，方面不嫌广。諸君在党内都是老同盟會員、老国民党人，不用顧慮。”一些議員亦感到回老家的好处。

是时笠僧認為国民党、益友社、政学会长此分散下去不好。他提議益友社、政学会人仍回国民党老家，請張繼、柏文蔚写信給国民党和益友社，由張繼回到北京时面呈孙先生；請張季鸞、殷汝驪写信給政学会。有人說，吳景濂也应給他一信，未通过。随得谷鍾秀和張耀曾复信表示贊成。居正、褚輔成等复信，还有些問題尚待相商。当时在开封的益友社和政学会（又名宪政社）人，都自称为国民党人，不复自称为益友社人和政学会人。

再逾些时，我在苏州接張耀曾、谷鍾秀来信，知道北京政学会机构已全撤銷，會員中回老家者有之，星流云散，自謀自者有之，可算完全結束。迄今已四十余年，只賸同会老友沈鈞儒、刘治洲、王紹鏊^①、韓玉辰四位先生健在，年皆七八十，精神旺健，篤信共产主义，效忠人民，可堪庆慰。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慟战慟战！我被推为丧事筹备員。时豫西战争正急，我未能去北京，催笠僧筹汇万元助丧費。我作輓詩一首，并有“过鉄獅子胡同怀孙中山先生”詩一首。

輓总理孙公

乙巳同盟江戸开，不才我也追隨來。

未成大业宾天去，誰甯呱呱四亿孩。

（敬賦此二十八字寄北京并开封追悼会）

① 編者注：据王紹鏊先生說，他并非政学会會員。

过鉄獅子胡同怀孙中山先生

臥病鉄獅子，几度問床前。速我河南去，为胡（笠僧）分一肩。又詢天太山（馮煥章），寄意殊拳拳。一身关天下，惟祝病早痊。今來人何去，感念淚潸然。

笠僧督师与刘鎮华、憨玉昆战。刘、憨敗，渡黄河退去。笠僧凱归开封，左臂患疔疮，四月十日延西医割治，誤于蒙药，竟至不起，伤哉，哭不成声矣。笠僧逝世后，朋友遂漸星散，馮玉祥来信留我住天津，我函辞，决心回苏州，我送笠僧灵柩至郑州。次日，我即起程南归，过武汉、九江、南京，抵苏州，恰乙丑端午节也。

政学会自一九一七年春成立日起，至一九二五年春撤銷日止，在此八年中，会务皆由張耀曾、谷鍾秀两君負責主持。两君經過几多艱險，遭过几多折磨，始終保全信譽。張君与我交識最早，关系尤深。光緒丙午年（一九〇六年）春，在日本东京奉孙、黃两先生命，創辦《云南杂志》，鼓吹革命主張，張君任总編輯，我与赵仲任庶务干事。至辛亥起义日止，《云南杂志》共出二十三期。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編刊的《云南杂志选輯》，即当日我們共同努力所出版之刊物也。谷君是吳棼甫先生弟子，汉学根底深厚，著有詩文集。

結 束 語

政学会是旧中国議會中的一个政团，本質上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有組織形式而无組織实际，对會員也沒有任何紀律約束，目标不一致，步調多分歧，所以当面临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之际，不能全体一致貫徹自己提出的綱領，为人民多做几件好事，發揮一个政团应有的作用。以成員來說，在政学会成立之初，有不少旧學問深邃、

講究做人的耆老碩儒及富有正義感、原在大學任教的議員參加進來，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真正的法治和民主政團。但有部分動機不純的會員，只想做官發財，不顧全局。這類人，我當日對之頗憤慨，即如曹錕賄選名單中，亦雜有政學會會員，真可恥也。

一九二一年，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中國出現了新生的曙光。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改組國民黨，採取聯俄、聯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政學會於一九二五年接受胡景翼的提議，取消組織，回到國民黨老家，但沒有能進一步為革命事業盡到一分力量。

我是政學會的一個成員，並且是發起人之一。過去有的報刊說我是政學會的“主腦”、“軍政府的外府”，是不符事實的。至於新政學會則更與我無關，我亦無所聞知矣。

我為了響應周總理的號召，寫下這篇對政學會的回忆。由於回忆政學會的往事，更加增加我對新社會的熱愛。過去外患頻仍，軍閥恣睢，愛國之士，莫不憂心如焚。今天我國在共產黨領導下，始能臻于國勢富強、萬民康阜之境，使舊中國的重重陰霾一掃而空，出現了一個萬里晴空、光輝燦爛的新時代。八二老翁，能不歡欣鼓舞。

我年老多病，記憶久衰，容有不盡翔實、分析錯誤之處，尚祈加以指正。

一九六〇年一月

西原借款内幕

叶恭綽

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在貿易上既賺了一笔大錢，又眼見大战結束无期，各国皆无力东顧，正予它以独占中国权利的机会，乃先后于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两年間，以所謂“西原借款”的方式向北京政府索取新的鐵路权利以及其它特权。这项借款大部分由段祺瑞用之于內战，正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一向分化中国的阴谋毒計。西原借款总数达一亿四千五百万元，其項目如下：

交通銀行整理借款	一九一七，九，二八	二千万元
京畿水灾借款	一九一七，二，一二	五百万元
有綫电信借款	一九一八，四，三	二千万元
吉会鐵路筹备借款	一九一八，六，一八	一千万元
黑吉两省农矿借款	一九一八，四，三	三千万元
滿蒙四路筹备借款	一九一八，九，二八	二千万元
济順高徐鐵路筹备借款	一九一八，九，二八	二千万元
参战借款	一九一八，九，二八	二千万元
共 計		一亿四千五百万元

所謂西原借款，系指由口人西原龟三所經手的而言。实际上当时段祺瑞的对日借款并不止此数，总额共达五万万，西原借款

只不过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其所以被人特别注意的原因有三：（一）此項借款除“京畿水灾”一笔系由日本兴业銀行承借外，余均由兴业、台湾、朝鮮三銀行承借，但实际上却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庫預备金內支出的錢。（二）八笔借款由西原一手包办。（三）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一天之內就借了三笔，每笔二千万元，数額不小。

說起西原龟三，他并不是一个什么財政家或經濟家、銀行家，而是日本內閣总理寺內正毅私人的一个跑腿的营混子。西原到北京来活动借款，还曾提出过一笔“币制借款”，主張中国用此借款来实行虛金本位。当时西原認為我在政治上有些力量，因此特来求我諒解。我問他：“实行金本位，是不是需要鑄造金币？”他說，“不必，可以日本金圓作准备。”接着我又問他：“以日本金圓做准备，国际比价怎样定法？我国金币和日本金元的比价又怎样定法？何况日本自己也缺乏生金，我知道你們日本并不是一个产金国家。再且中国如不造金的硬币，那金紙币所代表的是什么呢？”西原无詞可答。后来日本政府也就打消此議，究因何故則不知道。

我当时因参加反复辟而繼任交通次长，交通总长是曹汝霖。曹又兼財政总长，借款的事由他經办。为了方便，他就假借交通的名义来做借款的題目。我們但看西原借款，八笔中就有五笔屬於交通事业，数額竟达九千万元。我站在交通部的立場，对这些名不符实的糊塗政治借款，无法同意，遂亲自去見段祺瑞，苦口說明：“这样的借款在經濟上毫无計劃，借来的錢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段对此并没什么表示，只說：“財政部当有統籌的办法。”

財政部会有什么办法呢？就只知道用錢。当二千万元有綫電信借款簽訂后，我向曹汝霖說过：“電信方面也实在等着錢用，現在

既有这笔借款，最好不要拿到财政部去。况且，錢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責任，如錢真能用在电信方面，将来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曹不得已，才勉强留下了二百萬元給交通部。但不到一个星期，电政司长就向我报告：“总长已經又撥了一百几十万給财政部去了！”

电信借款并沒用在电信身上，交通銀行的一笔二千万元的整理借款也是胡乱花去。交通銀行本来就沒有借款的必要，借款到手后，財政部立即向交通銀行借去一千万。其余一千万由东三省分行放出七百万，北京分行放出三百万，这些放款以后也都成为烂賬。北京分行副理梁節卿曾經建議，将此一千万放出后應該随时套进日金，以作准备，但該行当局不肯采納。借款时日金每元仅合我国銀元四毛几分，所以得到的实款甚为有限，而此后的日金价值逐渐高漲，要归还也归还不起了。

有关东三省的借款如吉会鐵路筹备借款，滿蒙四路筹备借款以及黑吉两省农矿借款，張作霖概不承認，事事推諉，叫日本人直接和北京政府办交涉（連二十一条中所允許的关于东三省各条件，張作霖亦多半未实行）。日本帝国主义因东三省的种种問題，对張作霖銜恨甚深，因此一九二八年乃有皇姑屯之一炸。

西原借款中最后一笔是参战借款，也以这一笔最为滑稽。在袁世凱还在当政时期，欧战已起，德国正忙于調兵遣将，对于距离本国过远的我国青島无力兼顧。当时日本已經对德宣战，德国知日本必取青島，但与其被日本夺去，不如由中国收回，先送个人情，将来还可再作交涉。袁不知如何找着英国駐京公使朱尔典商量，告以中国愿担任攻击德国及收回青島的意图。英国、日本系同盟，大約英国因此又向日本要甚么条件，未能解决，中国只有等待。其

后中国拟决心发动，又为日本所知；于是日本以闪电手段，连夜通过閣議，当晚即动员出兵进攻青島。

当时英国也接获此項情报，就由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英兵也参加进攻青島的要求，日本只好答应了。但英国哪里有兵可調？七拼八湊，只有在威海卫調动了五百人，北京使館卫队中抽調了几十人，京津間駐防軍隊（当时还因受辛丑条約的束縛，各帝国主义在京津間都有駐軍）抽調了一些人，再加上一部分印度籍的軍隊，总共不到一千人，那里能够正面作战？自然只有跟在日軍之后搖旗呐喊而已。因此，等到青島攻下，英国方面連一面旗都插不上。至今知道英国曾經参加进攻青島的人恐很少了。这也是英、日同盟之下英方的一出悲劇。

日本在未与各協約国講好价錢以前，自然不愿中国自动参战（青島的事自然也包括在內）。所以当一九一五年俄、英、法三国駐京公使劝誘中国对德宣战以后，曾屢遭日本的肆意破坏。但等到日本同各国交换条件之后，它又强迫中国参战了，不但要中国参战，而且以参战的名义借款給段祺瑞。其时，各国已秘密将中国的利益卖与日本，而中国政府尚蒙在鼓里。

段祺瑞借了参战款，也練了“参战軍”，却未曾派过一兵一卒去参战。他原是練了兵来打內战的。所以人們都說他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是“战而不宣”。

我并且做过一桩傻事：有一天去見段，說：“現在既然已經参战，無論多少总得派点軍隊参加。不知已做怎樣的計劃？”段說：“他們（段說話时常常喜欢用“他們”二字）的意思想出一万兵。”我問：“出一万兵？准备了多少錢呢？”段說：“不是有参战借款嗎？”我說：“从中国到歐洲，要走許多的路程，要化許多的时间，什么时候才能

回来也不知道，两千元供应一个兵恐怕不够吧？”段問：“怎么是两千元一个兵？”我說：“参战借款只有两千万，出一万兵，不正是两千元一个兵么？”段至此默不做声。我这时才明白：段根本没有派兵参战的意思。

我因始終反对西原借款，早已引起段派人物的忌恨。正当簽訂有綫電信借款不久，有一个通訊社忽然发了一段“二万万亡国大借款”的新聞，社会为之轟动。段派人物疑是我在后面主使，恼羞成怒，欲将有以报复。經人从中解劝，我才以辞职出国了事。此时我心怀怏怏，曾同陈垣等人前往云岡游覽，以資排遣，不料也被偵探跟踪。有人說，徐树錚就欲得我而甘心。

我辞职出国，拟至欧洲各国考察，兼协助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以当时地中海布滿水雷，尚未扫除，航行不便，因此改經朝鮮、日本以赴美国，再轉欧洲。道經日本时，日本人极为重視，認為是这个反对日本的人来了，假作慇懃，竭力拉攏。到东京的时候，首相原敬适不在东京，也特为赶回；陸軍大臣田中义一、元老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都特加礼待；其他政治界、工商界人士也都来訪問。許多人問我：“是不是反对西原借款？”我回答：“是的。因为两国如确講友好互助，自有其正当的途徑与办法。至于西原借款的方式与內容，徒然損害两国邦交，为中日两国計，都无好处。”我并断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其后果然。

禁卫軍之建立与改編

載 濤

清末攝政王載灃監國，命我與毓朗、鈇良創建禁衛軍，經兩年多之籌備始訓練成軍。辛亥革命起，清廷以馮國璋為禁衛軍總統官；民國成立後，禁衛軍改編為普通陸軍。

禁衛軍之創建，起源於載灃出使德國。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德帝國主義以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為借口，要求清政府派一親貴大臣往德謝罪，始准議和。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約簽字，載灃以光緒皇帝胞弟身分，被派為頭等專使赴德。載灃抵德後，德皇命其胞弟亨利親王專任招待，並陪同參觀軍隊。載灃因鑒於德皇族之威勢及近衛軍之精良，特請教於亨利。亨利告以德皇室制度即親如皇弟、皇子，無不自陸軍學校畢業，以至身入聯隊當兵，由低級軍官以至將領，因之，皇族軍事力量強大；教以皇室應以攬握兵權、革新武備為第一要著。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亨利銜德皇之命來華，將德皇照片及禮品贈送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載灃奉命招待，二人又談及創建皇族武裝問題。從此，載灃即有模仿德國、實行掌握兵權之意。但因慈禧太后總攬大權，光緒皇帝被囚禁，自己系光緒胞弟，因避嫌疑，不敢提出建立皇族武裝之意見。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十月，慈禧太后及光緒皇帝相繼

逝世，載灃以攝政王監國，遂立即施行亨利之建議，創建皇族武裝之禁衛軍。于十二月下詔：禁衛軍歸監國攝政王統率調遣，命我與貝勒毓朗、陸軍部尚書鈇良充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并規定：所有練兵規劃奏請事件，均逕行封奏密陳，硃批特准發下，始行錄咨陸軍部備案，與近畿六鎮不同。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正月，訓練處開始辦公（借用西堂子胡同稅務處房屋），奏派溥桐（皇族，鎮國將軍）、哈漢章（留日士官步兵科）、文華（留日士官炮兵科）、章遜駿（留日士官工兵科）、田猷章、徐致善（陸軍部司長）為軍諮官，及田猷章調任步標統帶，以麟光（滿族、公爵）充軍諮官。姚寶米為軍械科監督，廷夔為軍需科監督（后廷夔辭，以衡永任監督），王金綬為軍法科監督，游敬森為軍醫科監督。按照奏定營制，應編制步隊二協，統轄四標；馬隊一標，計三營；炮隊一標，計三營；工程隊一營，輜重隊一營，機關槍（原營制稱機關炮）一連。先成立步隊一標、馬隊一營，以王廷楨（留日士官騎兵科，曾任陸軍第一鎮正參謀官）暫充步一標統帶，兼馬一營管帶，并先奏定禁衛軍服制圖說，如帽章、領章、肩章，皆與普通陸軍有區別，并以團鷹為禁衛軍標識。

旋于是年三月，有旨調鈇良籌備海軍，開去禁衛軍訓練大臣。至次年始續派載瀾（皇族，鎮國公銜鎮國將軍）為訓練大臣。于新街口嘎嘎胡同購買民房，先將訓練處移往，一面計劃建築新樓房，為將來成立軍司令處辦公之用。

其步隊一、二兩標，以第一鎮正副目為基干目兵，挑選京營八旗及圓明園、健銳營、內外火器營各旗兵入伍。其官長自管帶以次，調由第一鎮軍官考取錄用；第三標續亦如之。步一標統帶為忠和（陸軍大學畢業），二標為崇恩，三標為扎拉芬（陸大）。清朝宗

室，向不充兵，特別奏請挑選入伍，與其他兵丁一體待遇。第四標則奏准專赴直隸、山東挑選农家及格壯丁入伍。其四標之統帶，則調田獻章充任。馬標統帶為王廷楨，馬一營管帶為羅虔（留法陸軍）、劉嗣榮（留日士官騎兵科）。調馬三營日兵補充炮隊，將全營日兵選調蒙古馬隊補充，以錫珉為管帶（留日士官騎兵科）。炮標統帶為宋玉珍（陸大，原軍械科科員）。工程營管帶為劉錫齡，劉后升任步四標統帶，以于彭充補。輜重營管帶為蘭芳（陸大，后更名傅桂生）。並成立警察隊（即憲兵）一隊，隊長為李飛鵬；軍樂隊一隊，隊長為李士奎。

及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二月，我奉命出洋考察陸軍，哈漢章、徐致善均隨行，遂以馮耿光（軍諮府廳長）、惲寶惠（訓練處執事員）署軍諮官。我在德國延攬專習麥克沁炮（即機關槍）之留德陸軍學生錦銓（后更名張銓）回國擔任教練，並制定機關槍操典頒行（前練兵處制定各項操典，獨闕機關槍）。

當開始編練軍隊之際，先暫借用南苑營房。后乃奏明于西郊暢春園旧址建築全軍營房，于校閱成軍，始行遷入。并另于京城西安門內旂檀寺地方建立步標更番所，由二標常駐，統帶先為應龍翔（留日士官步兵科），后升任河南陸軍協統，以管帶崇林（后更名索崇仁）升任。于西安門內大光明殿地方建立馬營更番所（由馬一營常駐），以拱衛禁城及備監國攝政王隨時調遣。嗣即成立兩協，以良弼（滿族愛新覺羅氏，留日士官步兵科，由陸軍部司長調任）為第一協統領，王廷楨為第二協統領。良弼于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調任軍諮使，遺缺以王廷楨調任，并以姚宝來充任第二協統領；姚于宣布共和后辭職，以統帶忠和升任。因全軍建立，奏請由監國攝政王親臨德勝門外黃寺教場校閱并親授標旗，時為宣統

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距武昌首義，已不足一月矣。

及革命軍起，清廷允資政院之請，實行立憲，宣布十九信條，皇族應解去兵柄。及袁世凱任內閣總理大臣，據我等奏請，奉旨添派徐世昌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南北停戰議和，馮國璋任察哈爾都統，由漢口返京，遂由內閣奏明禁衛軍訓練成軍，應將訓練處改設軍司令處，奉旨以馮國璋為禁衛軍總統官，并令我等妥為交代。溯當訓練之時，每官長目兵，均各發給手冊，備列遵守規則，平日諄諄告誡，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所以于宣布共和之際，惟知遵奉朝旨，全軍帖然，未發生任何事故。

馮國璋接統後，組織軍司令處，分設參謀、秘書、副官、軍械、軍需、軍法、軍醫等處。迨共和成立，按照優待條件，其第八款載：“原有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而仍由馮任軍統。至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八月，馮出任直隸都督，仍兼統禁衛軍。直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馮調任江蘇都督後，是年始將禁衛軍改編為陸軍第十六師，軍統名義取消，軍司令處結束；以王廷楨任第十六師師長，并任為江寧鎮守使，隨馮駐寧，十六師軍隊仍歸馮統轄調遣。及馮于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八月入京代理大總統職權，十六師與十五師分擔公府翊衛。馮于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十月卸任，退歸私第，及旋河間原籍掃墓，仍撥十六師兩連更番擔任隨護駐守。直至馮于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病歿于京師，十六師與馮之關係，始告結束。

當宣布大清皇帝辭位優待條件以後，皇太后等仍暫住居宮內。其神武門、北上門之守衛，仍照舊擔任；即于禁衛軍改編後，亦仍由十六師步兵第二團任守衛之責。二團團長，先為索崇仁，後為翟殿林（陸大）。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冬，溥儀出宮，由清室善

后委员会將宮廷移交民國接管，而十六師守卫之任务，始告完毕。

此外尚有特加追述者：(1)禁卫軍軍隊內之非战員，較其他陸軍各鎮为少，如訓練处之書記員裁去后，事务由执事員承办；协、标、营之書記員、書記長全行裁去，由軍官兼办；其司書生出缺不补，即由正副目棟充。(2)步队第四标編練新兵，系仿征兵制，派員赴直隶、山东两省，就地挑选身体健壮、略識文字之及格农民入伍，两年退伍，拟逐漸推及河南等省，不用向来招募办法。(3)馬队第三营系挑选蒙古族入营訓練，三年退伍，遣送回蒙；拟陸續推广，漸及边远，其优秀者送学校，以資深造。此外，軍中所用軍号，原以传达命令，整肃軍容，所以禁卫軍只吹奏軍号，并不若其他各鎮之兼用鼓音；編制內只有司号长、号目、号兵，而无鼓手。此虽小节，亦当記及。

又尚須附記者，則頒发“爵章”是也。我自欧返國，即參酌中外制度，奏請制定爵章，計分五等（亲王、郡王、貝勒、貝子、公，滿、蒙一律）。其式样采取分茅胙土之义，中鑲紅寶石，四周以嵌珠之多寡为等差。凡亲王以次任軍職者，由禁卫軍大臣奏請頒給佩帶。及改民國后，政府制定勋位，除大勋位外，由一位至五位均特令頒給。当时完全采用爵章式样，并利用成品，即以禁卫軍原存爵章应用。后来續制，概沿其式。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北洋軍的建立

張聯榮

北洋軍是我國最早的新式陸軍，同時也是以後袁世凱賴以竊國稱帝和北洋軍閥奪取政權、進行內戰的資本，關係我國近代歷史非常重要。我早年曾在北洋軍服務，了解一些北洋軍的情況，但很不全面，現將我和姜文熙老先生（當年馬廠練兵時曾任軍醫總辦，現年已八十五歲）共同回憶出來的北洋軍最初建立時的情況整理出來，以供參考。

一、袁世凱的出身

在敘述北洋軍建立的歷史前，首先介紹一下當時主持建軍人袁世凱的出身簡歷，是有必要的。

袁世凱是河南省項城縣人。他叔祖袁甲三，是前清的漕運總督；伯父袁保緒，是前清的天津海關道。他父親袁保慶，是前清的江南道員。袁世凱以世家子弟應試陳州，考列了前十名，不幸被主試者擯出。袁世凱氣憤已極，另找門路，向親戚劉延年湊集路費，投奔到天津他伯父袁保緒那里，並通過他伯父的關係，謁見了直隸總督李鴻章。李鴻章看他一表人才，大加賞識，正想重用他，認為他的功名前途將遠遠超過袁保緒之上。袁保緒以袁世凱年紀很輕，又剛從家里出來，恐怕誤事，不讓李鴻章派他事情。袁世凱在天津

文不能成，又想就武，因此去到朝鮮，找他世交前輩駐朝鮮軍事總統吳長慶。吳長慶以袁世凱青年有為，勸他入幕，隨名流張謇和周家祿從業學習，袁世凱就留下入幕了。

袁世凱想到自己沒有科名，前途希望很小，就求助於他伯父的好友周馥，由周馥出錢替他捐個同知的官銜，在吳長慶那里擔任了營務處的職位，隨吳長慶駐在朝鮮。

袁世凱在朝鮮奉令領兵查街，遇到違犯軍紀的官兵，毫不留情，按軍法執行，因此，很得吳長慶的信任。

朝鮮東學黨之亂起，駐朝鮮商務委員陳某遇險，由一人持槍護送出來，此人即唐紹儀。袁世凱與唐紹儀相識後，互相愛慕，兩人感情極為融洽，結為盟友，彼此幫助，共求上進。後來袁世凱接任駐朝鮮商務委員，以唐紹儀任幫辦。

甲午年間，中日戰爭爆發，袁世凱電請李鴻章派兵入朝鮮，由唐紹儀代理駐朝鮮的商務委員。袁世凱親回京師，面報軍情。

甲午戰爭結束，李鴻章退居北京賢良寺（即現在的東安市場東邊），袁世凱也沒有回朝鮮去，在北京閑住下來，因為聽說日本人有害他的消息。

袁世凱雖在北京閑住，並不甘寂寞，經常外出活動，接近名流，曾拜那時權要慶親王奕劻為師；又經翰林張孝謙的介紹，得識康有為。

袁世凱在北京活動的結果，弄到了一個浙江溫處道的官職，正要走馬上任，忽被直隸總督王文韶留下。因此，袁世凱沒有到浙江就溫處道任，就在小站主持練兵，所練的就是武衛右軍。

二、小站練兵

袁世凱奉令在小站練兵後，即在小站新農鎮（原來是田淮軍周

武壮带兵屯田、开辟水稻的地方)成立武卫右军总部。

总部下面設有：

參謀營務處：總辦徐世昌(前清翰林，以後做過大總統)；

執法營務處：總辦王英楷(前清秀才，以後做過某旗副都統)；

督操營務處：總辦梁華殿(此人对軍事學很有研究，為小站的特殊人才，不下于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三人，不幸在練兵時未久，于夜間演習野戰渡河時，失足墜河而死，以後由幫辦馮國璋接替)；幫辦馮國璋(後為總統)；提調陸建章、陸升。

中軍官張勳(等于副官長或侍衛長，後任長江巡閱使，曾發動宣統復辟)；

文案阮忠樞、沈祖憲、陳燕昌、蕭鳳文、田文烈、言敦源、吳鏡孫(等于秘書)。

其營制分左右兩翼，左、右翼長二人。左翼步兵二營、炮兵一營；右翼步兵三營、騎兵一營，共七營。每營統帶一人，幫帶一人。步、騎每營四隊，炮三隊，每隊隊官一人；又工程一營，統帶一人、幫帶一人，每隊隊官一人。

左翼翼長姜桂題(行伍出身，後為毅軍統領，提督)；

步兵第一營：統帶姜桂題兼；幫帶陸建章(後任陝西督軍)；領官葉長盛、吳金標(後任九江鎮守使)；

步兵第二營：統帶段芝貴(後任第三鎮統制、陸軍總長)；領官王金鏡(後任第二鎮統制)、何宗蓮(後任察哈爾都統)；

炮兵第三營：統帶段祺瑞(後為國務總理、執政)；

左翼重炮隊：領官商德全(後為混成旅長)；

右翼快炮隊：領官田中玉(後為山東省長)；

過山炮隊：領官張懷芝(後為山東督軍)。

右翼翼长：龔元友；

步兵第一營：統帶龔元友兼；幫帶曹鈺（后为總統）；

步兵第二營：統帶楊榮泰（后任总兵）、队官楊善德（后为浙江督軍）；

步兵第三營：統帶徐邦杰（后为總統府总指揮）、幫帶王士珍（后为国务总理）；

工程營：管帶刘浩春（后为湖北省长）、队官王占元（后为湖北督軍）、赵国賢（六鎮統制）、雷震春（后为师长，北京軍政執法处处长）；

騎兵第六營：統帶任永清、队官孟恩远（后为吉林督軍）、吳凤岭（四鎮統制）；

工程營：管帶王士珍（后为国务总理）、幫帶卫兴武（执政府副官长）、队官鮑貴卿（后为吉林督軍）、李长泰（民国九門提督）。

此外，設有粮餉局、軍械局、轉运局、洋务局。

三、北洋六鎮

袁世凱兼北洋大臣时，曾在北京設練兵处，編成六鎮部队。因为天津条約規定在天津二十里以內駐兵不得超过三百人，所以只好在馬厂練兵。他并将旧軍改編为巡警队和守路兵，加以訓練，以为維護天津市区及京榆鐵路治安之用。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十月，袁世凱由山东巡撫調升直隶总督。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正月，袁世凱奏：“委武卫右軍營务处候选道王英楷、王士珍等，分赴正定、大名、广平、赵州、深州、冀州各屬，会同各該地方官按屬均派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領訓練，兵必合格，人必上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成軍后名曰“新練軍。”五月又奏报北洋創練常备軍情形，称：“現已挑

选各屬壯丁为常备兵。拟先創練常备軍一鎮，計步队十二营、炮队二营、馬队四营、工程一营、輜重一营。俟餉項稍裕，再添練兩鎮四協，共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人。”

此項常备軍(即新練軍)在保定东关外訓練，分左右兩翼，各設翼长一人。每翼步队六营，共十二营；又炮队二营，馬队四营，工程一营，輜重一营。每营設营长一人。茲將各翼各营长官姓名列下：

左翼翼长王士珍；

步队第一营营长何宗達；

步队第二营营长鮑貴卿；

步队第三营营长沈青山；

步队第四营营长盧永祥(后曾任浙江督軍)；

步队第五营营长王吉林；

步队第六营营长張永成(后曾任第五鎮統制)。

右翼翼长王英楷；

步队第七营营长王占元；

步队第八营营长王突；

步队第九营营长何丰林(后曾任淞沪护軍使)；

步队第十营营长楊善德；

步队第十一营营长曹錕；

步队第十二营营长朱泮藻(后曾任第二協統領)。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五月，袁世凱奏称：“現在省垣創設軍政司，其中区分三处，每处隶以各股，一曰兵备处，一曰參謀处，一曰教練处。軍政司督办暫由臣兼攝。兵备处查有軍机处記名留直补用道刘永庆，堪以委充总办。參謀处查有留直补用知府段祺瑞，堪以委令总办。教練处查有分省补用知府馮国璋，堪以委令

总办。其余亦皆人有专职，事有定程。”

軍政司督办，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凱兼；总文案为傅增湘。

兵备处总办刘永庆，下分五股，股长称“提調”，为言敦源、姜文熙及其他三人（姓名已记忆不清）；文案孟錫珏、管凤和。

参謀处总办段祺瑞，下分三股，提調靳云鹏（以后曾任国务总理）、鄢玉春、吳昭麟（以后曾任測量局长）；文案徐树錚（以后曾任陸軍部次长，安福系的要人）。

教練处总办馮国璋、帮办郑汝成（以后曾任上海护軍使），下分二股，提調李純（以后曾任江苏督軍）、南元超。

以上三处总办，均系奏派。此外，又設有营务处、粮餉局、軍械局、軍医局。

营务处总办陈光远（以后曾任江西督軍）、吳簋蓀（以后曾任北京內城总厂，即巡警的制度）；

粮餉局总办陆嘉谷；

軍械局总办顧廷枚；

軍医局总办徐华清、姜文熙（以后徐华清曾任袁世凱的軍医官，姜文熙以后曾任陸軍部軍医司司长）。

練兵处成立，北洋軍政司改为督練公所，王士珍調督練公所总参議。光緒末年（一九〇八年），王英楷、田文烈相繼为总参議。其后，各省均設督練公所（督練公所的参議尚有唐在礼、金榜平、袁克定等人，已记忆不全）。

北洋六鎮系先后改編成立的，茲将成立經過及官长姓名列下：

第一鎮（近畿陸軍）駐北京一帶。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上諭：“現在八旗挑选兵丁，着先派三千人交袁世凱認真訓

練。”袁世凱奏請派內閣中書士鈺良為京旗練兵翼長，又奏請將此項旗兵名為“京旗常備軍。”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六月，第一鎮成立。

第一鎮統制鈺良（第一任），

鳳山（第二任），

何宗蓮（第三任），

蔡成勛（第四任）；

第一協統領曹錕（第一任），

李奎元（第二任）；

第二協統領何宗蓮（第一任），

朱泮藻（第二任）。

第二鎮（直隸陸軍，即新練軍），駐直隸永平府暨附近山海关一帶。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正月，袁世凱奏：在正定各屬，挑選土著壯丁六千人，分左右兩翼，各六營，又炮馬隊各三營，名新練軍；左翼翼長王士珍，右翼翼長王英楷。是年五月，袁世凱奏：“按照新訂營制餉章，創練常備軍一鎮，俟今秋明春，餉項稍裕，添練一鎮，合成一軍，名為第二鎮。”

第二鎮統制王士珍（第一任），

王英楷（第二任），

馬龍標（第三任），

張懷芝（第四任），

王占元（第五任）；

第三協統領王占元；

第四協統領鮑貴卿。

第三鎮（近畿陸軍），駐保定府暨奉天錦州府一帶。光緒三十

二年(一九〇六年)三月(曹錕任統制時)，調至奉天及長春、昌圖一帶，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十月開回北京。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一月，陸軍部奏：陸軍第三鎮系于光緒年間，當局外中立之時倉卒成軍，無暇招募土著，因于直隸省外，在山東、河南、安徽等省招募。

第三鎮統制段祺瑞(第一任)，

段芝貴(第二任)，

段祺瑞(第三任)，

曹錕(第四任)；

第五協統領雷震春(第一任，以後調通永鎮總兵)，

徐占夙(第二任，以後調江北協統)，

盧永祥(第三任)；

第六協統領張永成(第一任)，

徐萬鑫(第二任)，

陳文運(第三任)；

馬標統張國泰。

第四鎮駐天津府附近之馬廠、小站一帶。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五月，袁世凱奏：現在留京各營，改編陸軍第四鎮，分駐南苑一帶，此軍系以抽調各鎮營編成(如馬隊一營就是从第三鎮調來的)。

第四鎮統制吳長純(第一任)，

段祺瑞(第二任)，

吳鳳嶺(第三任)，

陳光遠(第五任)，

王遇甲(第四任)；

第七協統領楊善德(第一任)，

王遇甲(第二任);

第八協統領陳光遠;

馬標統領孟恩遠。

第五鎮(近畿陸軍),即武衛右軍先鋒隊,駐山東濟南府及濰縣一帶。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三月,袁世凱奏:查山東省現有各營,先分別裁調二十營,仿照武衛前左各軍營制,擬練成新兵二十營。奉上諭:“此項軍隊,着即名為‘武衛右軍先鋒隊’。”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練兵處奏:查山東有武衛右軍先鋒隊二十營,系臣世凱撫東時編練,擬將該軍抽六七成,照新章編練成鎮,編成后,名為第五鎮。

第五鎮統制吳長純(第一任),

張懷芝(第二任),

張永成(第三任),

張樹元(第四任,以后曾任山東督軍);

第九協統領洪自成(第一任),

馬良(第二任,以后曾任參戰軍第二師師長);

第十協統領賈賓卿。

第六鎮(新建陸軍,由武衛右軍、南洋自強軍組成),駐京師宿衛宮門,并分扎南苑和海淀一帶,后移駐保定。辛亥革命,吳祿貞率第十二協至石家莊,其十一協則編為二十一混成旅,由李純率領赴漢口作戰。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練兵處奏:京畿一帶,曾調有武衛軍分扎巡防,并有該軍千人宿衛宮禁。擬將該軍調集南苑屯扎,并以南洋自強軍兩千數百人照新章并編一鎮。袁世凱奏:查江南自強軍馬步炮隊共十一營,自調防畿輔,經練兵處于上年十二月間奏准將該軍二千數百人,又以武衛右軍七千余人,改編

北洋六鎮，已于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編定，編成后，名为第六鎮。

第六鎮統制王士珍(第一任)，

段祺瑞(第二任)，

趙國賢(第三任)，

段祺瑞(第四任)，

吳祿貞(第五任)，

李 純(第六任)；

第十一協統領陸建章(第一任)，

李 純(第二任)；

第十二協統領周符麟(第一任)，

吳鴻昌(第二任)。

袁世凱最初在小站練兵時，規模並不算大，新建陸軍總數不過七千人，但由於當時我國缺乏軍事人才，隨着腐朽的綠營兵的淘汰，新建陸軍就成了一支異軍突起的武裝。不久，袁世凱又以新建陸軍為基礎擴編為北洋六鎮，所有高級軍官都出自小站。以後，隨着北洋軍事力量的擴張，小站出身的軍人就佈滿了全國，無形之中形成了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為以後袁世凱篡奪政權打下了軍事基礎。袁世凱被護國軍起義推翻後，北洋軍又為袁世凱一脈相承的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孫傳芳等所利用，成為他們把持中央政權、割據地方、與南方革命力量相對抗、長期進行內戰的工具。

袁世凱之再起与吳祿貞之死

惲寶惠

当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八月(旧历,下同)武昌起义,清廷震动,派陆军大臣廕昌督师,我以陆军部秘书科科长职务关系,綜理文牘,随行营南下,于八月二十四日出发。当专车过彰德时停駛,特将最后一节花車另挂至洹上村站,袁世凱已以車馬相迓。我与总参議易迺謙、軍法处处长丁士源均随同前往,与袁相晤(我見袁这是第一次)。袁即偕廕昌至另室談話,我等另有人招待。上灯后,备席相款,袁并亲出周旋。飯后回站,路过院中,見某室挂有电报处牌子,机声搭搭,聆之甚晰。其时袁尙系罢斥在籍之人,而仍有此种不应有之設备,盖各方面电报消息,此三年中固无一日之隔闕也。

当光緒戊申(一九〇八年)腊月,袁开缺回籍,步軍統領曾派袁得亮(彼时系步軍統領衙門武职,民国后升授右翼总兵)护送,实则暗負監視之責。此人蠢俗平庸,焉能胜任。袁世凱出京后,先到卫輝,后至彰德,由袁克定督工修洹上村房屋移居,名曰养寿园。袁与乃兄在园中着錢笠,乘舟垂釣,特拍一照,故炫于外,以示終隱之志。并为袁得亮特辟一室,留其居住,并認彼为本家,飲食衣服,待遇周到,銀錢小惠,更不必談。得亮每月必向步軍統領报告袁之行动,实则得亮不通文墨,一切由袁幕府代劳(袁私人幕府迄未解

散)，攝政載灃等均信之不疑，或且等閑視之，其不落袁之圈套，尙復何待？

陸軍大臣行營專車駛至孝感，即因前面兵車擁塞，不能前進；最前頭兵車可開至漢口，已距劉家廟站不遠，再前即大智門矣。此二十日中，迭有電旨起用袁世凱，授為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前方軍隊由第一軍軍統馮國璋統率，又命廕昌回部供職。歸途行抵信陽，適袁之專車在站相候，當將欽差大臣關防寶交袁受領。會談之頃（我因捧送關防，與易述謙均在袁車上），知吳祿貞在石家莊截留前方軍隊槍炮彈藥輜重，已有異志。說到此处，尙須略述一个月前之經過。

近畿陸軍各鎮統制，本均系袁之小站舊人；重用留日士官生直接統兵，任為統制、協統，則自載灃任軍諮大臣、廕昌任陸軍大臣始。即以第六鎮來說，自段祺瑞由統制升署江北提督（王士珍丁憂遺缺）後，以趙國賢繼任；趙授廣東潮州鎮總兵，始遴選以吳祿貞奏補。吳字綬卿，為湖北雲夢人，留日一期士官生，舊學有根底，回國早露头角，在東北幫辦延吉邊務，與日本交涉，極著聲譽。其人恃才傲岸，與良弼交誼最篤，良力荐于濤、廕，遂有此特擢。同時，張紹曾授二十鎮統制。張字敬輿，為直隸大城人，留日一期士官生，久任北洋督練公所教練處總辦；其協統藍天蔚（字秀豪，鄂人），又第四鎮協統王遇甲（字司丞，鄂人），亦均士官生也。吳就職後，因更動人事及擴充事權，與軍部長官時有齟齬。其時，六鎮正參謀官（即後來之參謀長）為張聯棻（此人現在京）。吳一日特下手諭云：“十二協統領周符麟烟癮甚深，行同盜賊，應即撤職，遺缺以張聯棻呈部奏補。”經張力辭，府部亦不應允，始擬暫由二十四標統帶吳鴻昌升署。吳祿貞親筆草函，逕呈大臣、副大臣，語氣凌厲，要以必行，已不復如其他統制之恭順，結果亦未批准。吳因以大憾，不滿之

意，形于詞色。

及武昌變起，吳由保來京，其第六鎮兵抽調赴永平秋操者，即編入第一軍南行；協統李純、周符麟，均隨大臣專車。李純每日與我同在餐車對座進餐，周符麟常醉後掣其所佩之刀，作憤恨毒誓之語。我見之已慣，知其對吳早晚必要決裂，而不料吳殺身之禍，即伏于此也。吳在部自告奮勇，說本系鄂人，此次隨軍到鄂，必可過江勸諭革命軍解甲反正。廕昌固已疑之，令其回保部署，再行趕來。車過保定，吳下車時與我握手言別，期以不久相會。車开后，廕告我：吳祿貞若到前方，必靠不住，當遇機除之，以免後患。

及廕昌交代軍務，專車北駛，于一个很早的清晨經過石家莊，直開過站不停，未發生事故。到京後，即值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電請宣布立憲信條。吳祿貞與彼等往返密商，事誠有之，若謂吳曾奉派往灤州宣撫，始得協謀發動（見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則不記憶有此一事，且在時間上似不可能，蓋兩人之動機不同，其辦法亦不一致也。二十鎮中級官發動，由施從云、王金銘、馮玉香（即馮玉祥）帶頭，三人皆管帶。施、王為王懷慶（時任通永鎮總兵）捕獲，壯烈就義，馮機警逃脫。後來馮任陸軍檢閱使時，曾為施、王鑄銅象，矗立北京中山公園，座下有一文記當時起義經過，是馮所撰。此兩象後被撤除，當局主張銷毀，我時任公園常委，與同人密商，移貯公園庫中，今不知在何所矣。

吳祿貞在保所部，仅是六鎮少數軍隊，原難舉事。及其開赴石家莊截留接濟前綫軍火列車，消息傳至北京，晉軍亦已開到娘子關。吳則電報清廷，云晉軍已經就撫，于是特授吳為山西巡撫（晉撫陸鍾琦已被新軍在撫署击斃，協統譚振德亦為部下所殺），思以爵位弭其異圖。吳奉旨後，尚有電奏謝恩，略謂：“巡撫關防，尚在

太原，是否遺失，不得而知，謹刊刻木質關防一顆，文曰‘山西巡撫兼提督關防’（清制，晉撫例兼提督），祿貞即于行次啓用，以昭信守”云云（此電奏由內閣抄交陸軍部備案，經我收閱）。實則吳先乘車前往娘子關，已與晉軍接洽妥協，並令開往石家莊一同舉旗北上。吳之種種布置，已為袁世凱和北京政府偵悉。袁其時雖駐廣水，而排制載灃等逐步計劃，早有成算，取得政權，即在指顧；若使吳直搗北京，進行顛復，則滿盤計劃全空，尙有何戲可唱？殺吳一事，勢在必行，況又有周符麟切齒之恨，正可利用。但以我所知聞，周與李純均尙在漢口第一軍司令部，據說是一王姓軍官受命所為，非周親下手也（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及傳說均不確）。彼時軍諮府第三廳廳長陳其采（字藹士，為陳其美之兄）曾赴石家莊偵察吳之行動。兩人本系士官同期，同學交好，但陳一到，吳即開口說：“你是濤貝勒叫你來監視我的行動的。”陳力辯，謂：“軍諮府無事可辦，老同學開府三晉，極愿追隨左右，同建立一番事業，何必多疑。”彼時六鎮正參謀官張聯榮，已于秋操軍次隨同馮國璋赴漢，吳所用之張世膺（留日四期士官生）為鄂省同鄉，因令權任參謀長職務。吳住車站，與副官周維楨同室。陳到后，即值吳召集中級以上軍官在電報局樓上聚餐開會（時晉軍甫到）。吳即席宣布採取革命手段，明晨即直赴北京，並分發白布臂箍，使各纏左臂，以為符識，有不服從者即以軍法從事。会后，吳返車站，尙與陳其采談話後始就寢。至夜半，忽發覺有軍官多人進屋，要見“吳大師”。吳知事不妙，啓后戶，思越牆，未果，只得奪門而出，為某所击倒，以刀斷吳之頭持去。張世膺、周維楨亦同時遇害。后于鐵道旁（距站里許）將吳之頭尋獲。陳其采倉皇隱匿運煤車上，幸未波及，到京縷述如此。此即吳祿貞被殺害經過也。

陝西革命艺人李紫恒

張 鋤

李紫恒是河南怀庆府人，辛亥革命前在陝西徽剧班里扮演武生，艺名小紅。当时关中只有这一个徽班，他早年就已经馳名河、洛、陝、灵之間，陝西省城与涇原一带的人都喜爱徽班，对他的艺术更是特別欣賞。在旧社会里，艺人的地位低微，到各处演唱，困难很多，如果不加入帮会，依賴帮会的庇护，就必定遭受强梁恶霸的欺侮，因此，李紫恒参加洪帮，作了洪門的兄弟。

陝西辛亥革命起义后，由于洪帮与同盟会事先早有联絡，李紫恒帶領了几十个人到潼关見我（我那时是秦隴复汉軍东路征討大都督）。他說：“我对于豫西各个城市乡鎮的山河道路非常熟悉，各界的人都喜欢看我的戏，我来参加革命打头陣，一定能旗开得胜，馬到成功。都督如果有差遣，願立軍令状，看看我們唱戏的革命能力如何？”随后他又談了許多怎样刺探敌情和向民众宣傳的方法，說得头头是道，不但言詞伶俐，态度和藹，而且表現出一种朝气蓬勃的豪迈气概。他又說：“打了很多年舞台上的假仗，今天来投軍，要打真仗，显显本領。”当时在旁边的人都不相信他的話，用輕視的口吻嘲笑他說：“好唱家，还是請演一折吧。”我見他的来意确实出于至誠，就說服了众人，決定派他充当偵探队长。发委任令給他时，我諷諧地打起唱戏的腔調对他說：“李队长听令！”他站立起来

俯首应声說：“有。”我說：“前日敗退之敌，向灵宝、陝州一带逃窜，派你前往偵探敌人情况，火速回报，不得有誤。”他說了“得令”之后，便即刻出发。

他出发以后，每到一处，便有一次报告；在三四天里我就接到他五六次报告。他的报告对敌军情况以及当地人心向背比軍士哨探的报告还要清楚詳尽。这时，原先那些輕視他的人开始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才知道这位艺人不但会打假仗，也能打真仗。李紫恒的名声因此大噪，軍民都对他有好感。

十月初东征軍向灵宝的敌人进攻的时候，李紫恒首先出发。他沿途一面偵察敌情，一面向当地民众講演革命軍东征和复汉救国的道理，很受沿途老百姓的欢迎。东征軍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都欢天喜地地預备吃的喝的迎接革命軍。当战事激烈的时候，老百姓不怕危險，还爭着送飯到火綫上給兵士們吃。这都是李紫恒宣傳的效果。后来敌军增加，来势洶涌，我軍寡不敌众，退回潼关。李紫恒当时察看到我方的險要关寨防綫上尙有空隙沒有守軍，便說：“我帶領的人数已經超过一百名，使用的枪刀已有八成，我要亲临火綫前去对敌，填补那个空隙。”我笑着对他說：“你真要演定軍山嗎？现在就派你去埋伏在牛头塬的山湾里，堵击敌人。”他在那天夜里，到达指定的地点埋伏。十月十一日拂曉，敌人以十倍的兵力进攻，李紫恒和他的士兵頑强抵抗，同敌人激战半日之久，他和他的士兵竟全部壮烈牺牲，潼关也在这天失陷。

李紫恒和他率領的百余名士兵壮烈牺牲的事迹和英勇的精神，永久留在三秦人民的心中。共和告成后，三秦父老曾为他作傳，并有詩詞記述他殉难的情形，可惜那些文稿后来都散失了。現在距离辛亥革命虽已四十余年，而我对于李紫恒这个革命艺人壮

烈牺牲的事迹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当我写这篇回忆录的时候，重新唤起了我对于这位革命亡友的热烈的感情，彷彿看到他的形象还站在我的面前——颀长的身材，年近五十，举止洒脱，以及那种令人难忘的豪迈英武的气概。

李紫恒以一个负有盛名的艺人，竟能抛弃一切，参加革命，并为革命壮烈牺牲，誠屬难能可貴。因此，他和許多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在辛亥革命史上应占有同样光荣的一頁。我后来經過潼关的时候，曾經作了一首七言絕句来悼念他，附录于此：

事与俗官傳不同， 衣冠优孟出英雄。
潼关千古留芳塚， 碧血青山吊小紅！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日

談 梁 任 公

周 善 培 遺 稿

丁酉(一八九七年)十月初,研甫督學^①約定在武昌會合,我就由北京到上海,再買招商局的官艙票到武昌。頭天夜里上船,第二天吃中飯,官艙客八個人一桌。吃到一半,有一個客人才由官艙出來,穿的是紫紅緞的皮袍、天青緞的出洋灰鼠風的皮馬褂,這是當時統籌穿的衣服。坐定之後,有人問他姓名,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梁任公。我當時以他的衣服同他的大名對照起來,就不免有點懷疑。他不理會我,而我是個無名小卒,自然也不敢同他攀談。他的同行韓千秋、歐渠申,一路無事,倒和我談了兩天。他們都是康南海的門人,南海是講公羊學的,我們就談了很多的公羊學。過了九江,任公居然來找我談天,我又不願和他多談。到了長沙之後,他在時務學堂當監督,熱鬧得很;我是向來怕趕熱鬧的,也從未去訪過他。到了寶慶,我的《力書》出來之後,大概是研甫督學對他介紹了我,他就給我一封信,表示願意訂交之意。等我六月底回到長沙,他已經到北京去了。以後政變,他就亡命到日本去了。

己亥(一八九九年),我到日本調查,過上海遇見時務學堂的两个學生同船到日本。在路上談起他們要到日本找梁先生,我就托他們轉達任公,我要去訪他。到了東京,任公就由橫濱來信約定日子,

^① 徐仁鑄,字研甫,時任湖南督學。

他来东京訪我。見面歎歎感慨良久以后，我就提出他們对政变應負責任的意見，任公当时誠懇地深自引咎。我就提出訂交的条件，彼此多規过、少獎善，他不但当时接受，以后往来三十二年，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这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我在东京住了一百二十天，与他見面在十次以上。己亥（一八九九年）以后，辛丑（一九〇一年）、甲辰（一九〇四年）、乙巳（一九〇五年），我又到日本去了三次，每次都同他往还不少。惟有甲辰九月，我和他在箱根环翠樓談了三天三夜，这次談話最重要的是我劝他少談保皇的空話，多研究第二次如有变法的机会，我們如何以前事为戒，訂出如何有次第的办法；劝他少講公羊学，多研究周礼，因为中国原有一套整个的政治制度和办法，都在周礼上。他也很贊成，他虽是篤信師說的，对于公羊他以后就少講了；但对于保皇的招牌仍然放不下来。这时候，我在两广总督岑西林（名春煊）幕府里。他約定要到香港来，問我能否到香港和他見一面，我答应了他。

第二年（乙巳）二月，他到了香港。信来了，我到香港去同他談了一夜。他想見一見張堅伯（名鳴岐，也是岑西林的重要幕府），我說：“去試探一下再回你的信。”我回到省城，就同堅伯談了，他欣然願去，我說：“別忙，我們先去向西林公开，看他有什么意見，他不贊成，你就別去，以免事后发觉，反而不好。”想不到同西林一談，他很高兴地說，“可惜我不能去会他”，立刻請堅伯就去，拜托堅伯替他向任公致意，問任公出国几年，有什么挽救国家的办法，尽量告訴他。于是，我同堅伯就再到香港，和任公由早上九點談到晚上五點鐘，任公談了許多，堅伯把重要的都紀錄下来，回省轉達西林。西林虽沒有采用他的办法，却对任公始終是表示崇拜的。

丙午（一九〇六年）以后，我到四川去了。从丙午到辛亥，六年

之中，彼此沒有往還，只有通信了。壬子（一九一二年）二月，我由四川到上海；五月，湯覺頓^①奉任公之命，到上海征求我的意見，說：“袁世凱請任公到北京，任公決定要去了”，并問我的意見如何。我想此事太大，由覺頓轉達是无用的。这时候，趙堯生師^②也在上海，我立刻去請教他，說：“任公是万不能去的，但非我当面去說不清楚。我想明天就到日本去。”趙先生說：“任公曾經寄給我很多詩，請我替他改訂，我也替他改訂了不少，他都能虛心接受，我也想去見見此人。”于是，我就买了票。第二天，就同趙先生同船到了橫濱，立刻到任公家里，从午前九时談到十二时。我提出：“对德宗是不該去；对袁世凱是不能去。”任公也辯論了几句，最后說：“我不是不听你的話，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的話。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說清楚。”趙先生說：“南海先生也主張你去嗎？”任公說：“我不必多說，你們見了南海先生自然明白。”这时，南海先生住在武子，距东京只有三十分鐘火車。午后二时，我就同趙先生到了武子。不但我对南海表示一种敬意，趙先生起初也是极尊敬他的，想不到談到七点鐘，我同他反复辯論不知多少（我另有“討袁之回忆”，記載这一天的談話甚詳），他竟坚决主張任公要去。在他家里吃了晚飯，我还同他辯論，而最后一班到橫濱的火車要开了，趙先生也劝我說：“朋友交情尽到为止，再說下去就要妨害交情，不是我們的来意了，我們走吧。”回橫濱旅館住了一夜。次晨，任公到旅館来，我对他說：“这一次，你的命运交給南海先生了。我們既是朋友，以后总有志同道合的机会。我要陪趙先生到东京箱根和西京遊覽几天，就由神戶上船，少受几天风浪，不再到橫濱看你了。”这

① 湯散，字覺頓。

② 趙熙，字堯生。

样，我們就分手了。遊了几天，就回到上海。赵先生九月就回四川去了，临行，还对我說：“任公是可爱的朋友，現在已到了身敗名裂的时候，你还得想法救他。”任公到了北京，就作起司法总长来，我从此同他既不見面，也不通信了。

但是，我知道他心里还是贊成我的，不过因为篤信南海先生，才走錯这一步。既成事实是无法补救的；任公理智极高，只有創造一种理論才能轉移他。而理論太多，重点也多，要作专题論文，既难找出这許多相当的題目，由我創造的理論，我虽認為合时，他未免認為是由我創造的，未必能說服他。想来想去，康、梁是尊孔的，只有在孔子書中找一种最广泛的題目，提出若干合时的理論，一面是代古人講話，一面是向他对症下药。于是，我就把論語四百廿一章丟开先儒的一切旧說，每章都借孔子的題目来发表我不是痛罵袁世凱就是諷刺梁任公的意見。費了半年的功夫写完了，由我兄弟竺君和門人曹叔实抄写一过。第二年春天，請竺君到京，面交給任公，請他看一遍，替我作一篇序。任公当著竺君看了第一章我借李斯、刘歆来一面解釋学而不时习的毛病、一面諷刺任公的那一段文章。看完了，他对竺君說：“我已經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請你回去替我謝謝老兄，只說我知过了。請他容許我改过补过！”竺君回来，我把稿子交給中华書局出版。中华書局已經打了一張样，印了出版代售的合同，隔了几天，書局經理陸費伯鴻亲自拿起原稿来对我說：“書局已預备排版了，不过，檢查之后，認為語病太多，出了版恐怕我同你双方都不利，請你原諒。”于是就不能出版。这部稿子至今还保存在我家里，任公虽沒有替我作序，事袁的思想却从此轉變了。

癸丑(一九一三年)八月，袁世凱既夺取广东，就来征求我的意

見，問我願意擔任广东將軍兼巡按使否，我謝絕了。他又使別人來勸我，我又謝絕了。第三次，他託任公派湯覺頓來勸我說：“即使你不到广东，也不要太辜負項城一番好意，希望你到京來見一見項城。”覺頓又再三勸我，我堅決地謝絕。覺頓急了，就說：“你連見一面都覺得有毛病嗎？”我就一笑說道：“任公不妨事，我却認為我決不可見袁。”覺頓回京后，任公去見項城，代我謝絕。項城說：“我早說周孝懷是幫岑老三的，你不相信，今天相信了嗎？”

从此以后，我对任公虽不通信，却随时看袁的举动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就随时托人去提醒任公，請他預防，該抽身就早抽身，不要太陷深了拔不出。甲寅（一九一四年），約在春夏間，任公看清楚袁世凱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經驅除淨尽，天下統一了，专制独裁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話，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訴我。我也把我在《論語時義》中預測袁世凱想黃袍加身、現在逐步快實現了的見解告訴任公。等到乙卯（一九一五年），籌安會問題一發現，任公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見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預备好的。从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两人就进一步合作起来，計劃如何討袁了。

袁的势力布滿在腹心之地，要討他，我們認定只有从边省下手。川、滇、粵、桂都是边省，而川的陈宦、粵的龙济光都是袁的忠臣；只有滇、桂两省我們虽不能直接，而任公对滇、我对桂都有間接可以运动的途徑。于是，任公就担任图滇，我就担任图桂。蔡松坡（名鍔）是任公的学生，又是滇省起义的領導人；松坡听任公的話，云南將領又听松坡的話，于是決定請松坡赴滇。而这时松坡在北京，袁派有四名偵探名为保护他，实际監視他的行动。于是，我就

定計，先請向不治遊的松坡去逛窑子，由吃酒打牌进一步日夜都在窑子里。逛了一个月，袁果然根据監視人的报告，認為松坡墮落了，无大志了，就减少了两名偵探。第二步，就由松坡装病，先进北京日本人开的病院，又勾通病院写張証明書，要松坡到天津的日本医院去治病，說明天津医院才有这种医疗的设备。于是，松坡帶了两名偵探到天津，又花了許多錢叫这两名偵探把他們的北京家屬搬到天津，然后帶着这两名偵探搭日本船秘密地到了上海。我們談了一夜，第二天，我又送他上日本船。他由上海先到东京，再轉香港經安南到云南去了。

松坡去后，任公也准备南来了。十二月初，任公电报来，由日本乘輪船某日某时到沪。到时我同黃溯初（名群）到船上去接他。我同溯初陪他到我們替他預定的白渡桥礼查飯店二楼住下。这里要补說几句话：我自从謝絕袁世凱，不到广东以后，不久发现了袁的北方偵探时常在我极司非尔路四十二号門前探望。討袁事起，袁的偵探往来更多了。我就买了两支手枪，在英工部局領了两支手枪執照。这时，随时有几个我以前办广东将弁学堂的学生帶起手枪跟着保护我，接任公这一天，也帶他們去的。到了礼查飯店，我就叫他們在飯店門口查看有没有什么变动。任公到飯店是六点半鐘，七点半下楼用餐，吃完了，任公要上楼。我說：“莫忙！方才我有人在門外探望的来报告我，說有点特別情形，等我先上楼看一看，下来后再陪你上楼。”說完了，我就帶一个人上楼，走在樓口，果然看見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背着樓口，面盯着任公的房間。我立刻下楼，一面請溯初在楼下等穿外套的北方大汉下了樓，然后把任公的洗臉用具先取来帶到我家里，一面拉着任公立刻走出飯店。我們帶一个学生由礼查飯店門口，每走三四条馬路，就換一次洋車。

換了七次，才到極司非而路我家里住下，一共住了八天，除了日本領事秘密來过一次之外，謝絕一切賓客。到了六天以後，我門口的北方大漢又不斷來探望了，我家里也不能再住了。於是，替任公租了一所房子在靜安寺路、赫德路口，任公搬去住了几天。陽曆除夕傍晚六點半鐘，我又帶兩個學生到他家里去閑談。剛走到赫德路靜安寺路口電車道傍邊，又發現一個北方大漢穿着呢外套，面朝着任公住的房子，我就叫一個學生先去知會任公今夜要特別注意，一面回家。此次任公到上海，本不想叫英捕房知道，現在危急了，不能不通知它。於是，我就到英捕房去，請他們派遣兩名巡捕來日夜輪流看門。次年丙辰（一九一六年）一月，廣西陸干卿（名榮廷）來電請我們到廣西去，但是我有事到日本，就請任公先去。我把任公送上到香港的日本輪船後，他由海防到了廣西，我就到日本去了。

我從日本回上海之後，二月初到了廣西，先在梧州住下，電約干卿、任公來梧州商量起義的辦法（這時干卿在南寧）。隔几天，湯覺頓由南寧來了，說：“龍濟光有電請干卿派名代表到廣東商量要事，干卿派我去，但是我不想去，又辭不掉，所以先來同你商量。去了有危險沒有？”我同他討論了一整夜功夫，預測不出龍濟光如要同陸干卿決裂，何必先要他派個代表，然後害了這代表再決裂呢；如果不想決裂，更無害代表之理。我們實在想不出危險的理由，他才決定去。想不到他一到廣東就被袁世凱收買的龍濟光部下顏某借海珠會議把他害了。又隔几天，任公同干卿到了梧州，任公才告訴我道：“覺頓之死，真是不幸！但是我到南寧住了一個多月，干卿的主意仍未堅決。龍濟光把覺頓害了，他才一怒打電去同龍決裂，一面才肯同我到梧州。覺頓之死，雖是個人的不幸，却是大局

之幸。”

干卿本答应要岑西林来广西主持討袁，因为主意不定，一直观望，等到袁死了，他才电催西林快来。西林到了梧州，干卿在极盛大欢迎的当夜，就想离开梧州。我勉强把他留下，到第三天，没有等到討袁司令部成立，他就毅然决然地走开了。

干卿不愿意在广西成立討袁司令部，我们只得迁到肇庆去依靠反袁的肇庆鎮守使李耀汉，在肇庆成立討袁都司令部。刚成立第二天，西林内部就发现了排斥任公派的意見。我一面警告西林不可内訌，一面劝任公委曲迁就，我要回到上海另想联合其他方面的办法。我就回到上海了。回上海之后，我到杭州走了一趟，把浙江吕公望联系好了，浙江独立了。五月，袁死了，任公就由广西回到上海了。

任公丁父忧，正在討袁都司令部成立后兩天，当时我们不便使他知道。他到了上海，才发丧成服。

癸丑(一九一三年)冬，南海因为对任公請托太多，最后一次任公没有照办，他怒了，来找我，要我去信責备任公，我婉言謝絕。从此，他就同任公断絕往来了。討袁事起，南海也屡次来問我有什么办法，我因为他不能保密，有时且有点吹，我没有敢告訴他一个字。任公在上海住了很久，也未敢通知他。这次任公由广西来了，我先劝任公去見他一面。好容易把任公說通了，然后我又去見南海。南海起初还怒气未息，經我一再劝解之后，然后才答应由我領任公去見他。任公叩了几个头，南海也不还礼。虽沒有十分責备他，但始終是怒气未息。談了不到一点鐘，两师弟就相对无言而散。从此，康、梁就神离而貌也不能合了。

过了几天，南海又来訪我，問我道：“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

生。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我知道他的意思是恨任公不服从他，我就答复他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戊戌以前也是讲学问的，戊戌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作官是作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作官。我作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南海听了自然不满意。第二天我把这段话告诉任公，同时劝他说：“袁死了，民国的政治是革命党的事，我们应当关起门来少谈政治。谈政治的朋友只能共热闹，是不能共寂寞的。”任公当时虽无话说，却一时冷静不下来；加之，经过讨袁，他在社会上又取得了一种地位，奔走其门者甚多，他要冷静也不由他冷静了。

丁巳（一九一七年）五月，张勋复辟，任公又来找我同去参加段祺瑞的马厂誓师。我对他说：“南海要复辟，请我参加，是错认我为遗老，而不知辛亥我替四川人争路是想维持大清延长几年寿命，清政府不以为德，反把我革了职，我是同大清情断义绝了的。你是知道我同大清是情断义绝了的，而忘记了你对德宗的恩深义重。我不参加段讨复辟，不但我无参加的必要，段是辛亥最后的两湖总督，该不该讨复辟，他还需考虑；你该不该参加他的讨复辟，你更得考虑。”任公说：“不讨张勋复辟，我们讨袁就无意义了。”我说：“我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革命党推翻清朝是对的，袁世凯始而利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已经该讨，又进一步推翻共和政体，自己作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由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丝毫不相干。”任公说：“那么，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我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人去做。”

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应当做；討張復辟只該听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反復說了很久，我看他把這道理始終分析不清楚，又同他研究段祺瑞能不能共事的問題。我說：“講交情，我同老段比較你還有點小交情，旁的事他不認識我，他却認識我不想作官，不想依靠他來分點贓。而他這人自己是沒有腦筋的，左右又是一般壟斷權利、不願意別人分贓的人。他再三要我到四川去，你也從旁幫他勸駕，我尚且避之不及；你怎么拿一個毫無交情又不免分取他一份權利的人去同他共事呢？”任公說：“老段反對洪宪，我們不該佩服他嗎？”我說：“我也因為佩服他這一點，所以結束肇慶都司令部以後，我還同他作朋友。”任公說：“為什麼作得朋友又不能共事呢？”我說：“當然是兩回事。作朋友誰也不侵占別人權利；一共事，權利問題就來了。你連這種極淺顯的政治利害都分析不明白，還談什麼政治呢？你既認定他能共事，我不敢妨害你的自由。我只看你最後長嘆一聲下台就是了。”從此，他就幫段作起誓師的檄文來。張勳打垮後，他就作起財政部長來。不久，他下了台。我也就此不再和他談天下事了。

任公有極熱烈的政治思想、極縱橫的政治理論，卻沒有一點政治辦法，尤其沒有政治家的魄力。他在司法總長任內，沒有作過一件受輿論稱頌的事；在財政總長任內，卻有一件小事可以證明他既無辦法、又無魄力。事情是：我兄弟竺君作鎮江海關兼揚州常關監督，當時鎮江關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揚州關每年却號稱有十萬！竺君到任以後，一查揚州關的收入全是由中飽取得的，他就一面嚴行拒絕，不在揚州關取一文錢；一面嚴禁中飽。而靠中飽吃飯的有好幾百人，又同上下游的稅局勾結起來，實在禁不勝禁，防不勝防。他就向財政部提出他只任鎮江海關監督，請財政部另

派揚由常關監督。這時，任公已到了財政部，特別派人來問竺君何以辭十萬而就千，竺君氣極了，寫信責備任公道：“你當部長怎麼可以對部屬說這種話？你是公開勸部屬中飽嗎？”同時又擬了一篇改革全國常關的辦法，並擬訂了幾十條嚴禁中飽的給員司獎金、化私為公、使公家既不受損、員司又能糊口的辦法，寄給任公，請他借五日京兆給國家革除一件百年的毛病。我又從旁激勵他好幾次，他却左顧右盼，使得這一件極不難辦的事情竟自原封不動。

我常對任公說：“孔孟、蘇張都談政治，為什麼孔孟是政治家而蘇張是政客呢？就是孔孟談政治沒有自己，只訂出許多原則性的理論，讓一般諸侯去听。誰照他的理論去作，是他的幸福，與我無關；誰不听他的話，是他該倒霉，也與我無關。蘇張就相反了，事事都為的自己。誰听他的話，那個人有利，他自然有利；听他的話作壞了，而他的官騙到手了，他也有利。孔孟講了一生政治，雖沒有得過意，一生是愉快的，結果是安全的。蘇張雖然得過幾天意，却一生在恐怖中，到底得不到好結果。”任公財政部下台之後，我常常舉出以上這段談話問他：“你講了一生政治，你有幾天是愉快的？”他只有長嘆一聲來答复我。

我又常同他說：“真講作事的政治家，勿論职权的大小，到一個地方，作一趟官，總得留下兩件事，使去後還有人想我，留下好印象。如李冰在四川蜆離堆，事隔二千年還有人紀念他，這是第一等。如子產在鄭國前半期被人咒罵，後半期被人稱頌，也是好的。即使象王荊公作壞，到今天還有人佩服他作事的精神，也够得上政治家。如果做一趟官，留不下一件事使人回憶，這只能叫作官，不能叫作事，更說不上政治家。”他憤然地答复我：“你難道不曉得今天不能辦事嗎？”我笑着答道：“你難道早不知道今天不能辦事嗎？”

他最后也只有拿长嘆一声来答复我了。

袁死后，我劝他莫問政治，他冷靜不下来；財政部下台后，不待我劝他，他就自然地冷靜下来，講起学来了。

我对他的講学也向他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但始終合不到一塊兒。我們間的分歧是：任公想作通人，总想无所不通。我希望他要专，要精。他以为我太狹隘，我以他为太泛濫。結果任公在学术界只能算个杂家，这是我認為可惜的一点。还有一点：人在中年以前，可以用求知的思想去講学，中年以后，講学一面是求自己有受用，一面是求人受用。任公对我的理論很贊成，而他不幸五十八岁就早逝了。他講了一生的学，究竟得到多少受用，我虽同他論交三十五年，还替他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答复。他死后，我作了一篇极沉痛的祭文，只能表示我对他哀痛之意，仍然算不得替他答复这个问题——他講政治、講學問几十年，究竟得到些什么受用？我对他只能感謝他能容納我的直言。任公死后，我再想找一个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沒有了。

写完了，我还回忆起丁卯（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到天津偶然同任公討論文学的两段話。一段是：我对任公說：“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支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維你。但是，作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讀你的文章，沒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經作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馬迁死了快二千年，至今《史記》里有許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厭百回讀的。你这几十年中，作了若干篇文章，你試想想，不說百回讀不容易，就是使人讀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任公說：“文章要怎样才能留人呢？”我說：“必要言外有无穷之意；讀者必要反复讀了又讀，才能得到它的无穷之意。讀到九十九回，无穷的还没有穷，还去不下，所以不厭百回讀。如果

一篇文章把所有的意思一口气說完了，我自己的意思先穷了，誰还肯白费力再去搜求，再去讀第二回呢？开門不見山不能动人，一开門就把所有的山全看完了，里面沒有若干丘壑，人自然一看之后就掉头而去，誰还入山去搜求丘壑呢？”任公很以为然，而他的文气太盛，又作惯了报纸文章，目的就在动人，所以始終向动人方面发展，这是他一件令人可敬、又令人可惜的事。

另一段是：任公常以不知一事为耻，因此，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我常常劝他道：“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应当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对，你却总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象这种求足的方式，天下学术无穷，你已年近六十，那一天才能达到你足的願望呢？”任公当时也一再点头，而始終控制不住一个“名”字，因此就造成一个无所不通的杂家。这也是我个人認為是一件可惜的事。我的見解对不对，要待后人来批評了。